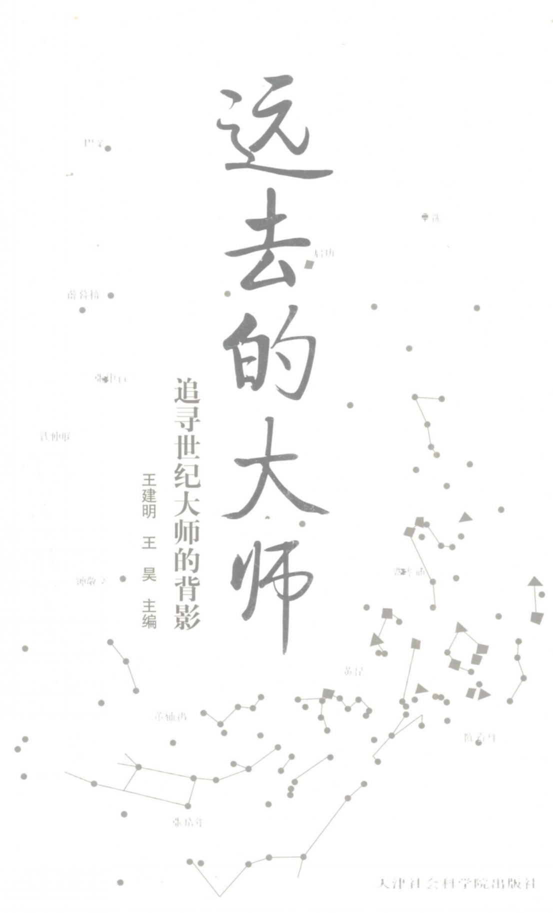


远去的大师

追寻世纪大师的背影

王建明　王　昊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潮
装帧设计：刘晓薇
绘　　图：关雪岩

大师的名字因知识的光辉而成为历史的坐标，成为后世众人反复阐释和回忆的经典。出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人们格外尊重那些掌握知识与真理的人们。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对于这些已逝大师级的巨星最恰当表述，因为他们生前的贡献依然在影响着无数活着的人。他们思想的独立，灵魂的真实，已经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ISBN 978-7-80688-386-0
9 787806 883860 >
定价：24.00元

远去的大师

追寻世纪大师的背影

王建明　王　昊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大师/王建明，王昊主编. –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688-386-0

Ⅰ. 远…　Ⅱ. ①王…②王…　Ⅲ.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Ⅳ.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9045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总编室）
(022) 23075303（发行科）
网　　址：www.tssap.com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24.00 元



序一

这是一个大师逝去的年代

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的逝去,对于那些久经岁月沧桑的"老人"来说,从呼吸衰竭到呼吸永久的停止,确如起于青萍之末的鸿毛轻轻滑过天际,很轻。然而,那苍老遒劲的身躯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因生命的逝去而随之告一段落的震荡,很重。

仿照摇滚歌手的抒情语言,这是一个大师逝去的年代。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如同是一种集体的约定,许多已入耄耋之年的大师级学者纷纷离世而去。

2002 年 1 月 9 日,99 岁的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逝世

2003 年 12 月 4 日,96 岁的国学大师钱仲联逝世

2004 年 4 月 24 日,95 岁的国学大师张岱年逝世

2004 年 7 月 30 日,77 岁的经济学大师董辅礽逝世

2004 年 12 月 3 日,93 岁的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逝世

2005 年 4 月 24 日,95 岁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逝世

2005 年 7 月 6 日,86 岁的世界物理学大师黄昆

逝世

2005 年 6 月 30 日，93 岁的国学大师、书画家启功逝世

2005 年 7 月 22 日，101 岁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逝世

2005 年 10 月 17 日，101 岁的一代文学巨匠巴金逝世

2006 年 2 月 13 日，70 岁的“当代毕昇”王选逝世

2006 年 2 月 24 日，97 岁的国学大师张中行逝世

这份名单如果稍稍向前回溯，还会有很多先贤往哲。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概莫能外。所以孔子会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感叹那些逝去的生命和时间如同流水奔腾而前。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的离去一代的兴起，构成了历史。几千年前人类就知道，肉体是不能永恒的，生命的短暂让曾照古人的今月阅尽人间的沧桑。贤哲如孔丘孟轲，尚还不能逾越“七三八四”之说，苏格拉底尽管是最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免去被处死的命运。在生理时间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另外一种时间纬度——文化与历史的时间之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人虽死犹生，有些人将不朽！

这些离世的老人既是普通生命的长者，又是一代传奇大师。当张中行漫步在北京市井杂巷之内，在一个小酒馆里叫上一壶酒和几样小菜，享受着庸常的欢乐的时候，也许他心中正在思考着《顺生论》的某一篇文章。使我们敬畏的是“大师”的称谓；尽管在这个名不副实的年代，有太多的不相称的名称漫天飞舞，但这些老人还是当之无愧。何谓大师？最简单而言，要有伟大的学术成就，要对他所置身的

学术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古往今来大师评判标准的“硬指标”。其次,要有形而上的学术品质和道德水准。再者,特别是那些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师,还需要有很高的寿命。这或者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许多潜质卓越的学者常常在通往学术神殿的中途而陨逝,令人扼腕浩叹。使我们敬畏的更是“大师”的传奇。这些离世的老人,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曲折蜿蜒的故事。他们一生的经历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最终他们也在暮色苍苍中随着这个世纪一同谢幕,舞台已空,人亦逝去。遥想当初,恰同学少年,无论巴金还是费孝通,都怀着一颗青春的心决意为离乱的中国寻找光明、希望。曲折的现实之路,让他们激昂也让他们迷茫。从五四运动到烽火连天的抗战,从建国之初的百废待兴到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从改革开放到千禧世纪之末,当年的少年读书郎已溘然作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人们留下的是学术与文化上的不朽遗产,也是他们波澜一生的壮美。

雅典的帕克农神庙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古典时代以降,从苏格拉底到卡西尔,数千年的西方的哲学仿佛都是这句话的注脚。在人类永恒地向认识自己前行的过程中,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睿智的先贤大师们,如同浩瀚星空中恒星,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的名字因知识的光辉而成为历史的坐标,成为后世众人反复阐释和回忆的经典。出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人们格外尊重那些掌握知识与真理的先哲。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大师们的力量就在于拥有更多的“认识你自

己"的知识。

然而，大师的力量不仅在于深邃而广博的知识，也在于他们在人类知识传承中所体现的人格的力量和温暖的关怀。曾几何时，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也感叹："多有智慧，就多有忧伤；加增知识，就加增烦恼。"纯粹的知识并不能使人类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感到快乐，有时候知识的进步，带给人的有可能是作茧自缚般的束缚。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却常常使人倍感空虚和孤独。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技术的进步和心灵的荒芜之间的落差。这种"心灵"上的知识和体验被我们大多数人所忽视了，甚至，我们还不如古人。真正的大师，不仅拥有冷冷的智慧，也将深刻的人文关怀集聚于一身。让我们知道，知识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烛照内心的温暖。

没有不灭的肉体，却有不朽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大师，当这个时代过去，大师们也会纷纷作古而去，魂归道山。集体的谢幕总令人悲伤，总令人感到一种晚秋的悲凉。但花落春仍在，他们只是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移居到我们的内心中而已。我们将更多的学习他们的数学定理、读他们温暖的目光和句子。

姜海龙　于香港中文大学
2008年4月15日

序二

从大师的忏悔说起

在这本《远去的大师》里，我看到了巴金老人的名字，心里为之一振。巴金是一个“特殊”的大师，作为现当代一位文学和思想大师，他当之无愧，可是，这位世俗意义的大师，却在自己人生最后的近三十年，在做一件事——忏悔。大师那么崇高，那么杰出，那么伟大，怎么会忏悔呢？

巴金在《随想录》里这么写道：“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在我的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大师的本质意义，巴金的话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大师的思考就是“挖”，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一把扫帚，一支弓箭，一个解剖刀，他们能够为中国的人文环境带来净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文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能免受污染，保有内心的洁净。近三十年的忏悔，巴金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俗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就已然足够，自己问

心无愧,又何苦忏悔？忏悔不就让大师的名分跌价吗？可是,巴金老人背负了整个时代的苦难,从最纯粹的人性角度,最真实的人文态度,他不满足于个人的超脱,从世俗名利里挣扎开来,把自己的心和中国的心融合在一起,他的思考在人文苦痛中煎熬了近三十年,但是,他从心灵和文化上解救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视野开启了一扇最有意义的窗子。

这就是大师的真正,真正的大师！本书里的大师,没有财富榜上的富豪,没有电视节目里的名人,他们用最淳朴的方式,走出人生一个又一个困境,在当代历史中,他们深深烙下的不是名和利,而是他们沉甸甸的思考。从古至今,没有那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呼唤大师,渴求大师,赞美大师,尊敬大师,崇拜大师,唯一的遗憾,就是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之后,大师还是没有出现。其实,我倒觉得一百年有一个巴金就足够了,大师像工业品一样流水线生产,像小商品一样批发销售,这不说明当下的时代如何伟大,相反,会让我们的时代变得滑稽。不要"浪费"大师,我们对已有的大师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深。

一个运动员通过训练,可以夺取金牌,为国争光。可是大师呢？要资金给资金,要房子给房子,但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就是出不了大师。于是,有的人埋怨今天的知识分子们没出息,不争气！是我们真的没出息,不争气吗？不是。我们把大师是当作一个政绩工程呢,还是当作一个历史产物？最根本的还是人文环境的建设,从来都是先有健康多元的人文空间,才会折射出大师的光辉。不要埋怨知识分

子没能为国争光，多去检讨自己的文化建设，恐怕最为现实。

这本书取名《远去的大师》，这里的“远和近”，其实是“生与死”，他们的身影离世俗越来越远，但是离我们的心灵越来越近，有一种东西能够跨越生死，纵横历史，那就是大师的思想，2000年前的德谟克利特认为，思想来自人体之外，就像原子轰击大脑。别再只是关注大师们的奇闻趣事、家庭生活和隐私故事，了解他们到底是怎样思考的，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请停止做作扭捏的追思，放下宗教般的虔诚，轰击我们大脑的不是任何一种形式，而是他们深刻的思考。

裴钰　2008年9月16日于北京家中

目录

序一 …………………………………………… (1)
序二 …………………………………………… (1)
第一辑　守望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 ……… (1)
1. 张岱年：直道而行的哲学家、国学大师 …………………………………… (3)
2. 启　功："文衡史鉴尽菁华"的国学大师 ………………………………… (21)
3. 钱仲联："清诗功臣"、国学大师 …… (40)
4. 张中行：布衣作家、国学大师 ……… (60)

第二辑　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大师 ……… (79)
1. 薛暮桥：政学双栖的经济学大师 …… (81)
2. 董辅礽："守身为大"的一代经济学大师 ……………………………… (102)

第三辑　终极关怀的人文社会学大师 … (121)
1. 巴金：永在的青年和真——一代文学巨匠 ……………… (123)

2. 费孝通: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人生
道路
——诚挚追悼一代宗师费孝通教授
的仙逝和几点个人思考
…………………………… (144)
3. 钟敬文:对民俗学之父的思念与反思
——兼论“五四之子”和“农村民俗学”
的概念对钟敬文的人生与学说
的价值 ……………………… (169)

第四辑 引领未来的科学大师 ………… (185)
**1. 陈省身:现代最著名国际数学大师的
强国梦 ……………………………… (187)**
2. 王 选:当代毕昇、IT大师………… (205)
3. 黄 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 … (227)

第一辑
守望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








张岱年 （1909～2003）

张老终其一生不愧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伦理学家；他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是学界公认的大师。张老又是当今中国学界公认的人师经师，集道德文章于一身。他做人是我们的典范，做学问是我们的楷模。

——魏英敏 北京大学教授

敦厚笃实，好学深思；综合创新，会通中西；
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淡泊明志，自强不息；
明哲仁寿，一代宗师！

——钟肇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岱年：直道而研的哲学家、国学大师

刘宇聪

这首平实而意味深远的小诗，是献给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的。张岱年，字季同，别名宇同，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2004年4月24日凌晨2时50分，张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律衰竭，经救治无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第三医院逝世，享年95岁。一位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又离我们而去，留给伤间无尽的遗憾与哀思……

一、"人贵自立"

1909年5月23日（清朝宣统元年四月初五），正值初夏时节，翰林院编修张濂在北京西城的宅第内，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不难想见，这个书香之家为了新生命的到来自然平添了不少欢乐；但喜出望外的张濂又何曾想到，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级大师的哲学家——张岱年。

张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祖籍直隶献县小垛庄（今属河北沧州），而立之年后中进士，在入翰林院任编修前曾入进士馆肄习法政。民国肇基后，张濂曾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还曾先后出

任河北沙河、枣强两县的县知事(即县长)。然而,张岱年的童年并不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3岁时即随母亲赵氏回籍乡居,并且在学塾接受了早期启蒙教育。他母亲不仅要主持、料理家务,还要养育、教导几个子女。母亲最常对他们说的,就是“要努力向上,做个好人”。张岱年晚年曾回忆道,正是在母亲这样的教导之下,他“努力读书学习,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对于世俗的娱乐如听戏打牌等亦无所好”。

张岱年10岁时,母亲不幸罹病去死,其父回乡料理丧事毕,即举家搬往北京,居住在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的一座四合院中。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的长兄就是现代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张崧年(字申府,以字行)。那时,年长张岱年16岁的张申府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后由李大钊推荐赴法国留学,曾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和中共早期建党活动。张岱年和他的二兄张崇年来京后,即是在张申府的安排下进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习的。张岱年曾说过:“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后来我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申府的影响。”足见长兄对他走上学术道路的影响之深。

张岱年深受家庭的影响,更体现于他对父亲张濂教诲的遵从。张濂虽从不过问子女的学业,但对于他们做人的态度却十分重视。他曾专门为张岱年所居住的南屋题写一副对联:“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以勉励其志。张岱年对此印象极深,直至晚年仍清楚地记得。当然,他不仅是念念不忘,更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父亲“人贵自立”的教诲。逾90岁时所作的《做人要有人的自觉》一文中,张岱年写道:“人格独立,即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做一个人,就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可

见，在他看来，“自立”不仅是要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气质，更是要通过“自立”来实现自身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的价值。因此，与其说张岱年青少年时代在学习上崭露头角是得益于家学熏陶所打下的良好的学问基础，更不如说是源自于“人贵自立”的精神。

张岱年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从高小毕业后，先后入北师大附中读初中和高中。早在初中二年级时，他便初读《老子》，如坠五里雾中，后又读《新解老》，于是忽有所悟，又读了《哲学概论》等书，虽还谈不上初窥门径，但对于哲学已经有所领会了。此后，张岱年开始对“天地万物之本原”、“人生理想之归趋”等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甚至“每天晚上经常沉思一二个小时，养成致思的习惯”。1926年初中毕业时，他就在“终生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强中国，改造社会”的宏愿，显示出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朴素情感。高中一年级时他在作文课中写了《评韩》一文，国文老师阅后甚为称赞说，“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亦不过如此”，将此文推荐刊登在《师大附中月刊》上。1928年，张岱年考入了著名的清华大学，但因该校规定学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于是改考北平师范大学。当时的北师大比较自由，颇合张岱年的心意，遂于1928年10月入教育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张岱年对教育学兴趣不大，却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他便发表了多篇哲学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931年，年仅22岁的张岱年即参与了胡适和梁启超掀起的关于孔子、老子年代问题的大辩论，出手不凡。1932年，张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张岱年有机会在其上发表一些学术文章，引起学术界关注。经其兄引介，张岱年结识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哲学界前辈。他虚心向他们请教，深得

这些前辈的赏识和称赞。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生动地描写道:“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从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

1933年,张岱年从师大毕业即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课程。当时的哲学概论都是讲西方哲学,所以他讲的也是西方哲学的哲学概论。张岱年曾说过,“我早年从北师大刚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当助教。这是很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所以我很感谢冯先生和金先生。”

二、“修辞立其诚”

自从迈上了学术道路后,张岱年的学术造诣就始终为人所称道。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作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有趣的是,张岱年自称“行文喜简,不习繁缛之词”,但却一生笔耕不辍,将他卓尔不群的智慧凝结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在张岱年所有的文章论著中,都可见一“诚”字。正如他自己所言:“‘修辞立其诚’是我的治学宗旨。”

“修辞立其诚”出于传统文化经典《周易》,冯友兰先生亦如此评价:“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学,二曰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修辞立其诚”乃冯老“所窥测而得者”,这样的评价对张岱年的治学而言,再恰当不过了。

当张岱年还在求学之时，即发表了不少包含他个人早期的哲学观点的文章，引起了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等的密切关注。20 世纪 20—30 年代，时值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的多事之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日寇迫近，东北、华北的国土逐年沦丧，身为热血青年的张岱年深感"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岱年将自己潜心研究和认真思考的所得，凝结为《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一篇篇优秀的哲学论文。在这些署名"季同"发表的文章中，他阐发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试图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而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1933 年，《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者特记》对张岱年的文章大加赞赏，并希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并高度评价道，"更宜信：有做出这等文字的青年，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

初到清华任教的张岱年，就住在北京辟才胡同二条二号。就是在这不起眼的小院中，未及而立的张岱年以惊人的辨识、分析和梳理能力，把中国几千年来关于宇宙人生的浩瀚思想分别以"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这三大系统加以整理归纳，写成了一部数十万字的里程碑式的巨作——《中国哲学大纲》，他青年时代的思想第一次全面得以凝聚和升华。该书一改以人物编年为序的写法，而采取以哲学问题和范畴为纲的横向写法，耗费了张岱年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

“部类之分别，问题之厘别，处处须大费斟酌。尤其是事属草创，困难就更多”。然而，正是秉持着“修辞立其诚”的信念，现代中国第一部从逻辑分析和辩证方法撰写的气势恢弘、结构严谨的中国哲学范畴史，于在这重重困难之中诞生了。正如曹聚仁先生曾评价的那样，“宇同（即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其成就不在冯友兰先生之下。”也无怪乎其长兄张申府在一篇文章中把他与钱钟书并称为“国宝”了。此书写成后，经冯友兰、张荫麟两位学界巨擘审阅而推荐给商务印书馆，但因抗战爆发而未果，后一拖再拖，直至建国后才出版。

1937年北平沦陷后，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他从此深居简出，靠往日的积蓄和微薄的家产清苦度日，拒不与敌伪合作，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和个人节操。在极为艰窘的生活条件下，张岱年仍然坚持学术研究，但由于长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后来不得不中辍。然而，“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张岱年的主要学术思想正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他晚年时在《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一文中总结道：“我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思考了一些哲学理论问题，写过一些论著；50年代之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讨，光阴迅速，匆匆几十年过去了，但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由此不难看出，张岱年一生的很多重要哲学观点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就已经基本形成了。

1943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聘请张岱年到哲学教育系任讲师，次年改任副教授，讲授“中国哲学概论”，这是与在清华所教的西方哲学的哲学概论不同的中国哲学概论。抗战胜利，冯友兰先生从昆明写信给张岱年先生，说清华要回来

复校，望张先生仍回清华任教。1946年张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和“孔孟哲学”三门课程。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后任教授，直至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被调往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20世纪40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岱年先生又陆续写成代表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统称为《天人五论》。可以说，他的哲学思想也大体成熟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虽然还不能尽善尽美，但这种融古今东西于一体的思路的确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张岱年一生治学，贯彻一个“诚”字。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他即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在20世纪40年代，他又提出把“求真之诚”作为哲学修养之基础。在为《事理论》所作的自序中，张岱年说，“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

三、“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木讷近仁”是冯友兰先生借《论语》之语对张岱年一生品行的概括。众所周知，“仁”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最为重要的思想内核，儒家之学实际上就是以求“仁”为核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儒学也可以概括为“仁学”。“刚毅木讷”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品德的坚强与行为的果敢，也可视为一种严格自律的人格高标，带有坚毅向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评价出自深谙传统儒家文化的冯友兰先生之口，无怪乎有人说：“冯友兰先生阅人多矣，其品藻人物，认为岱年先生是‘刚毅木讷近仁’，可谓不易之论。”其实，季羡林先生也对张岱年的为人“心仪已久”，称赞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

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冯友兰先生“刚毅木讷近仁”之语的最好注解。

张岱年曾说：“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经过5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1979年才改正”，“可惜从50岁到70岁什么工作也不许做，20年里光阴虚度。”之所以会遭到这样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正是因为张岱年是一位“刚毅木讷”的人；但也正是因为具有“刚毅木讷”的精神，才使他得以度过这极端困难的人生逆境。

在20年的时间里，张岱年不但要忍受远离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的痛苦，而且还被得忍受精神上的煎熬。1956年他响应给党组织提意见的号召，在教研室的小组会上提了不到15分钟的意见，希望以后不要搞运动了，但却被错划成“右派”，又在批判会上被强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以至在数年中都无法再参加教学工作，也不可以发表文章，一度还被下放劳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岱年的处境更加困难，被迫参加各种运动、被红卫兵抄家、被下放劳动锻炼。但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昔日的不少朋友、熟人疏离冷漠，甚至有些同事、学生还要落井下石，以种种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辞对他进行攻击和污蔑。而这样的所谓“批判文章”，张岱年也从不看。

张岱年不是没有想到过以死抗争，但在那样的年月里，自杀非但不会还自己以清白之身，还会被冠上“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而且无助的妻子、年幼的孩子有该如何呢？所以，他惟有默默地忍辱负重。张岱年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孟子，这时，他常常默诵孟子的话语。孟子高标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气，给了他在绝境中活下来的勇气。”

生性顽强、胸襟开阔的张岱年，在遭受苦难时不但以自强

不息的信念不断自勉，而且还不会将自己的委屈挫折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不休。宇宙的浩瀚无形，哲学家的睿智和超脱，使身处逆境的张岱年反倒心境开阔，超身境外。这可以从1969年9月他在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回忆可以看出：

> 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岱年也终于在1979年得到精神上的解放。此时，蕴藏了20年的思绪和力量，都似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仅仅7年的时间，张岱年就撰写了多达200余万字的论文，进入他人生第二次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对于一位年届古稀的老人而言，这数以百万计的凝结着非凡智慧的文字中，饱含了多么惊人的毅力和的恒心啊！

“刚毅木讷”的品行，不仅是在挫折和磨难才得以体现，而且还会在日常接触中被周围的人所感受。范学德在《张岱年的风范》一文中曾回忆说：

> 不久后我给先生送稿费，又进了他的“蜗牛居”。先生说这份稿费他不能收下，因为是我和范鹏整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收下。我们怎能收！但先生坚持必须收下，至少

要收下一半。我们别不过先生，只好全收下了。我握在手中的不是几十元钱，而是一个仁厚的长者对后生学子的一颗爱心。先生淡泊于利，也淡泊于名。他的文集中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他担任主编、和别人合写的书，他一概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和他一起写的文章，他也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看法很简单，"那不是我写的"。

"那不是我写的"，说得多么好啊！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语，但人们还是能从中清楚地体会到张岱年一生所坚持的"刚毅木讷"的可贵精神！他在晚年自号"渠山拙叟"（"渠"即张载，"山"乃王船山），并以"直道而行"示其一生立身之则，又说"'修辞立其诚'是我的治学宗旨"无一不是"刚毅木讷"的体现。

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岱年很喜爱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晚年曾经有人请他题字，希望能够题"您认为最有意义的座右铭"，他不假思索，当即挥毫写下这段话。其实，"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名言，也正是张岱年晚年更明确地提出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论的真实心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岱年力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会通中西古今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张岱年一生都在重新理解和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

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其实，所谓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论就是指：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大国自居，以高明自居，走复归中国古代文化的老路，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丧失自己民族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他不同意以中学、西学分文化之“体”、“用”，而主张发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以“今中”为体，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超越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还常引古语“国有与立”，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五千余年历史而延续不绝，必定有其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他在给张岂之先生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我们不是复古主义者，也不是新儒家，但传统哲学中的精粹思想，至今仍能发放真理的光辉，对于正人心、移风易俗确有助益。”

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传统简论》一书中，他把这个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具体而言，“自强不息”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进取、不甘落后、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拼搏奋斗精神，“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爱好和平、容纳众物的博大宽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以称为“中华精神”。他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没有产生实证科学和民主政体，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缺

陷，这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的原因。但中华民族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其基本精神起了作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就是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为什么要注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探讨呢？张岱年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

> 一个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知之甚少的人，在精神上便缺乏一种归属感；一个对自己的传统不懂得继承发扬的民族，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一个中国人，确实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弘扬我们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创造中国文化的新形态，是我们当代人的庄严任务。

他甚至将自己一生的致思追求集中概括为“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学习西方文化先进成就；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足见他对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实现自己晚年的宏愿，张岱年还坚持抱病授课，精心培养了十多名哲学硕士和博士，而受其教益、奖掖的后学当以百千数，并且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1989～1994年，清华大学陆续出版《张岱年文集》六卷本，其中后两卷一百多万字为张先生在1978～1989年的主要论著；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岱年全集》八卷本，后两卷主要是他1989年以后的论著。直到张岱年逝世，还有他未及看到的《文化与价值》一书出版。真可谓是生命不息，著述不止。

五、“See you tomorrow”

张岱年曾这样表达自己的爱情观：

> 我认为爱情首先是专一，你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否

则要闹矛盾。一个人的一生主要精力应放在学问和事业上。”又说：“老伴对我帮助很大，我写起文章来什么也不管，生活全靠老伴来维持。她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完全可以写文章和做学问。可她却为我放弃了。为我牺牲了一切。

可见，一直以来支撑着张岱年战胜命运、步入辉煌，是他的夫人冯让兰女士真诚的爱和无私的奉献。

冯让兰是冯友兰先生的堂妹，和张岱年同岁，他们的相识归功于张申府和冯友兰。这两人同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很方便地为各自的弟、妹牵了线。张岱年与冯让兰第一次见面是在冯家。张申府带着张岱年去的，先是张氏兄弟与冯友兰坐在客厅里喝茶谈话，后来冯让兰也出来坐在门边上，于是就一起谈起来。后来张岱年的儿媳曾问过他第一次看见冯让兰的感觉，他说，“很漂亮。”当被追问“还有什么感觉”时，他就说，“别的就没了。”但脸上却不由自主地微微漾出了笑颜。而当冯让兰被晚辈问起对张岱年的第一印象时，她朗声笑了：“不错呀，人挺白的，挺高的。”1932 年，冯让兰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两年后回到北京。因为那时张岱年的父亲不幸逝世，大家庭解体了。忧伤袭来，张岱年实在支持不住了，干脆辞去清华教职，住在城内北京图书馆宿舍，用读书来排遣忧思。在冯让兰的悉心照料下，张岱年的身体和精神恢复得很快，两人也于同年结婚。

张岱年与冯让兰是在 1934 年结婚的，排场并不算大，但“级别”却并不低。当时的清华有几所较高档的房子，一套是甲所，校长梅贻琦居住，另外几套在乙所，冯友兰家住一套。张岱年与冯让兰的婚礼在乙所冯家举行。男方的家长代表是张申府，女方的家长由冯友兰代表，证婚人是梅贻琦，还有当时的不

少名人参加。

张岱年的儿媳回忆道：

> 这一点上我还是佩服极了两位老人，能上能下，安贫乐道，宠辱不惊。而且，如果要总结我对他们性格特点的最大感受的话，惟有两个字——从容。这种从容是一种心态，而非仅仅表现为行为，它来自无欲无求的单纯。我很向往这种心态，但发现自己学不大来——他们对生活太缺少要求了。

其实，两位老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确实不高。范学德曾用"震惊"来形容第一次见到张岱年家书房时的感受："先生的书房小到了转不开身的地步……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位学术泰斗的居住环境如此寒酸，而这还是在北大，还是在'文革'已经结束了十多年。但先生似乎对此已经无所谓了，或者无可奈何了，他只想抓紧有限的时光，多写几本书、几篇文章。"张岱年一件蓝色的呢子大衣，穿得颜色都已经发白都不舍得丢弃，而一张书桌一用就是几十年。在吃饭方面，张岱年和冯让兰几乎没有要求，用儿媳的话说，应该是"对口味极不考究但极其讲究营养和卫生，大吃胡萝卜、白薯、玉米、豆类以及芹菜。"在张岱年家可以见到"世界上最奇异的菜谱"，即用油烹一下全部上述植物及纯瘦肉，略加酱油煮成一锅，一日三餐皆是如此。他们的儿子张尊超对此的说法是："妈做的饭越来越像中药了。"冯让兰对这个评价十分欣赏，依旧乐此不疲。

2003年底，冯让兰不慎摔伤，不得不卧床修养。此后，张岱年每天都要坐在她的床边陪伴。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要握握老伴的手，对她说"See you tomorrow"。一次很晚了，儿子张尊超劝张岱年去睡，他坚持要去老伴的房间，并说，"我还没和你妈道别呢！"有几次，冯让兰的病情发生变化，张岱年便忧心忡忡、

焦虑不安。每次见到儿子和儿媳回来,第一句话就迫不及待地诉说,“你妈一天都没睁眼”或“你妈一天都在昏睡”。孩子们也从这样的表情中感到了张岱年的无奈和无助。

“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这简单的一句问候语,却包含着两人几十年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的真挚爱情。张岱年所希望的,又岂止是“明天见”,更是与老伴“天天见”。张岱年去世时,冯让兰仍卧病在床,并不知道这一噩耗。更令人唏嘘感叹的是,在丈夫遗体火化之际,冯让兰也在家中病逝,这对互相关爱、扶持坐过了共同人生道路的伉俪,竟并驾西行了,前后不过一周的时间……

张岱年的得意弟子李存山做诗悼念恩师:

> 九五之尊逝三哲,泰山梁柱哭如何!道通天人传万世,思接古今汇千河。中年谠言而获罪,晚岁刚健以彰德。不欲自违其所信,渠山拙叟气巍峨。

这首诗可算得是张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也可见学生对他的深切缅怀。也正如与他相知甚深的冯友兰先生所言,“张先生之学生有习篆刻者,欲治一闲章以相赠,请示印文,张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

张岱年晚年曾在一次访谈中讲过,他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即“第一,要坚持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不屈从于他人;第二,要有社会责任心,对社会,对民族,对中国,要尽一定责任、义务。”张岱年的一生的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始终坚持“直道而行”。然而,“直道而行”又谈何容易?而今斯人已去,我们这些后继之人又当如何“直道而行”……

张岱年小传

张岱年，生于1909年5月23日，原籍河北省沧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44年任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哲教系讲师，1945年转副教授，1946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50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授，195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离休。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及哲学理论，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1958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年)，《中国哲学发微》(1962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1982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1983年)，《真与善的探索》(1988年)，《文化与哲学》(1986年)，《中国米理思想研究》(1988年)，《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要论》(1989年)，《张岱年文集》(六卷)，《张岱年全集》(八卷)等。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他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国学大师，他终生勤勉，致思学问，造福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堪称一代学人楷模。

主要征引书目、篇目

1. 张岱年:《耄年忆往——张岱年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 张岱年:《直道而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3. 张岱年:《晚思集:张岱年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

4. 刘鄂培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版。

5. 刘鄂培、衷尔钜编:《张岱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6. 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7. 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8. 李淑珍:《综合创新 一代宗师——张岱年教授的学术生涯》,《北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

9. 田然:《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文史哲》1995 年第 4 期。

10. 吴荣荃:《励志民族复兴,耄年致思不已——访张岱年先生》,《科学·经济·社会》1998 年第 4 期。



启功　(1912～2005)

启功先生是中国学术界、书画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

——冯其庸　著名红学家

评书画，论诗文，一代宗师；
承于古，创于今，永垂鸿业标青史。
从辅仁，到师大，两朝元老；
学为师，行为范，不息青衿仰令仪。

——赵仁珪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启功："文衡史鉴尽菁华"的国学大师

宋志艳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是1978年启功先生66岁时，自撰的著名《墓志铭》，字里行间充满诙谐幽默和自我调侃的意味。27年后的2005年6月30日，这位国学大师、睿智的老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于他的逝世，许多人都扼腕叹息，又一个大师离我们远去。启功的生前挚友、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沉痛地说：

启功先生是中国学术界、书画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

启功，1912年生于北京，是我国公认的当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和诗人，有诗、书、画"三绝"之称。尽名满天下，然启功先生却生性旷达洒脱，淡泊名利。他曾经用九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学问，叫做"庞杂寡要，无家可乘焉。"虽自称无家可乘，但其书法却自成一家，被世人公认的著名书法家，此外他还在诗词、绘画和文物鉴定等方面都成就斐然，堪称一代宗师。

一、家道中落　得遇恩师

启功出身皇族，其始祖弘昼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和乾隆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弟兄。由于宫廷内部的权利纷争，自始祖之后，这一支系的爵位被逐代降低，到了启功曾祖父这一代，受封爵位所得的俸禄都难以养家糊口。之后，启功的祖辈被迫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依靠自己的努力谋取了一份功名。因此，很多关注启功的皇族身份的人，并称其为爱新觉罗·启功，然而启功先生却从不以皇族出身自居。他说自己从未姓过爱新觉罗，“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弟子，靠自己的本领谋生”。他在自己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也从不题写爱新觉罗字样。

启功刚满一周岁时，父亲因肺病不幸去世，他不得不便随曾祖父和祖父一起生活。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启功自幼就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祖父毓隆对书法和绘画都有很深的造诣，经常让他看着自己画画。后来启功回忆起祖父时说到：

> 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

启功一直保存着祖父的墨迹，这些书法绘画作品，使启功从小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着迷。然而不幸的是，1922年就在启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位亲人

也先后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寡母孤儿及未出嫁的姑姑，使启功生活举步维艰。

1924年，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启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在15岁到18岁之间，启功曾先后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贾老师不仅博通画史，而且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见解卓识。他经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边看边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多了让他多学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吴先生教授画法极为耐心，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为重要的窍门指出。在名家名画的熏陶中，启功的书法绘画水平大有长进，也锻炼了其在书画鉴定上的眼力。1930年，18岁的启功先生又经一位世交好友的介绍，师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由于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代起，启功便打下了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基础。

1933年，21岁的启功中学尚未毕业，其在书法和绘画上已经显示出深厚的功力。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他却因为家境贫困辍学了。就在他急于寻找职业来维持全家生活的时候，曾祖父的门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傅增湘，得知这一消息，便带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

当傅增湘把启功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给陈垣看，陈垣看过后认为其"写作俱佳"，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很有水平的年轻人。从此，启功就遇到了一位精心培育并影响其终生的恩师，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陈垣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启功就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

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被其辞退。

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物价飞涨，已经失业的启功只得以出卖字画和做家教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陈垣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把他召到了自己的身边，他深信启功是位真才实学的青年，并且直接让他来教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从此以后启功先生再也没有离开神圣的教育岗位，直至终老。

启功先生曾经多次说过，此生有两个恩人，其中之一就是陈垣校长。陈垣对他情谊之纯、之真、之深，使启功终生难忘。他曾动情地回忆道：“我从 21 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四十年。”为了却报答师恩的夙愿，1990年已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次年，在陈垣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他用这些书画在香港义卖所得的 163 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是因为老校长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陈垣久居此屋，励耘书屋由此得名。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

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

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二、诗书画鉴　成就斐然

启功先生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深有研究。其在书画、诗词和鉴定等诸多领域均达到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启功先生自幼便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一样，悬腕运笔总是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

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恩师陈垣也曾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这些事情对他刺激较大，也促使启功先生立志勤奋练字，其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陈垣看后又加指点："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悟性过人的他由此深得其理，后来便提出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名言。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多年探索再三揣摩，启功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字的重心聚集处并不是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处的四角处，从而得出了楷书（又叫真书）的结字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合乎黄金分割即黄金率。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就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此后，在总结出真书结字黄金律的基础上，他又反复研究，发现汉字结构具有"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产生置疑。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把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

作为当代名扬海内外的书法家，启功不受流派戒律束缚，其书法自成一家，被人们奉为启体。他认为，学写字首先要敢于不受自古以来各流派清规戒律的束缚。比方说，笔只能怎么拿，腕只能怎么用，这是很害人的。"其次"向古人学习也不一定死学某一家、某一派。我幼年时学祖父和上辈成亲王的，后来又学过赵孟頫、董其昌、米芾，再后来学二王、颜真卿、欧阳询及

唐人写经，十年动乱期间学柳公权。这样兼收并蓄，经过消化，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正是注意博采众家之长，启功的书法才达到既有深厚传统，又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境界。

当然，启功先生书法成就既来自天分，更来自勤奋。他临习了大量碑帖，积淀了深厚的功底，并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味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构，遒劲有力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书法界对他的作品评价极高，认为其作品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先生不仅书法作品自成一家，其对书法理论也有独到研究。他曾对许多著名碑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辨，写下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对书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所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以 100 篇一诗一文的形式，系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在书法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见解独到。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的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他认为：书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既有文化交流的实用价值，又是一门独放异彩、具有欣赏价值的民族艺术和文字艺术。

启功先生又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画特点的画家，他的画中多有题诗，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堪称完璧。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启功先生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其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韵味悠长，尤擅长山水竹石，极富传统文人画的意趣。启功

早年多作山水，尤喜拟米元章、文衡山笔意。20世纪30－40年代，他的作品已在画坛崭露头角，他也曾作画卖钱，以贴补生活，以至不少绘画作品流入社会。50年代，启功先生在绘画水平上达到艺术高峰。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潜心习书画的好好先生启功也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他对绘画事业的热情，再加之当时提倡要巩固专业思想，于是只得封笔，而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启功先生才重执画笔。他常作兰、竹，构图平中寓奇，以书法之笔入画，清劲秀润，明净无尘。有专家评论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在中南海、全国政协、中央文史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处都收藏有他的书画佳作。此外，启功还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及国际文化事业的交流绘画了不少作品。他为第一届教师节绘制的大幅松石图，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镇校之宝。后来启功眼疾加重，作画十分困难，画作更显珍贵。为表彰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杰出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当代旧体诗诗人，他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书画作品等抒发情感、进行评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他熟练地运用古典诗词的体式，同时又不落古人的窠臼，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密切贴近现实生活。他的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专家们评论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语词、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诗词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的诗词作品集有《启功韵

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之后这三本诗集又合订为《启功丛稿·诗词卷》及《启功韵语集》。

启功先生以艺术家的情怀和科学家的精妙及天才的灵性把诗同书画熔为一炉，全面实现了书画艺术的主题创作。他的书法作品，很多是书写自作诗词的，而他的画作，均有自己诗词佳句的题跋。诗、书、画在同一幅作品中展现，达到了和谐统一。观其画，赏其书，吟其诗，使人神舒意畅，回味无穷，再次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古人称这类作品为“三绝”，而启功先生堪称是当代“三绝”之冠。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专家，他对古代的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文物鉴定特别是书画鉴定，成为他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领域之一。他在鉴定方面有许多过人之处。首先，他知识面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而广博的研究，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又熟谙典故，加之自身具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其次，他熟悉与书画相关的各种知识，又有多年书法绘画的实践经验，深谙其中的艺术规律及基本技法，见多识广，从而能够达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境界。最后，他擅长文献考据，懂得驾驭文献信息的方法，一旦发现相关问题，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辨，实现艺术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完美结合。由于启功先生属于学者型和艺术家型相结合的鉴定家，因而在鉴定文物时总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方面考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另外，启功先生还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学者。他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且过目不忘，直到老年还能准确说出某事出自某书某章。作为一位知名学者，他治学有如下特点：一曰博通。他学识广博，可谓诸子百家

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其治学领域宽阔，对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等学科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他常戏称自己为“杂货铺”，实际上是博学多闻，而且还善于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二曰专精。启功先生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中，写下了很多重要论著。他的著作不仅论证扎实严谨，而且处处显示出自己独辟蹊径的聪明才智，常能发别人所未发，道别人所未道，凸现出高超的专业见解。比如，启功先生50年代撰写的《读红楼梦札记》和程乙本《红楼梦注释》，至今仍是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60年代写就的《古代字体论稿》将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是关于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论著。60年代的《诗文声律论稿》以简驭繁，是研究诗文声律的扛鼎之作。80年代的《汉语现象论丛》一书对中国古典语言，特别是诗词语言，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先生对几乎近于绝迹的八股文也进行了专门研究，所著的《说八股》对八股文的特点和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2004年出版的《启功讲学录》虽然是学生的整理稿，但却集中体现了启功先生博雅通学的学术特点。而累时多年的《启功丛稿》，更是其学术集大成之作，其中有关碑帖、艺术的考辨文章，更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道其万一。三曰通俗。现在很多人的书写得莫测高深，让人不忍卒读。可是启功的学术文章及其他作品，写得却都很平实、直白、口语化，即使是这些领域的门外汉也能大致领会其中的意旨。用他自己的话说文章写出来就是给人看的，给人看就要让人看得明白。如果文章写得谁都看不明白，那么学问再大又有什么用？也有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学问，却故弄玄虚，玩弄新名词、新术语，把文章写得诘屈聱牙，借以掩盖自己思想的苍白。的确，在读启功先生的文章时，我们感到亲切自然，如沐春风，有时不禁为先生的幽

默风趣哑然失笑，为他的巧妙比喻拍案叫绝，为他文字的通俗易懂钦佩不已。读者就是在这样轻松愉悦的心境下，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很多深刻的理论和知识，却丝毫不觉得有说教之嫌、枯燥乏味之感。做学问固然不容易，但是能像启功先生那样，把学问做的让普通人明白更是难乎其难。

启功先生在上述诸多领域所取得的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就，为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大量题字和题词，都昭示了他的卓越成就，令我们不得不钦佩其学问之博大精深，敬仰其大家之风范。

三、坚净人生　行为世范

启功先生在艺术和学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是分不开的。“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首砚铭道出了其做人的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启功另一方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不仅是他书法风格的生动描述，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鲜明写照。

启功为人善良、诚恳、注重情谊，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对师长至敬，知恩图报，谈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言必称陈垣校长的恩情，对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尽其所能地予以回报；他对朋友至诚，能向他们敞开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与他们保持纯洁的友情；他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悉心教诲，他常说自己就是在别人的热心帮助和师长的殷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启功先生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赵仁珪教授曾经对人说：“先生从不摆名人架子，尊重一切人。”而先生的另一位学生李山则以“仰之弥高”来表达对恩师的崇敬之情。

启功先生性格洒脱，心胸超旷。他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利

益，更不计较钱财，对于这些身外之物总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每遇人生坎坷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能积极向前看，从不怨天尤人。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启功莫名其妙地被凑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在随后而来的“文革”中，他又成了一名被审查和改造的对象，不过那时他还有部分自由，就是可以为造反派抄大字报，但是他自己也未曾想到，这却让他练成了独特的“启体书法”，而他把这称为“大字报体”。除了写大字报，启功还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他还被安排打扫厕所，但是就是做这样的事，他也是十分超然。“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心胸之宽广令人感佩。

启功言谈风趣，应对机敏，出语幽默，喜开玩笑，凡与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他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之作颇多，还真有几家铺店专卖这种“作品”。启功听说此事，有一次会后路经此店，便进去一件一件地细看。有人特地走近他身旁问道：“启老，这字是您写的吗？”他微微一笑答道：“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紧接着启功改口说：“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这是看得起我。再者此人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他在家养病时，曾写一个字条贴在门上以谢客，上书：“熊猫病了”，让你吃了闭门羹，却仍不免莞尔一笑。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

'胡言'……"如此见面语,立刻活跃了会场气氛。

启功先生淡泊名利,一生情系教育。他有着许多光辉的头衔: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等。他还担任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可谓一代著名"杂家"。尽管涉猎广泛,也被人尊称为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文物鉴定大师,但这些都被启功看来都是副业,他的主业是教书育人。作为辅仁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朝元老,启功先生堪称我国资深的教育家。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1935年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1952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启功先生已从事教育事业72年,从事高等教育70年。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校园中度过的,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他一贯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再用这些经验,去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启功讲课如同写文章一样,十分注意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如讲到诗歌格律时,他亲手绘制了律诗平仄图表,便于学生掌握其规律。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果,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随时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启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京市职业道德明星",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之际,启功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蕴含着精辟的教育理念,受到国家领导人和许多院校的好评,并成为全国许多师范院校办学的指导思想。而这两句话也正是启功先生从教70多年来,醉心教育事业,始终

保持高尚道德情操的生动总结。

四、姐弟婚恋　至真情谊

在启功先生心中，有一个使其终生难忘的人，她就是启功的妻子章宝琛。他多次对人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尽管如旧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启功没有经历自由恋爱，而是奉母命成亲，属于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然而他们夫妻感情甚笃，其婚姻生活虽简单却纯净，虽平凡却真诚。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1岁时，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他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想法，便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有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的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我也就放心了。"启功是个孝子，母命难违，他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母亲为启功看中的姑娘名叫章宝琛，长启功两岁。她个子矮小，相貌端庄。由于生母早丧，父亲续弦，继母对她非常刻薄严厉，她从小吃了不少苦，就连出嫁还要带上相依为命的弟弟。经过几次见面后，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尽管是母亲包办的婚姻，但夫妻婚后感情十分融洽。随着一起生活年岁日增，启功渐渐地发现自己找到了名副其实的贤妻，一位难得的知己。章宝琛身上有着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善良和贤惠。和启功结婚后，她就承担了全部家务，早晨一起床就默默地干活，把家中的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尽管当时启功家中已没有任何积蓄，而他的薪水又十分微薄，工作非常不稳定，在辅仁几进几出，几乎使他处于半失业的状态。然而对于生活的艰辛，妻子章宝琛并没有半点牢骚和怨言。她自

己省吃俭用,有点好吃的自己从来不舍得吃,总要留给母亲、姑姑和启功。能自己缝制的衣服一定自己动手,以便尽量节省家里的开支。

特别使人感动的事,章宝琛侍奉和婆婆和姑姑至真至孝,耐心地照顾她们的起居,同她们相处得十分融洽。1956年,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先后病重不起,而那时政治气候相当紧张,为了应付政治运动,启功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全靠妻子一个人来照顾,重活脏活都落在她身上。她成年累月地忙碌,身体日益消瘦,启功看在眼中,疼在心里,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愧疚之情。母亲去世后,悲恸中启功想到妻子日夜辛勤侍奉老人,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他就请妻子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姐姐”,给她磕了一个头,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后来,启功在纪念妻子的组诗《痛心篇》用两首最直白,但又是最真切五言绝句表达了启功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感情: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先母抚孤儿,备历辛与苦。得妇喜尝言,似我亲生女。

妻子章宝琛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百般体贴照顾启功,而且在政治上也给予坚定支持。在政治运动不断的五六十年代,启功先是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章宝琛感到不解,也觉得委屈,但却从未埋怨过丈夫,而是下定决心要和他共度难关。她还劝慰启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放宽心保重身体。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而她却不惧高压和危险,巧妙地把启功旧作的封面撕下卷成一卷,和其他东西裹在一起,躲过浩劫,使启功的大部分手稿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受此启发,启

功也偷偷地用蝇头小楷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起草的《诗文声律论稿》抄在最薄的油纸上，一旦形势突变，就把它卷成最小的纸卷藏起来，使之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当启功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妻子的勇敢机智，启功的这些宝贝早就化为灰烬了。章宝琛和启功一路搀扶走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夫妻恩爱无比。正如启老后来写到的：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1975年，章宝琛旧病复发，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启功白天工作，晚上赶去医院，在病床旁搭几把椅子，睡在妻子旁边，这样过了三个多月。在这病榻上两人戏言身后事。章宝琛认为她死后，丈夫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再娶一个老伴，启功则确信他不会再续弦，并立下“赌赢”誓言。妻子去世后，确实有许多人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自荐，都被他一一婉言谢绝。他甚至还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以示自己坚决不再续弦之志。在一首纪念妻子的诗中，启老写道：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长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在医院养病期间，有一天，病榻上的启功突然失笑，旁边照顾他的人很纳闷，他就讲了与妻子打赌的事，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还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老妻昔日与我戏言身后况，自称她死一定有人为我找对象。我笑老朽如斯那会有人傻且疯，妻言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诗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相濡以沫，共同患难四十年。他视老伴为自己的恩人，对妻子始终有一种“她没有跟我过上一天好日子”的负疚感，这种朴素宽厚的夫妻之情，我们使我们体会到启功先生坚贞不渝的个人情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005年6月3日2时25分，那个被唤“国宝”的老头儿走了，却留下了我们永远的思念和无穷的财富。评书画，论诗文，一代宗师；承于古，创于今，永垂鸿业标青史。从辅仁，到师大，两朝元老；学为师，行为范，不息青衿仰令仪。他孜孜不倦的求学历程，成名后的谦和率真，又让人感慨万千，敬由心生。启老几十年的同事、已故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钟敬文这样夸赞老友：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启功小传

启功，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国学大师。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长期从事文史教学与研究。他自幼爱好书法、绘画和古典诗词，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书画展，有诗、书、画"三绝"之称。

启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辅仁大学附中国文教员，辅仁大学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又曾长期兼事文物鉴定工作，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文献馆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佛教图书文物馆董事、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化组副组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其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和《启功从稿》（三卷本）、《启功韵语》、《说八股》、《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论书札记》、《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主编有：《书法概论》、《中国法贴全集》（共十八卷）等。出版有：《启功书法作品选》、《启功书法选》、《启功草书千字文》、《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画留影册》、《启功三帖集》等。

他多次赴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及举办个展、联展。其作品为世所重，享有盛誉。传略载入多种著名辞书。2001年获中国书协"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及"中国书协成立20周年特别贡献奖"。

主要征引书目篇目

1. 章景怀、赵仁珪记录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

2. 侯刚:《启功画传》,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 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 启功:《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2006年版。

5.《深切怀念启功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特别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侯刚、王晓明二位教授的许多帮助,在此特向二位表示衷心的谢意。



钱仲联 （1908～2003）

现在被尊奉为大师的似已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章培恒　复旦大学教授

在20世纪学术界，钱先生是足可与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钱穆、钱钟书诸家相提并论的国学大师，是“百科全书”式的鸿儒。尤其是在诗学研究方面，其范围之广，难度之高，贡献之大，前无古人，后罕来者。

——刘梦芙　著名诗词评价家

钱仲联：一代诗豪、国学大师

王建明

汉代的辞赋，唐宋的诗词以及清代的诗作，都随着时光的流逝凝聚成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但在古老宁静的苏州古城，却一直有一位老人为这些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力，履行着作为一代名师的责任。他就是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钱仲联。

2003年12月4日12时18分，这位被誉为"一代诗豪"的当代著名国学大师在苏州陨落了。他的去世，更被许多媒体称为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家学"模式的终结。钱仲联在中国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特别是其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等方面。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认为：钱先生是当今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国宝级人物。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也认为：现在被尊奉为大师的似已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一、文化世家的最后一个大家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史，有一道奇特而靓丽的风景，那就是文化世家现象。即文化和学术在同一家族之内长期积累、薪火相传，或父子相承，或叔侄相绍，或祖孙相继，将一个家族逐渐形成的学术优势保持并发扬光大，使后人能够在较高的学术起点上继续发展，因而达到其他家族子弟所不能达到的水平和高

度。这一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又造就了许多渊源深远的文化世家，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一家，曹操、曹丕、曹植"三曹"，杜审言、杜甫祖孙，杜佑、杜牧祖孙，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李格非、李清照父女……近现代也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等。

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一独特文化传承方式中断了，学术文化世家也几不可寻。随着一些国学大师的相继去世，特别是钱仲联这位文化世家的最后一位大家的去世，标志着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的"家学"模式的终结。

1908年出生的钱仲联来自于江苏常熟的一个书香世家，其家族在中国近四百年的文化史上赫赫有名。虽高祖以上皆务农，然至曾祖钱孚威始读书为秀才。其祖父钱振伦，字楞仙，是清朝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女婿，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姐夫。钱振伦与曾国藩为同年，两人在京时曾比邻而居，来往频繁，关系密切。钱振伦后曾担任翰林院编修、四川乡试正考官、国子监司业等职。后来由于丁母忧，他回湖州守孝，不再出仕做官，长期在扬州梅花书院、淮阴崇实书院任山长。作为晚清著名骈文家，钱振伦曾从《全唐文》中选出骈文，编纂成十大册《唐文节抄》，并且著有《示朴斋骈体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他的《示朴斋骈体文》用唐法予以高度评价。另外，钱振伦还在诗学方面注《鲍参军集》，后来钱仲联又著《鲍参军补注》，祖孙同注一书，珠联璧合，堪称文坛佳话。

钱仲联的祖母翁端恩，字璇华，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女、一弟（翁同龢）一侄（翁曾源）先后得中状元。她擅长诗词，乃为一代才女。叶恭绰编《全清词钞》选入其《簪花阁词》；徐世昌编著《晚晴簃诗汇》，亦入选其《簪花阁诗钞》多首佳作。端恩虽出身华胄之家，但自嫁入钱家后，与夫君同甘共苦，一起流寓在外。

直到光绪五年(1879),钱振伦客死苏北,生活无着后,才不得携子归居常熟。从此,钱家就寄居常熟。因为出生于常熟,故里吴兴虽隔太湖相望,而数十年未尝一见,钱仲联故以"梦苕庵"(吴兴有"苕溪")为室名,寓饮水思源,落叶归根之意。而常熟又是其出生和事业的发祥地,数十年人世沧桑,常熟虞山的影子和人文风光在脑中闪现。所以他又以"望虞阁"为室名,表明对第二故乡哺育之恩的难忘之情。

钱仲联之父钱滮,字幼楞,曾同堂叔父钱玄同、堂伯父钱恂一起留学日本,亦很有出息,只可惜由于患病而不得不中途退学回国。钱父一边养病一边教子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后,钱仲联都要在父亲督责下诵读古诗词。

钱滮虽为日本留学生,却不教儿子读日文,偏要他读祖父的藏书,要他抄写祖父的著作稿本,并以此作为课余作业,抄完一部又一部。此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下,使钱仲联在古诗文方面由懵懂无知而逐渐领悟入门。到了晚年他仍然对孩提时候,被父亲课以反复抄诵祖父著作的情景记忆犹新。幼时枯燥的抄诵于潜移默化中勾画了他未来的知识与学术取向,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并为他日后成为现当代著名旧体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学养。

钱仲联舅祖翁同龢为清末大学士,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曾因力荐康梁变法而被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叔伯中享有大名的有钱玄同和钱恂,同辈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钱玄同的儿子)和大翻译家钱稻孙。钱玄同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音韵学家、文学评论家、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钱恂则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官。1890 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利时等国,后又协助张之洞帮办洋务。1898 年任留日学生监督,1905 年再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作为清末著名的外交

家，钱恂著有《中俄界约斠注》七卷（光绪十八年鸿宝斋石印本）、《中外交涉类要表》、《光绪通商综核表》（光绪二十年自刊本）等书。

钱仲联的母亲沈氏，乃清代著名诗人沈汝瑾之妹，虽然没有其婆母那样才华出众，但亦熟悉唐诗、山歌、弹词故事，时学吟唱，讲述给四五岁的儿子听。钱仲联文学的启蒙主要是在母亲怀抱中完成的。他90多岁仍记得母亲唱的《吴歌》："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汤好喝网难扳。"亦记得母亲吟咏的第一首唐诗是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那首名篇。"青灯有味是儿时，童心来复梦中身"，深深在他脑海中留下烙印，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钱母当时也决没有想到，她是在为未来的大学者上了启蒙的第一课。

钱仲联十五六时就读的县师范学校校址，原为翁同龢的锦峰别墅，面临湖甸，烟雨迷茫，背负青山，鸟鸣泉响，水石草树，廊榭池台，花朝月夕，光景如画。深厚的家学渊源、优越的人文环境，秀丽的绿水青山，陶铸了他烂漫的诗才。

几百年的钱氏文化学术的积淀，成为钱仲联必须继承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近代以来的大势却是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与西学、新学的兴盛。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西风已彻底压倒东风，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的日益式微，西方文化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在此种心态下，新一代的"世家子"在面对学术与职业选择时，相当多地转向了政治、科技、实业诸方面，而多样化的选择注定了世家学术文化的断裂。

作为家学传统的受益者的钱玄同等人，在五四运动中所张扬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也就是打倒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学传统。后来，钱三强选择了和与父亲钱玄同、同宗哥哥们不一样的理工科之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益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成为一种不可阻挠的历史潮流。时过境迁之后，当年学者的后人重新整理先人的著述，自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所以就有俞平伯的后人读不通祖上的书，陈寅恪和吴宓之女在整理其先父遗稿有较多错讹，也实在是大势之下的必然结果了。

2003 年 12 月 4 日，96 岁的钱仲联在苏州逝世后，作为最后一代在家庭与私塾内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他的去世一方面标志着江苏钱氏学术文化世家终结，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标志着家学这一文化传承方式彻底的消逝。

二、栽培树木如名节

1923 年，17 岁的钱仲联从常熟县立师范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对其教学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国近代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家、教育家，原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

唐文治，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他从小颖悟，发愤苦学，因家庭贫困，晚上常借月光读书。14 岁读完《论语》、《孟子》和《五经》，16 岁入州学，17 岁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学习，次年又高中举人。此后，他又进南菁书院，在名师黄以周、王先谦的指点下，博览群书，为其以后治学及建业打下了坚实基础。28 岁考中进士后，他先后历任户部江西主事、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农工商部尚书等。

1920 年，56 岁的唐文治辞去南洋校长职务，以几近双目失明之身，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即著名的“无锡国专”)。唐氏为无锡国专确立的办学宗旨是“正人心，救民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战国之世，孟子专崇仁义之训，斥去私利……今世一大战国也，于斯而提倡仁义之说，欲以救心而救国”。为此，唐文治广邀各地名家来校讲学和任教，如请章太炎讲学，请陈石遗、钱基博、周予同、周谷城、朱东润、蔡尚思等授课。因而，后

来该校是一所与清华国学院齐名的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高等学府。

由于唐文治早年出自钱仲联舅祖翁同龢门下,与翁氏有师生之谊,后又曾在翁家处馆。由于这种关系,他对钱仲联更是精心指导、细心栽培。早期无锡国专的教学方式类似旧时书院,主要讲授四书、五经、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学生却可以就性之所近有所选择偏重。当时,大多数学生喜欢考据、文学、做诗填词。正是这个特殊的国学氛围下,传统学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仍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生命力。该校学生大多都成为了当代学术史上的大师,如唐兰、吴其昌、王蘧常、陈钟凡等。

后来钱仲联回忆起到该校时说到:这个大学的教学方法像中国古代的书院,先生指点过后,主要靠学生自己自学,一天上午只上两个小时的课,下午也只上两个小时的课,一天只上四个钟头的课,其余时间自己去看书。此外,该校还特别重视国学基本功的培养。如《文字学》就以《说文》作为教材。历史课也不另编讲义,就讲《史记》、《汉书》。诗歌,则讲授《唐宋诗醇》、《十八家诗钞》之类;古文,则讲授姚鼐《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所选《续编》之类。唐氏教学的一大特点是注重诵读,通过朗诵来表现对于古文辞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则于当时已经双目失明,他上课时必须要用助教。助教朗读一段,他阐述发挥一通。但这样的做法仅限于讲授《论语》、《孟子》之类。讲授古文辞时,即使是长篇巨制,也多由他自己全文背诵。唐文治的示范朗诵,抑扬抗坠,阳刚阴柔之文不同其调。学生们都仿效其读法,每日渊渊金石声充盈天地之间。当然,朗诵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要反复熟诵。在此浓厚的传统文化下,更加激发了钱仲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

此外，唐氏又选派他和王蘧常、唐兰、吴其昌、毕寿颐等人每周一次至苏州曹元弼家学习《仪礼》、《孝经》。钱仲联谈到其恩师时认为：唐文治先生他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先生，他是教理学的，但是他这个人非常开通，为什么非常开通呢？对待学生你喜欢做诗的你就去做诗，你喜欢注解的你就去注解，你喜欢考据的你就去考据。他不来限制你。由于钱仲联当时反复熟读经书，不少诗文名篇至今倒背如流。通过熟诵，才能融会古人的精神于自己的面目中，得心应手地具有写作骈散文、诗词的技巧。

唐文治对学生除教授学问外，尤为重视道德的教育，特别看重人品和文章的关系，注意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注意教师的以身示范。无锡国专的校训中有"栽培树木如名节"这样的话，校内礼堂里悬挂的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的格言。此外，他还在食堂悬挂亲自书写的匾额："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并在校内悬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等联语，激励学生把德育放在首位，作对社会、对时代有用的人。

3 年后，19 岁的钱仲联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作为无锡国专第三届学员中的高材生，他与首届学员王蘧常、二届学员蒋天枢齐名，号称"唐门三鼎甲"。从国专毕业后，他选择了教师作为了自己终身的职业，开始了其全新的人生旅程。其后 7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专、南京中央大学、常熟支塘师范学校，常熟县沙洲中学、扬州行政干部学校、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直至苏州大学。在其漫长坎坷的人生岁月中，唐文治"栽培树木如名节"的话深深地印在了钱仲联的心中，并以此作为他日后几十年教学生涯的准则。他的渊博的学问、孜孜以求的严谨作风以及标格高峻

的学品,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早期著称于世的有冯其庸、马茂元、汤志钧、杨廷福、姚奠中、吴孟复、陈祥耀等人,建国后的学生王英志、马亚中、魏中林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这些钱门弟子都将孜孜矻矻的学术追求精神,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格,带到新的工作岗位,薪火传承,继学不绝。

在多年的教学生活中,钱仲联特别培养学生学问和人品双优的人。他认为:教育的本身,学问和人品这两样东西要合起来,不管你是新还是旧。他总是说:学问越往高处走,要取得进步就越难。写好诗不容易,离高峰越近越不容易,而诗为心声,如果人品不好,要取得这最后一点的进步就太难了。

在多年的讲学授课方面,钱仲联一直秉承无锡国专自创办以来几十年所一直保持的严谨校风和严明校纪,对读书马虎、作业潦草者,决不姑息迁就。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则更为严格,而这种严格主要建立在对于传统学问的坚定信念上。他注重"言传身教",其以身示范、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与其治学一样,不仅严谨、周密,而且在细微处让人终身受益。他的学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亚中回忆道:他每星期有好几个半天,都要亲自授课。讲课时不用讲稿,也不开中药店,而是神思飞扬,纵横开阖,挥洒自如,左右逢源。高兴时手舞足蹈,謦咳横飞,吟哦之声不绝,学生们都总是听得如痴如醉,熟悉他的人几乎无不惊叹他的博学强识。

三、我没有资格在钱仲联面前评博导

钱仲联在学术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是他名满天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治学淹贯闳通、博通群集、严谨完备,涉及多种学科,著述多达六十余种,已被学界视为典范。而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则是古典诗文集的笺注和校勘。

1926年,钱仲联在《学衡》第51期发表了他的第一论文《近

代诗评》,对晚清以来的诗学大势做了精辟的评述,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1936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第一部笺注的书——《人境庐诗草笺注》。29 岁的钱仲联在书中旁征博引,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注意,这也成为其一生学术活动的第一个里程碑。冯振在其《序》中说过: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也……仲联自造掐擢肝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固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此外,还有学者评价说:《人境庐诗草》,自钱注出,始精当完备,享誉海内外。成书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仍不见后来居上者。

此后,他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诗词笺注中。《海日楼诗注》、《吴梅村诗补笺》、《鲍参军集补注》、《剑南诗稿校注》等一大批蜚声学术界的力作相继问世。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钱仲联的家被查抄,自己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未影响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他仍孜孜不倦,勤于著述。

正是在这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钱仲联著了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陆游《剑南诗稿校注》,此集卷帙巨大,正集有 85 卷,外加题外诗,同时他又另外做题校、补录易诗、剔除误入陆游集的他人诗作,并将诗文中的典故、人物、地理、背景等一一注释,由于陆游诗全集向来无著本,钱仲联的这部巨型校注,可谓是一个创举,工作之艰难、工程之浩大无人能及!

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对钱仲联崇敬不已:九千多首诗,不容易,钱先生全都做了注解,而且注得非常好,非常详细,我研究宋代诗歌的时候着重读了钱先生的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培恒说:"而李白的注和杜甫的注都是集体的劳动,就

是有一位或者两位老先生带头搞个班子,钱先生陆游的注那是他一个人的工作,这你就是可以知道工作的难易,所以光是从钱先生陆游的注里边就可以看出他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水平。

莫砺锋还认为:虽然钱钟书和钱仲联研究的路子不太一样,但是在学术上,钱钟书对钱仲联也是很钦佩的。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称钱仲联"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此外,他又在《文学研究》发表专文,认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完全可以取代以前的一切韩诗旧注。当然,我们知道,要得到钱钟书先生的好评是很困难的。事实上,两位先生是一个档次的。莫砺锋还认为:

> 钱仲联先生完全具有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功底。当时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里的那些老前辈,就是从清朝过来的。那些老学者,钱先生跟他们都有过交往,钱先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传统的学问,非常深厚,根底非常深厚。现在我们搞这些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你要我们自己来写骈文,写古诗,一般都写不来,只能研究。钱先生他会写。所以说,他是处于转折关头的人物,新学问和旧学问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这样的学者现在我们国家已经不多了,应该说是国家级的了。

由于其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1981年钱仲联就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说来有趣,这其中不能不提到钱钟书先生。该年,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评定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时,由于当时江苏师院知名度不高,学校为钱仲联教授申报的只是硕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时,评委们发现不少重点大学申报的博士生导师候选人,既无像样的著作,又无学术知名度;而一

些像钱仲联那样成就卓著、名望甚高的学者却不在其列。作为学位委员会评委之一的钱钟书,对此首先提出疑问。他说:“博士生导师应当论学问,而不是看学校。江苏师院的钱仲联先生,光凭他即将出版的《剑南诗稿校注》,我看就可以当博士生导师。”接着,他对在座的评委由衷感叹说:“钱仲联教授只申报硕导,我们这些人可是没有资格申报博导的啊!”钱钟书一言九鼎,在座的其他评委也有同感,这样钱仲联就被定为博士生导师。

钱仲联先生学问之淹博深邃,固为近世罕有,而于清诗之研究尤称绝学。晚年的钱仲联将自己的学术重点定位在清代诗学上。在对清诗(包括近代诗)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他以精密的考证、充实的论据、全方位的比较和阐析,指出清诗的总体成就“超越元明,抗衡唐宋”,推翻了上述诸家的结论。19 岁时,他就在《学衡》杂志发表《近代诗评》,以骈文体式,纵论清末民初各种诗派。1936 年,他又完成专著《梦苕庵诗话》,系统详论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晚清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关诗史价值之杰构,并论及民国诗人诗作,论述作家百余人,作品在千首以上。对于为什么要选择清诗来研究,钱仲联认为:“明清诗文没有人愿意研究,是一个空白点,那么我来填补这个空白,其他的唐诗、宋词研究的人千千万万,多得要命,用不着我来凑这个热闹,就这么一个道理,很简单。”

1981 年,已经 74 岁钱仲联,带领一帮研究人员在清诗的海洋中遨游,开始了《清诗纪事》的编撰工作。为了此工程,他们遍查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高等院校图书馆,摘抄或复印清人及近人所著诗话、词话、笔记、稗史、尺牍、日记、碑传、年谱、档案、方志和诗文总别集等有关文献 1200 余种,制作卡片 8 万余张,再进行整理、考订、编纂、补充,最后由他一一细加审正。经过 8

年时间，钱仲联和他的弟子终于完成了11卷1000多万字的清代诗歌纪事文献的皇皇巨著。

作为近年来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一大成果，此书一经问世，立即震动了学术界。钱钟书称为“体例精审，搜罗宏博，足使陈松山（田）却步，遑论计（有功）、厉（鹗）。……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周振甫先生也撰文专门评论说：“这是一部传世之作，吸取了历代诗纪事之作的优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仅材料的丰富超过了前人的各种诗纪事，编纂的体例和指导思想也是超越前人的。”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评价该书：“填补了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一个空白，洵为传世之作也。”

另外，该书出版后荣获了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首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清诗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在绝销十余年后，凤凰出版社又根据原书缩小影印出版。

四、诗人本色，大师情怀

钱仲联既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一生爱诗，具有诗人的本色，大师的情怀。由于出身于文化世家，家学渊源，钱仲联自髫龄即学为诗。少年时代的他就梦想成为像李白、杜甫一样的大诗人。他九岁开始学诗古文，15岁开始存诗，著作了《梦苕庵诗》。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读时，他就与同窗王蘧常、唐兰等唱和；平平仄仄，相得益彰。

1931年，24岁的钱仲联与王蘧常合刊《江南二仲集》，就受到当时诗坛耆宿陈衍和金天翮先生的称誉。陈衍将他的诗收进《石遗室诗话续编》，金天羽在为他的诗集写的序中说：仲联

之诗，其骨秀，其气昌，其词瑰玮而有光芒，盖镕镕乎造作者之堂矣……异日者，图王即不成，退亦足以称霸。从此诗名远播，“江南二仲”成为诗坛新的掌故。

他早期诗歌作品以吟咏山水为主，风格清隽灵秀，“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然而，作为一名时刻牵挂国运民生的爱国知识分子，在那些国难深重、民生涂炭的黑暗岁月里，他不忘以诗歌为武器，呼唤民族精神，激扬救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严酷的现实打破了钱仲联个人的书斋天地，他开始用黄诗的表现手法写出了大量的反映现实、感咏时世的诗篇，并发表于《申报》的副刊上，其中在《哀沈阳》一篇中，他写到：沈阳城中十万兵，城南城北屯严营，夜半贼来兵尽走，四天如墨无战声。平明贼队搜大户，穿门为狼入为虎，母从儿走妻求夫，我军已远空号呼。诗人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黄炎培先生读后拍案叫绝，并剪报保存传示友人，广为谕扬。不仅如此，黄炎培还介绍他结识了“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吴江著名诗人金天翮（松岑）。金先生也对钱仲联的诗作赞赏不已，将其选登在《文艺捃华》上，称其“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若敌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钱仲联携眷随无锡国专西迁，“远走湘桂粤港，所为诗意境益恢”，记述抗日战事与万里流亡的旅途生活，兼写雄奇绚丽的山水风光，力作殊多，足以上继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作系列名篇。如《初闻冀北消息》、《平津沦陷感赋四首》、《佟赵二将军殉国诗》、《大刀勇士诗和无恙》、《八百壮士诗》等。抗战期间，钱仲联又写了许多感咏时事战局的作品，在他的诗中即使是那些描写桂林、阳朔佳丽山水的诗篇，也难免时时流露忧患乱离的心声。如《榕树楼

晚眺》：榕树楼头倚夕阳，万鸦城郭入苍茫。湖烟白褪芙蓉色，秋气黄归薜荔墙。如此江山犹战伐，可无刀剑出肝肠。乱峰遮眼真多事，我已登临不望乡。当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人民盼望和平，而国民党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时，钱仲联先生写下了《秋兴八首次少陵韵》以寄愤慨。

钱仲联先生所作的诗，如《湖上杂感四首》、《胡蝶曲》、《国军撤淞防，感书一百韵》、《闻平型关大捷喜赋》、《西征八首》、《阳朔舟中四首》、《丙辰春感八首，四叠少陵“秋兴”韵》、《丙辰秋兴，五叠少陵韵，自中秋重阳前成之》、《后胡蝶曲》等皆脍炙人口。他的诗寄托了诗人苍凉郁勃的忧世情怀，其诗歌的思境与艺术，均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峰。

1970 年代后，钱仲联的诗笔渐趋平淡，但骨力不衰，时有雄篇杰句。一部《梦苕庵诗》，气象恢弘，内涵深广，充分抒写 20 世纪中国知识人士饱经沧桑血火的苦难历程与心灵悲感，堪为一代诗史。钱钟书对此评价甚高，他说，《梦苕庵诗》“天海伟观，一集兼备”，谓兼有金天羽《天放楼诗》与沈曾植《海日楼诗》之特色，片言举要，精切不移。

此后钱仲联先生虽致力于学问，但坚持不懈地做诗，中年又开始填词。1940 年代，钱仲联因结识廖仲恺之兄著名词人廖恩焘，后者赠以《烛影摇江》词，他用原调、次原韵回赠，以后便陆续开始创作其他诗词。虽然钱仲联填词数量不多，共《梦苕庵词》一卷仅 56 阕，然而这些词作质量极高，是少而精的典范。当代著名诗词评论家刘梦芙对钱仲联先生的诗词评价极高，他认为：

> 钱仲联的词含蕴丰富，境界广远，作者的一枝如椽之笔，纵横挥洒于新旧两个时代：抒写战乱期间的沧桑之慨、家国之忧，歌颂新社会的辉煌成就，同时赞美祖国的壮丽

山河,表达友人间的深厚情谊。以词的艺术形式而言,长调居多,最能体现作者雄放的才情、磅礴的气概;就风格而言,则豪婉兼容、刚柔并济。力作甚多,诸如《念奴娇·题段无染摹其师黄宾虹桂林阳朔山水画册》、《八声甘州·丁亥春偕妇登虞山望海楼》、《扬州慢·江楼晚眺》、《水龙吟·风雨中京口渡江》、《摸鱼儿.丁酉感埃及近事有作》、《湘月·闰中秋》、《贺新凉·十二周年国庆》、《水调歌头·和瞿禅 < 西湖初秋 > 词》、《高阳台·人民公园菊花展览》、《贺新郎.与妇苏堤玩月》、《风流子.拙政园夜游》、《水龙吟·仲弘元帅挽词》、《八声甘州·南京长江大桥夜眺》、《大江东去·游黄州赤壁次东坡韵》等等,皆是堪与古今名家的佳篇同传的精品。

著名词学家,被胡乔木赞誉为"词学宗师"的夏承焘对钱仲联的诗词也是赞誉有加:

> 钱先生的词在气象、魄力上胜于朱彝尊、厉鹗、王鹏运、朱祖谋等人,而风格清空的山水之作可与晚清陈澧之《忆江南馆词》媲美,所论颇为精切。福州老词家陈声聪(兼与)评云:"《梦苕庵词》,高者可与遗山、伯雨相颉颃",又评其《鹧鸪天·游仙感越南近事》二首,"纡回隐轸,俏丽无匹。

上海沈轶刘先生则在《繁霜榭词札》中评论道:"民初四词家外,尚有三大名家,窃准汉末成例,拟为一龙以夏承焘为龙头,钱仲联为龙腹,龙榆生为龙尾……钱氏词清扬丽则,和神当春,令人不思魏晋,其集即今已难觅。……三人者,小令一时瑜亮,参天长鬣,掉鞅无惭。

至1994年,广东南社研究会编辑排印《梦苕庵诗词》,收诗7卷共1427首,词1卷共58阕。而1994~2003年这十年中,他

又创作了大量诗篇。

钱仲联终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做诗填词成为他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他为诗词终其一生，长达八十余年，就这一点而言，于他同辈的学者中，无人可及。因为在他看来，旧体诗词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生机断绝，濒于熄灭，将被新体诗完全替代。一些新体诗人如俞平伯、沈尹默等人，写新诗不久又转而从事旧体诗写作，可见其旧体诗还有其强烈生命力的。

此外，他还认为：诗歌创作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我一直从事的诗集笺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工夫……他曾自称："在现今的中国，全国范围以内，不单是苏州，全国范围内有这样的本事只有我一个，没别人了，没有人会写骈体文，会写赋，会填词，会做诗，而且要做得好，自成一家，有自己的面貌。"

1997 年，香港的施学慨先生为主编《回归诗词百首》，专程来苏州向钱仲联求序并征稿。尽管钱仲联当时身体不适，但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历史盛世让老人心潮澎湃，当晚提笔写下《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六韵的五言古风，追溯香港自乾隆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表达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施见之赞叹不已，连说"不虚此行"，并把它作为卷首之作。

五、结束语

逝者虽已矣，来者犹可追。2003 年 12 月 4 日，钱仲联这位我国学术界一颗璀璨的巨星在苏州陨落了，但其遗存的非凡的学识和杰出的学风还会恩泽后人，成为今人效仿的楷模。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师从钱仲联的涂小马博士是这样评价其恩师的：我觉得钱老这代人，从某一方面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高峰。比如说他脑子里记住的掌故，各种各样有关古代的文

化、历史，这些知识他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甚至告诉你这些事情见于哪本书，大概在什么地方，有的甚至能够精确到在什么页上面。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可能感觉到现在电脑可以基本取代这样的功能，而且比他能够检索的更多，更全面，更精确，从这方面来说似乎这一代学者这些功底、这些积攒了几十年的功力就被电脑一下取代了，但实质上不是这样，因为学术研究在你脑中积存多年，然后酝酿多年，最后酿出一杯非常醇的酒。著名学者刘梦芙除了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外，更是认为：在20世纪学术界，钱仲联先生是足可与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钱穆、钱钟书诸位大家相提并论的国学大师，是"百科全书"式的鸿儒。他的学术尤其是在诗学研究方面，其范围之广，难度之高，贡献之大，前无古人，后罕来者。

钱仲联小传

钱仲联(1908～2003)原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江苏常熟虞山镇人。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曾任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华大典·文学典》编纂委员会顾问,《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顾问,《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全宋诗》编委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中华诗词学、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诗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中国韵文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等职。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二等奖,同年被江苏省教委定为普通高校优秀学术带头人;1995年被教委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6年被苏省教委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教师。

钱仲联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专于诗文词赋,尤其对明清诗文有较深的研究。主编的《清诗纪事》,获国家古籍整理评比和全国图书学会评比一等奖。还主编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国文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主要著作有《人境庐诗草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鲍参军集注》、《近代诗钞》等,著述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

主要征引书目:

1. 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 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4. 涂小马:《钱仲联先生学术研究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 年第 5 期。

5. 马亚中:《我的老师钱仲联》,《常熟高专学报》,2004 年第 3 期。

特别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钱仲联先生的学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涂小马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张中行　(1909 ~ 2006)

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羡林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张中行的散文平和冲淡，清隽优雅，善于在不动声色之间写人记事，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是继周作人之后一位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

——张颐武　著名学者

张中行:布衣学者、国学大师

陈　洁

世事如风文如山斯人已驾鹤归去。2006 年 2 月 24 日上午的阳光稀薄而浑浊,我在风中接到电话:行公溘然长逝了。并不吃惊,还是觉得突然。赫然想起那萎了一地的百合花。

一直没有跟人说起过。去年春节前一周,我去 305 医院采访张先生,在胡同口买了束香水百合,十枝。店主说,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因为与美编约的时间快到了,我慌慌张张地横过马路,闯了红灯,结果一辆灰白的私家车嘎的一长声刹车,还是和我撞上了。没有伤,但花已尽在轮下,揉碎红颜。

我后来两手空空、很不成礼节地拜望了行公,他一直懒怠说话,但还是勉力给我题了字。我应该是行公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他给我题的字,或许也是他平生写的最后几个字。而我居然两手空空。

那时行公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身体并没什么毛病。前不久的 1 月 7 日,他刚过了 97 周岁生日,虽然没怎么说话,但还下了地两个来小时,高高兴兴的。他就是“很怪地”不愿吃东西。我亲见看护人员耐心地哄他:“喝点水,就一点,好不好?”他固执的摇头,看护人员干脆把杯子端到他嘴边,他紧紧地抿着嘴、咬着牙、摆动头部、再用手推开。他的身体也在拒绝外物,营养液通过静脉输入,却不吸收,手腕上鼓了好大一个包,

换只手再打吊针，还是一样。

我当时就想到禅林里的很多高僧，俱是预知了自己的大限，屏退左右，绝食枯坐，独自面对终点。我自来就是怕死人，那一刻，心里却于凄婉中升起肃然庄重。

过完年，张文在电话里说，全家在医院过了年，挺好的，已经给行公作了皮下静脉埋管，再不至于出现打不进针导致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况了，人也比我看见的那时胖了一点，润泽多了。我不禁为张老高兴，也暗骂自己的胡思乱想，以张老的恬淡性情，便是茶寿也不为过。

哪里知道，天地到底不仁，先生终究仙逝。305 医院内三科的陈士良主任和王小冬副主任介绍说，行公前几天受凉了，肺部感染，24 日凌晨突然恶化，看护和护工通知了家人。医院抢救到凌晨 2 点 40，到底回天无术。行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安详平和，只是一贯地默然。也许对先生来说，沉浮恩怨都随风，不留片语在人间。

行公简易的灵堂当天就在他家搭起来，不断有人前往悼念。送去的花圈中，有部分是以红色系为主花的。据说这是有讲究的，上了七十，花圈里才能配红色花。

行公一生，概而言之：读书、买书、编书、写书而已。书以人立，人以书名。纪念行公，自然也离不开书：书里的人生，书外的世界以及书里书外人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一、书里人生：编书写书的行公

张中行，1909 年出生于河北香河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学名叫张璿，字仲衡。“仲衡”是他小学老师刘秀才给起的，《尚书》有“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的典故。1935 年北大毕业后，他去掉“仲”的人字旁，“衡”字中间的鱼，减缩成了张中行。其实“中行”两个字也是有典故的，《论语》说“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

狂狷乎”，还有《易经》的“中行无咎”，父亲还刻过这方闲章。他的人生经历其实比较简单，年轻时一直读书，北大毕业后在贝满女中等学校教书。40年代，他在教学之余帮助巨赞编辑《现代佛学》杂志，后来巨赞出国了，他就代主编工作。《现代佛学》即现在的中国佛教协会的刊物《法音》。

1951年，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有编教材的任务，需要人手，经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的介绍，张中行调到出版总署担任编辑工作，他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编书生涯。在散文创作出名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语文教材和文史读物的编写工作，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合编《古代散文选》（三册）、《文学读本续编》等，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都没有公开署名。

行公初到出版社的任务是编高中语文教材。他语文功底深厚，加之工作认真，他编辑的书质量都很高。当时叶圣陶具体分管教材编辑，他通文史，又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凡是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都要亲自细心审读，发现不妥的地方就亲自动笔改。而凡是经行公之手编订的教材，他基本上都没有改动。

因为长期工作的原因，行公始终关注语文教育问题。他认为学语言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熟，不断重复，熟就能生巧。他曾告诫教材编者和教师，不要对教材抱太大的奢望。最好是只把课本当作范例，不要让学生以为学习课本上那一点就够了。而且，在语文学习中，语法等语文知识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靠熟练而不是靠知识。

但是强调多读多写，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要实行起来有困难，一是读物供应不足，二是师资问题，三是学制需要大变。相对于教材而言，行公更注重语文教育的师资问题，他曾表示，

教师高明，教材再差甚至没有教材也能把语文教好。

行公对于编辑教材有相当的使命感，他曾说，编教材是一件苦差事，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他在选择可以当作范文编入教材的文章时是非常精心的，也比较开放，他认为课本应该好坏文章都选，好文章告诉学生为什么好，以期“取法乎上”；多病的文章“作用相反，教学生如何避忌”，另外，他还很推崇古文和古典诗词的阅读学习。

本着将上课由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的教育理想，行公曾编写过很多课外读物，以弥补“读物供应不足”的问题。比如80年代早期的《文言文选读》。三册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定180个题目，三百篇文章。行公在选文时力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性强，不仅注解详细，而且重点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学生在读了这三本书后，还能够有兴趣找别的相关图书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行公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爱好，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行公对语文教育、教材编写的众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想法并不能付诸现实。如1962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了《古代散文选》中册，其中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在送呈某部审查时，部长却说要选《正气歌》。他只想到了政治第一，而没有想到《正气歌》根本就不能算散文，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于是，“散文选”中却收了一首五言古诗。

1998年前后，社会上兴起了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而其中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是争论的焦点。行公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参加了199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召开的“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研讨会”。

行公为人谦和，和同事们相处颇为融洽。比如他与同事蔡

超尘合作得很好，工作中没有什么争执，每每一本书很快就编完了，顺利通过审查。张厚感是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与行公共事多年，在《诗词读写丛话·前言》中，他写到行公“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

也许是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行公说到自己写书撰文时，总是很轻快，声称“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工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其实他写作极其严肃，坚持“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用张厚感的话说：“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特任教授靳飞曾在行公生前为其撰拟挽联“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并于行公病榻前诵读，行公亦不以为忤。正是有了这样恬淡的心态，行公笔下才能龙走蛇游，文思泉涌。

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行公的文章有五四遗风，启功对《流年碎影》评价甚高，说是行公的自传，而且是"写思想的自传"，"一般的自传都是写事，张先生的自传却是写思想。"张厚感曾感慨行公"动手晚了"，并表示惋惜和遗憾。行公听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一句："那时能写吗？"

相比而言，行公对自己著作的"经济效益"却一点都不关注。2005年的10月，有编辑告诉他《诗词读写丛话》销售情况很好，马上就要重印了。行公却顽皮地眨眨眼说："我的书还有人读？没让你们赔钱吗？"被人问到他的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幽默道，他的书最大的用处，就是让读书人多耗费一点钱。

除了散文，行公还喜欢作古诗词，有代表作《说梦草》为证。他称自己当初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才写起诗词来。学着诌几句古诗词是很苦的，但如果能得到甜的回报就不苦了。佳人高兴了，付出的努力就值了。哼哼几句古典的诗词，骗现在的佳人，也能骗上。写情诗来几句古诗词，比翻来覆去"我爱你"这样的大白话要好些吧？

行公的女儿曾说，写作是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需要。直到一个月前，他还曾与看护聊天，说等自己病好了，还要再写点文章，稿费给老妻治病（行公的妻子2003年去世，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看护问他写什么，他说，还是写散文吧，

散文读者爱看。他对于人生的祈愿,除了男女之情,恐怕也只是继续写文章而已了。

二、书外人间:编行公的书、写行公的书

行公最重要的两本书:《顺生论》(用力最多),《流年碎影》(最完整的"自传"),都是白烨责编的。白烨与行公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说起来,白烨第一次编行公的书还是"无心插柳"之举。90年代初,白烨供职于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而行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每周去沙滩北街上两天班。正好是白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遇到行公上班的日子,白烨总早点下班去他那里小坐。

白烨回忆说,大概是1992年冬天,一次聊天时行公说起他有本写了几十年的书叫《顺生论》,最近被出版社退稿了,原因是"没有引征马列主义的言论"。白烨好奇地要求看看,结果一看就难以释手了。《顺生论》很快作为1993年的重点书推出,在读书界广获好评,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和"现代版《论语》",初印的一万册很快告罄,又连印了好几版,风靡一时。行公很高兴地在赠白烨的《顺生论》上题签:"无其鼎力此作难面世也。"

此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愉快而有意义的合作,白烨先后策划出版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和《张中行作品集》(计划8卷,已出6卷)。白烨说,他最敬佩行公的就是他清醒不糊涂、敢于说真话的耿直风范。

行公于2005年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再版《诗词读写丛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的合同,是先生生前最后签约的出版合同。樊玉兰是这三本书的责编。她说,24日得知行公谢世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在忙碌,到出版部查看当天就要发印的《禅外说禅》、《顺生论》两书的正文片子,去美编室商量两书封面的

最后改动和用纸，和市场部、发行部讨论行公著作的整体营销方案……这两本书，再过几天就可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躺在读者面前了。而她的内心，却一直无法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少许平静。

就在行公去世前三天，即2月21日，樊玉兰还见了他最后一面，她去医院送还用于新版《禅外说禅》和《顺生论》的照片，当时行公已经患了肺炎，正在输液，明显瘦下去，喉咙里发出艰难呼吸的嘶哑声。樊玉兰印象中的行公，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平和的文化老人，一个认真坦诚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气的老人。他很有老式文人的讲究，比如有客人来，他必不肯拄四角拐杖，而一定要独立迎接。即使是在医院床上的时候，也要催促家人将他扶起身来，穿好外衣，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说话。

樊玉兰真诚地希望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行公的文字。她说："大家都说张先生是文化老人。文化老人是什么样的？对先生最好的了解，不是来自媒体的介绍和家属的描述，而是对先生文字的阅读。先生的语言平淡而有意味，《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等古典文学知识读物在爱读书的人中间流传，而《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讲述人生哲理的书，最适合我们在心浮气躁的时候读一读，让我们重新想想生活的目的。"

行公一生最大的成在其思想成果、国学修养和散文创作，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杨沫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对此两人都有过回忆文字，老鬼前一段出版的《母亲杨沫》里也有相当详尽和客观的描写。

1931年，20出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与17岁逃婚在外的杨沫相识。当时的张中行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与一个相貌平平、裹脚不识字的沈姓旧式女子结婚5年。杨沫在张中行的帮助

下前往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不久回到北京，两人开始同居，这是两人都弥足珍贵的炙热初恋。杨沫很快怀孕，她感觉到张中行对她的冷漠，搬出去独居，并独自在小汤山生下一个男孩萍，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对杨沫来说，这是她终生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她到了晚年还曾把自己比作《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张中行却曾对他和杨沫的女儿徐然解释说，"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负心，冷淡了她……"

后来张中行和杨沫又一起生活了5年，其间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同时受妹妹白杨影响，于1936年离开张中行，当时她已经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徐然（马建民和杨沫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生育了一个男孩马波——老鬼。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张中行随即与传统型女子李芝銮结婚，两人厮守了半个多世纪，并生育4个女儿。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

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 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感觉严重受伤。以至于 1995 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他现在两者皆无。

老鬼是从笔者的电话里听说行公逝世的消息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可惜啊，他是个好人。”其实老鬼并没有跟行公打过交道，从来没有。惟一的一次间接交接，是他去年写《母亲杨沫》，想用一张行公的照片，通过出版社的一个熟人转告行公的女儿，再转告到本人，回答是不同意。“所以我的书里没有他的一张照片。”老鬼坦言他对行公的逝世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彼此很陌生，但他对行公没有任何恶感，很中立的。他说：“印象中我妈妈指责他很多，而他很少说我妈什么。”“建国后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以吵架告终，没有一次例外。就连那次他‘文革’外调时说妈妈革命，妈妈事后知道了，很感动，给他写了信，还送了照片。回头见了一面，最后还是吵。”如果先走一步的是行公，杨沫可能也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遗憾的是笔者没有采访到徐然。老鬼介绍说，爸爸（马建民）对姐姐（徐然）一直很好，她在河北老家一直长到 8 岁才被接回北京。直到“文革”中大家互相挖互相咬，才揭露出她的身世。40 多岁才知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1978 年，她第一次给生身父亲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后来，妈妈和李叔叔结婚，徐然与李叔叔性格不合，此后十来年，她一直没怎么跟我们来往，包括妈妈捐献版权的仪式、90 周年诞辰活动等，她都没参加。其实爸爸死后，姐姐挺想找她亲生父亲的，挺愿意跟他交往，他们父女俩一起吃过饭、说过话，可他对她很冷淡，不怎么理她。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们，老鬼说："我觉得他不缺女儿，如果姐姐是个男孩子，他对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也可能是《青蓝园》的原因。杨沫再婚和《青蓝园》出版两件事，徐然都隐瞒了张中行。现在，年近70的徐然在美国亚特兰大，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报道，她通过记者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哭了。

不管怎么说，恩爱情仇都随风，行公自己也曾说过，"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错，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段落，一种水流花落的境，应该珍视，也值得怀念"。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谢世，而两人留下的或隽永冲淡、或激情革命的文字，却将更长久地流传于世。

三、书里书外：女儿眼中所不为人知的张中行

张中行去世后，许多媒体的报道称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然而，在笔者的采访中，发现在他4个女儿张静、张文、张采和张莹眼中，父亲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平淡而真实的生活。

老实说，我们不算很了解父亲，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父亲跟外界宣传的那个人不太一样。父亲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媒体才知道的。而我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媒体可能并不关心。尽管父亲出生清贫，但却被定了个"富农"成分，而随单位的人一起发配到安徽的凤阳干校劳动改造。还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挑水的时候把水桶掉井里了没捞上来，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挨过批评……

1971年5月底，父亲刚从干校回来，就接到命令，要他回香河老家，可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

不离开北京的。可是他却很单纯，催着逼着乡下赶紧把房子搞好，10月一个人回了香河。当时他二女儿张莹大学毕业刚结婚，在唐山劳动锻炼。她把父亲送到家乡，给他挑满一缸子水，也不敢久留，当天就回来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他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女儿每月到人教社在北京的留守处去领，记得朱光潜的夫人就在留守处工作，每次把钱交给我们还要嘱咐一句："拿好钱啊，别丢了。"可是父亲回香河就没有工资了，户口都打回去了，不过还吃商品粮。按照那时的政策，摄氏4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二女儿张文的家里，每次回来我们还要赶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否则被查出来就不得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1977年，父亲终于回京。80多岁时，我们才想起他在人教社工作了几十年，怎么都没分房子，这才去要。于是在燕园分了一套三居室，很普通的，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只有"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在这之前，他一直和张文家生活在一起，都想不到向单位要求什么。不过，单位对他也是蛮好的。

对我们来说，父亲的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我想，要是我留级了估计

他都不知道。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

父亲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 1936 年跟母亲结婚，“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父亲总说母亲人好，忠厚善良，能忍耐。他们的感情很深。父亲写过一句诗，“添衣问老妻”，大意是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他盛饭了，那就一定是他已经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没有给他添衣，就说明他是暖和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生活和谐美满。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前几天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父亲为人忠厚善良。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被偷了，很难过，父亲知道后，就给了他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我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抱了只猫回来，说它被丢在外头怪可怜的。回到家才想起，要是这猫原来有主人，找不到怎么办，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条，说一只什么什么样的猫在谁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呢。

对猫尚且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对人很好，有人总结说，他是对朋友热情，对保姆客气，对子女严厉。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不但来者不拒，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他常常上午写字，下午题款，说是“还文债、字债”。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他们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的，他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签”！可是他从来不为我们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我们，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我们也知趣了，不找他求字画，所以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名人字画。

曾有中学生给父亲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

父亲认为他很诚实，把书寄给他。他这样给很多人寄过书，他常说，人家是我的读者，肯花时间、花钱看我的书，应该感谢人家。但也有人寄了钱来，说买不到他的某一本书，要他代买，他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卖书的，把人家的钱退回去了。

父亲做人很实在，也很节俭，出去吃饭总要打包。他有些言论，我们从别的渠道知道后都会很吃惊，比如唐老鸭（唐师曾）回忆有一次父亲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老鸭答不出来，父亲就自爆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他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还曾把婚姻分成“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四类，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是说不出这样坦荡率真的大实话来的。

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反正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我们小时候和读中学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和爱因斯坦的故事，带我们认星星，我们现在还记得，父亲说宇宙是“有限无边的”，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到老了还关注新事物，跟得上现代科技，比如1999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千年虫”说得很厉害，他就挺在意的。他还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书法、喜欢收集砚台、喜欢考古、喜欢戏曲，还喜欢喝点小酒。他在北大张文家里住的时候，常去圆明园散步，总会带一些小石头什么的回来，洗干净了，后头写上字，磨一磨作砚台用。别说，还挺漂亮的。我们出门就发现不了这些瓦砾石头。

父亲常说，教育的成功就在让人不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念书，少信宣传”，还

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自己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结合。

父亲一生都很怀念大学生活，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们家三代一共有8个北大人，但除了他，只有小女婿一个是学文的。

四、书里书外：别人眼中的张中行

行公曾说，自己平生的理想很简单，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然而，他做学问的面很宽，其对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戏剧、文物、书法……的学识之渊博，学界早以公认，特别是其文史、语言研究，学界评价极高。

已故学者吴祖光先生在评价行公时曾说："我那点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先生那才是真学问。"季羡林先生在评价老朋友时说到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并称其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其文章时，季老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著名的散文家韩小蕙在一篇题为《追念布衣学者张中行》的文章写道：在中国文化界，张中行先生被称为"布衣学者"。他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他打从心底里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自道"我乃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在文章中她说到：一个人能活到将近百年而受到如此的景仰，念着他的名字与承接传统的话题相衔相接，这个人是我们伟大中华文化的精英。

著名学者张颐武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张中行的离去，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张中行的散文平和冲淡，清隽

优雅，善于在不动声色之间写人记事，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是继周作人之后一位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

著名文物家史树青格外推崇张老的为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生低调处事，淡泊为人。北京文联研究部主任张恬女士在接受《光明日报》访问时评价道，张中行先生的文人气质有承接传统的一面，但比起传统的学者散文，他却多了思考，且不乏真知灼见。他的离去，似乎结束了一个时代。

此外，对于这位著名的布衣学者国学大师的仙逝，许多网友在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纪念行公的专栏上，纷纷跟帖悼念他。网友桃园流浪人说：都市柴门国学者，耿直布衣雅风范。人民网网友说：面对大师的一个个仙逝，解读他们的坎坷人生，学术道路，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尊敬、感慨、长叹，还有奋进。此外，“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缅怀言辞也大量出现。

流年碎影长入梦。一代布衣学者国学大师今已去，中国文化史只留下其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潇洒雅致，而博大精深的文字在给人们诉说。

张中行小传

张中行，1909年生，河北香河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曾任佛学杂志主编、副刊编辑。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与季羡林、金克木被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

20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平和冲淡、清隽优雅，善于不动声色地写人记事，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人称“杂家”，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著名学者张颐武认为先生的《负暄琐话》《续话》《三话》“牢牢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主要征引书目

1. 张中行:《顺生论》,中华书局 2006 年 3 月版。

2. 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 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4. 王贺玲:《我眼中的张中行先生》,《人民教育》2006 年第 8 期。

注:本文是笔者在《书里书外张中行》和《女儿眼中的张中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第二辑
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大师







薛暮桥　(1904～2005)

薛老给自己的最大感受,是那种超乎寻常的严肃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永远学习。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他从不摆专家学者或领导的架子,他谦虚谨慎,作风民主,淡泊名利,秉公忘私,平易近人,生活俭朴。

——李克穆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薛暮桥:政学双栖的经济学大师

郭晓勇

2005年3月,一位101岁的老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的名字排在全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名单的首位,并且是唯一的一名全票通过者。他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但遗憾的是,就在获奖的四个月后,薛暮桥先生去世。人们在怀念他的同时,也追忆起这位中国经济界的重要人物一生的百年历程。

薛暮桥的名字在经济学界是需要仰望的名字,因为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位置已达到难以逾越的高度。一位经济学者评论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薛老的人生已经是只能在影影绰绰的历史中寻觅的一部传奇,薛老的身影是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眺望的一座灯塔。"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意见》,被称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他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他曾是新中国国家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他曾经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的建设,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设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影响重大……

一、"牢监大学"毕业生

多年以来，薛暮桥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其经济学知识很多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

薛暮桥，原名薛舆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时曾在父亲办的女塾和东林小学（其前身为著名的东林书院）读书。薛暮桥从小天资聪慧，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918年，他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因家道中落，生活贫困，不得不中止学业，去杭州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谋生。这期间，薛暮桥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六个月要学的会计业务。铁路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薛暮桥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后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薛暮桥，自己休假去了。

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民党右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随后，薛暮桥担任了中共杭州地委工人部长，为争取工人权益而奋斗，同年6月被捕。此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3个月。

薛暮桥被捕后，被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当时与他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由于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述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暮桥非常惊讶，问道："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

“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就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牛棚中，薛暮桥都旁若无人，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在监狱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坚持每天读书五六个小时。当时狱中的狱友把各自的书汇集成一个图书馆，幸存下来的人称此为“牢监大学”。那么它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呢？从薛暮桥读过的书单中，我们可见其一斑：

> 《世界史纲》（威尔士）、《欧洲近代史》、《比较宪法》（王世杰）、《人权宣言》（英文本，法国）、《独立宣言》（美国）、《美国宪法》、《政治经济学》（波格丹诺夫）、《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河上肇），古典经济学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古代社会》（摩尔根）、《物种起源》（达尔文），以及生物学、天文学的名著，《中山全集》、《三民主义》（英译本）等。

三年多的监狱生活，薛暮桥读的最多的就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使他的眼界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学习世界语和英语，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并用世界语写作。他根据自己狱中亲身经历反动派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用世界语写成《牢狱生活中的一夜》，因为监狱看守不懂，所以这篇文章作为他学习的毕业论文，通过看守之手寄给了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世界语学会把它在《绿光》杂志上发表。所以，当 1979 年薛暮桥赴美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起薛暮桥“薛君毕业于贵国的哪所大学”时，他坦然而又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二、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薛暮桥以经济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是从 1932 年参加中

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开始的。1932年初,薛暮桥在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过一段时间的《民众周报》。不久,在朋友介绍下,他进入当时设在上海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很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赏识,和蔡、陈私交甚好。

由于陈、薛等人的社会活动太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1932年底,他们下令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薛暮桥被裁减(薛是编外人员,用办公费作工资)。为维持薛暮桥的生活,陈翰笙教他如何写文章。于是,薛暮桥回故乡无锡农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陈把这篇文章命名为《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送当时的进步刊物《新创造》发表。当时,薛暮桥正在学习日语,常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文书籍。有一次,他突然发现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了他这篇文章,真是又惊又喜。

虽然在此之前薛暮桥就有文章发表,但他后来却在自撰的《年表》中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的处女作,一则该文章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二则是出于对陈翰笙的深深谢意。

1933年2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致信陈翰笙,要陈介绍一位"农村经济"课教员。陈翰笙推荐薛暮桥,薛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到大学里去教书?"陈说:"不要紧,我已为你假造一个履历,你名叫薛暮桥,上海劳动大学毕业……"从此,薛暮桥就开始使用这个新的名字。

从1933年2月至1934年5月,薛暮桥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他和校长杨东莼等进步人士组织了读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34年8月,薛暮桥回到上海参加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它的阵容是:陈翰笙任会长,吴觉农任副会长,孙晓邨、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

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和薛暮桥任理事。在随后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中，薛暮桥担任主编。

这一个群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群体，他们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起步，做了大量调查研究。1937年1月，薛暮桥将前几年的讲稿文章等编著为《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由新知书店出版，从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一道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人物。

1938年10月至1942年底，薛暮桥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抗大五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讲课时，薛暮桥编写了一本内容通俗、观点鲜明的教材，后来由新知书店以《政治经济学》之名出版，在新四军中广泛流传。由于《政治经济学》一书也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因而不断重版，甚至搞不清楚究竟印了多少次，这是当时唯一能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相媲美的一本畅销书。

1943年，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到延安工作，薛暮桥名列其中。在去延安途中，行至陇海铁路，他被山东分局挽留下来，开始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在这里，薛暮桥取得了其经济实践上的第一个大成就，尤其是在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管理上。

当时，根据地发行"抗币"，作为国民党政府银行发行的"法币"的辅币。抗币的信誉不如法币，通货膨胀严重。薛暮桥和同事琢磨出一套办法：驱除法币，加强银行货币管理，利用工商局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他们干得很漂亮，在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上，他们用山东丰富的出口资源海盐和花生油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在薛暮桥的领导下，山东的财政收入中，工商收入和税收

占将近一半，其余是公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华北其他根据地公粮则要占到财政收入的 75% ~ 80%。

在这一时期，薛暮桥对货币和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世界上各国货币都是金银本位，而山东根据地的纸币则是同金银完全脱钩的，这就是薛暮桥的“物资本位”理论。同时，他还提出了在纸币流通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来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对于抗战时期薛暮桥的理论贡献，前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在 1996 年 12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重温历史经验 促进两个转变——读〈薛暮桥回忆录〉》为题进行了高度概括：

> 在 30 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40 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

1948 年夏天，中央财经部成立，薛暮桥担任秘书长。时值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薛暮桥成为周恩来处理经济问题的主要助手。据杨尚昆回忆：“恩来同志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除了作战问题外，日常工作主要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三个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在统一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人民币、稳定物价、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上海制止金融投机风潮等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上，薛暮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非名利有无间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始定职定位，对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们委以重任。有的同志根据自己的功绩，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职位，是无可非议的，而身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重任的薛暮桥，此时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过于繁重，薛暮桥患了神经衰弱症，为了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他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要职。这一举动在当时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其后，由于工作需要和陈云的主张，薛暮桥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暮桥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1962 年，他又担任我国第一任物价委员会主任。在这几个重要经济部门身居要职的他，成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人物。

1966 年，"文革"开始，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身陷漩涡，被称之为"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之一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 100%并不好。薛暮桥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牛棚"。在被批斗和写检查之余，他再次用上在杭州陆军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读书、写作。

1969 年，薛暮桥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干校，薛暮桥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时候，薛暮桥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冬季，薛暮桥的主要任务是烧猪食。一次，他一把一把地将柴草往锅灶里送，一个火星爆在了棉裤上，烧掉了半个裤脚才发觉。这是他唯一的一条棉裤，冬日里，年近 7 旬的薛暮桥穿着破棉裤走来走去，"风从洞里吹到全身，冻得真难熬"。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当他从别人旁边走过，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长时间的写作：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薛暮桥回忆录》里记载了一段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故事："1970 年在'五七'干校劳动。连里种了一块花生地，当地农民很少种花生，孩子们爱吃，常常到地里偷挖，而收花生是一次收不尽的，要多次反复拣收。那年一直拖到冬天，地下还有花生，要有人昼夜守护。有一天雨雪交加，连部要派人夜里去守护，派谁，谁也不去，只有'走资派'去。在雨雪中，坐在板凳上，环顾四周，防止小偷，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虽然环境恶劣，但脑子是清楚的，还在想着白天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果然有些思路，到清晨 6 点，有人来接班，赶快回到宿舍，把夜里想的内容写出来，之后才倒头大睡。"

由于薛暮桥的写作涉及当时很多政治方面的禁区，很多人都对他很担心。据薛暮桥的保姆杨晓华回忆：有好多人都给他提意见，算了老薛，你别写了，就为了你写这些个书，让你挨斗，你说你犯得上吗？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休息休息不好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指出哪里不对，他斗我，他给我提个醒我改了不就得了嘛。

薛暮桥恢复工作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 年 8 月，这部历时 11 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 7 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12 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时任中宣部

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为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全国各省紧急加印，发行量达1000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发行的空前纪录。

四、市场经济的开拓者

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从上世纪40年代末直到"文革"，薛暮桥都在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同时也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这一体制的弊端。"文革"前，他对计划经济体制曾有过两三次委婉的批评。"文革"结束后，薛暮桥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步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

1978年4月，薛暮桥致函中央，指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比提高物质生产条件更重要；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只管主观需要，不管客观可能，将会被迫采取调整措施；要总结历史经验，就要冲破"禁区"。1978年6月，他领导的调查组写出调查报告，较早地提出计划管理中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扩大地方的权力，更要扩大企业的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在这本书中，薛暮桥系统地清理和论证了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二是违背按劳分配规律；三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把计划同利用价值规律作用对立起来；四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此书之所以被译为多国文字，就是因为它深入地从理论上对经济政策"拨乱反正"，预示了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思想解放的渴望。

在批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薛暮桥也以其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

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年12月，薛暮桥又在中央党校作了《再论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报告，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一些。这在当时是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2.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

1980年6月，薛暮桥在提交国务院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指出：一年来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是从分配方面兼顾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调动大家发展生产、增加盈利的积极性；另一个是从流通方面，在统购统销、计划分配上打开一个缺口，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他率先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他说的流通制度改革，实际就是扩大市场机制的改革。他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

1990年，在治理整顿期间，他又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深化改革 摆脱困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建议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和效率问题，把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向

前进。

3. 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制度

1979年,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薛暮桥提出社会主义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并主张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他多次指出,不合理的物价和不合理的工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肌体上的两个病灶,要彻底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制度。

4. 宏观经济管理

1980年4月,薛暮桥在国务院长期规划座谈会上发言,主张把积累率降到25%,采取轻型结构,从所有制入手,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社队工业和社队商业。

1986年6月,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他向中央建议,各地急于求成的劲头很大,不要再去鼓气、加油。他说,如果说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保证社会总供求平衡,则是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

1991年,针对当时为遏制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建设规模急剧膨胀而过多采取行政措施的问题。薛暮桥指出,目前增减货币发行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今后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他还认为投资规模的膨胀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改革的大敌。他认为只要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应的大体平衡,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片面追求高速度,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薛暮桥强调,在体制转轨时期,越是放活微观,越要重视宏观调控。要尽快学会用经济方法,运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加快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5. 地区发展战略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针对当时全国各地脱离全国经济规划，纷纷要求提前翻番的形势。薛暮桥认为，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应以全国的战略规划作为基础。战略发展规划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地区规划必须服从全国的战略规划。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应当与腹地的发展战略配合。

薛暮桥指出，要使全国共同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要打破商品流通的地区障碍，还要打破资金和人力流通的地区障碍。鼓励沿海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投资，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反过来内地则以原材料支持沿海地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目标。

由于薛暮桥是从计划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他的这种特殊地位，对于倡导和推动市场化改革，具有很大号召力，这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

五、独立之思想济世之学问

薛暮桥曾说：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当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这两方面可能有所侧重，但决不能有完全的偏废。而我，长期的实际工作对我的经济观的形成，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可以说，我的经济观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正因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薛暮桥所想的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社会谋福利。但是，由于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身兼学者和官员两种角色，时常要面对个人观点与组织纪律冲突的矛盾。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

一个传统。但在建国后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而薛暮桥就是这种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薛暮桥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薛暮桥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这正如薛暮桥自己所言："我一生抱定的治学宗旨是，不断追求真理，知错必改，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当然也包括我的经济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捕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1978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感受的是到处涌动的春风，十年浩劫的霜冻从人们的脸上渐渐融化，但是经济领域却乍暖还寒。这一年的2月，五届人大会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出现这样的一些发展目标：要建设十个钢铁基地、十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为此忧心忡忡。

据薛暮桥女儿薛小和回忆：1978年初，薛暮桥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在人大做的计划报告，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边哭边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

字里，不讲政策，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薛小和说，以她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于忍耐的性格，而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极致了。

1978 年 4 月 18 日，薛暮桥决定写信上书中央，收信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信中意见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 20 多年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薛暮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浸透着他三十年的心血，而且一直以来，他被视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旗帜。但是，4 月 18 日薛暮桥所写的这封信却对过去 20 多年的经济工作进行冷静的批判。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很难打破这个禁区。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

不出所料，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薛暮桥还是因为他的主张受到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度过的。

最难对付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因为主张市场经济，薛暮桥一再受到批评，也一再委屈自己的经济主张，服从党性。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他说：“尽管在内部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公开场合，我有义务同中央保持一致。”然而，这又使得一些思想激进人士批评他在理论上后退。其中的无奈和苦涩只有薛暮桥独自品尝，只要能推动市场化改革，他不在乎个人得失。

1980 年，薛暮桥在他负责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 年 9 月，在《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中，他又提出，要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针，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由于这些提法在当时是很大的理论突破，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薛暮桥提倡商品经济，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

1982 年 5 月 ~ 9 月间，按照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为配合中共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 300 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 70 次，讨论历时 4 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前，9 月份中共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 9 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薛暮桥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薛暮桥知道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1981 年 4 月，有人印发一份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整理的材料，它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第三类则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被划为第四类，同时在小范围内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薛暮

桥被授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薛暮桥这种老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薛暮桥为自己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正是因为薛暮桥认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所以他始终坚持改革的信念不动摇，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他常常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1989年后，国内陆续出现一些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文章，认为一些经济决策的失误，是改革造成的，提出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此，薛暮桥明确提出：“我们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道路没有错。”1990年7月5日，薛暮桥参加中共中央常委召开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会上，与会代表就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薛暮桥在会上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觉得言犹未尽。会后，他以一种“这个时候我不说谁说”的历史责任感，奋笔疾书给江泽民同志写信，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 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些零打碎敲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向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当这些国家的领导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发现群众对依靠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给予起码的支持，因而追悔莫及。

他在信中还指出：我国当前经济的困难，从根本上说也是由1984年以后改革滞后、宏观调控机制失效、同时又急于求成而造成的。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膨胀——萧条的循环只会越来越深化，而且存在着陷入停滞膨胀而不能自拔的危险。

在信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也就是说，要抓紧目前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需求与供给比较接近的时机，推出以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不能再用'大锅饭'、'铁饭碗'的老办法，由国家'统'起来和'包'起来。"

薛暮桥这封信，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最终确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封信表现了他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也代表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改革的强烈呼声。很显然，在改革成败的关键时刻，他以自己的行动对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作为一个生于晚清，长于民国，又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的世纪老人。薛暮桥的一生是中国发生沧桑巨变的一百年，也见证了中国经历的三个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也许今天的年轻人提起薛暮桥，已经很陌生，更难以领会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也不会明白薛暮桥当年提倡市场化是要有多大的理论勇气，需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

然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位重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薛暮桥可以说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居功至伟。对于这位世纪老人飘然驾鹤西归，学界不多的大师又少了一位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先贤与引路人。

对于薛暮桥远去，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这样评价的。薛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理论建树、精神风范和由他开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都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

心香一瓣听风语，素琴无弦曲亦伤。今天，当我们享受改革的硕果时，不应该忘记这位世纪老人，这位一生都紧随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

薛暮桥小传

薛暮桥(1904～2005),原名薛舆龄,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1943年起,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建国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全国人大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等。

主要征引书目：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暮桥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修改版。

2.《薛暮桥晚年文稿》，三联书店1999版。

3.《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薛小和主编：《百年沧桑一代宗师——薛暮桥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版。

特别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薛暮桥先生的女儿薛小和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向她致以诚挚的谢意。



董辅礽 （1927～2004）

董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是我最尊重的老一辈学者之一。他的去世，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国家的巨大损失。

——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人若无死，时间便不稀缺。时间若不稀缺，则一切丰盛有余，经济学也就不会出现。所欣慰者，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晓 著名青年经济学者

董辅礽："守身为大"的一代经济学大师

王建明

他，或许并不被经济学界以外的更多人知晓，但其毕生研究的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经济生活；他，或许并不被大多数股民所的认知，但却历经磨难痴心不改，重病期间仍在病床上破解我国股市全流通之谜。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

2004年7月30日下午3:03时，这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停止了思考的步伐。消息传来，令中国经济学界震惊不已，惋惜阵阵。

从1959年，董辅礽出版其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算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一些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董辅礽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创新见解，其中有些见解，不仅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而且得到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构的采纳，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他，最早提出国民收入平衡增长模型；

最早提出改革政企合一、政社合一的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

最早提出按企业功能从宏观和微观两层次改革国有企业；

最早提出"八宝饭"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论；

最早提出共同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等多种公有制形式；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公平 + 市场效率"；

最早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过半才有市场经济的命题。

他，不愧为"敢为天下先"的一代经济学大师。

一、武汉大学早期的地下党员

1927年7月26日，董辅礽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盛的对外贸易商埠，至19世纪60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宁波人经商的足迹遍履天下，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董辅礽的祖父原在家乡务农，后受乡邻经商意识影响，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闯荡多年，进店当过学徒，后来在与外国人和买办的交往过程中学会了一些英语。董父董浚敏，在宁波度过童年后，也赴沪读书。在上海他接触了许多先进思想和西方文化，并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在上海谋生的日子里，他当过英文秘书、中学教师、邮局职员，后来进入宁波人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做事。董辅礽的母亲生长在宁波城里一个家道殷实的小康之家，早年由于家中父母思想开明，董母能像一些男孩子一样，到城里的学堂读书接受教育，是一位气质文雅的妇女。

出生在这样家庭良好的文化环境，使董辅礽在童年时代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对商业文明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和理解，这些为董辅礽后来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培育了良好的环境。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董辅礽平静、欢乐的童年时代结束了。次年，11岁董辅礽跟随家人一起逃难到四川宜宾，再转赴重庆，停顿下来。董辅礽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

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感令中学时代的他开始关心时局，关注民生。抗战期间的重庆，既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心和后方，又是国共双方展开斗争的前沿。董辅礽通过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知道了共产党的主张，也了解了国民党的方针。时局的动荡，世事的磨艰，使他逐渐走出了天真、幼稚的少年时代，思想上产生了进步的倾向，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前途。

1945 年 8 月 15 日，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结束了，对于年仅 19 岁的董辅礽来说，继续求学、科学救国成为他当时最大的心愿。1946 年夏天，董辅礽报考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武汉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而其中声名远播的法学院经济系更是招揽了如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凭借自己扎实的基础，过关斩将，从报考法学院经济系的两三千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进入该系读书。从此，他就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与董辅礽一起进入武汉大学，还有他后来的启蒙恩师张培刚。张培刚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人，也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曾获得哈佛大学 1946 至 1947 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农业与工业化》出版后，成为世界上最早从历史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专著，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方面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南美、北美、西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大学都把它列为基本教材参考书。

大学期间，在张培刚等名师指导下，董辅礽打下了良好、坚实的经济学基础。1949 年，勤奋刻苦、天资聪颖的他，获得了法学院 3 个系第一名优异成绩。全校 6 个学院，每年只有一个名额获得院级奖学金——四明银行奖学金，但他凭借其杰出的表

现和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当时法学院唯一一名获奖学生。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烈的董辅礽又与一些思想活跃、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求真读书会"。该会不仅认真研讨专业理论学习方面中的一些问题，还秘密组织阅读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思想也逐渐转向进步。1947年，董辅礽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大游行和大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活动，成为武汉大学进步力量中的中坚分子。他还参加了武大地下党组织在进步学生中秘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为积极分子，并在组织学生运动、开展护校斗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突出。由于董辅礽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英勇的献身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武汉大学地下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武汉和平解放时，22岁的董辅礽代表武汉学生在迎接解放的万人群众大会上致欢迎辞。次年，董辅礽又被选为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以学生代表的资格成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作为中共党员、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同学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运动。

1953年，董辅礽被保送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深造，在这所拥在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经济专家的著名学府，他度过了四年艰苦的学习生活。在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耶夫和图列茨基等人的指导下，他系统地研修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懂得了如何做经济理论研究。1957年，他以一篇长达20多万字的论文《苏联和中国国民收入》通过毕业答辩，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留苏期间，他的才华给前去访问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因而董辅礽毕业回国后，

孙冶方几经周折将他调到自己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并将其任命为国民经济平衡研究组的副组长。

作为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董辅礽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他就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学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他以渊博的经济学功底、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超常的理论勇气，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由于其在经济领域杰出的贡献，1984年董辅礽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二、所有制改革的拓荒者

从年轻时代开始，董辅礽就一直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即使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也不满足于做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始终关注现实，善于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他说：经济学是一门最为入世的学科。经济学家只有投身经济实践，影响社会才能为民族和人类做出贡献。事实上，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不是提出了什么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第一个提出了所有制改革这一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1978年9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在计划经济的观念在社会上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董辅礽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改革所有制理论，即改革国家所有制，实行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行政社分离，并重新建立乡镇一级政权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这一观念震惊了当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许多人不禁为董辅礽捏出了一把汗。因为在当时大部分人的眼里，改革所有制，就意味着否定公有制。会后，原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拉一拉他的衣襟，提醒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

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

面对种种怀疑和责难,董辅礽顶着各种压力,将报告整理出来,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 年第 1 期上。在文章中,他再次批评了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理论关于全民所有制必须而且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观点,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只按生产资料的归属给所有制下定义,回答不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为此,他从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不同行为方式,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制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存在以政代企的弊端,企业不能独立自主经营;农村人民公社采取变相的国家所有制形式,集体经济单位无权进行自主经济活动。进而,他提出国有经济应当"政企分开",农村集体经济应当"政社分离"。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具有破冰意义,并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持续的影响,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的发表,也吹响了国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同时,这种大胆和对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无疑也奠定了董辅礽以后在以改革为业的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

此后,董辅礽敏锐地洞察到东欧社会主义改革仅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所有制改革,其改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他认为只有大胆地进行所有制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不只是经济运行机制改革,还应该包括所有制改革,而且所有制改革是更为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不可能成功。为此,他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选择决定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国企改革是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对于把国企改成什么样子,他从改革之初就有相当明确的看法。即通过国家所有制

形式的改革使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1988年,他提出让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兼容,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商品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后又提出通过产权改革,使之成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一部分。虽然在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验证了他理论的深邃和独到的洞察力。

1985年,董辅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没有糯米不能成其为"八宝饭",只有糯米而没有红枣、莲子也不成其为"八宝饭",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像"八宝饭"一样,是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这就是他的著名"董氏八宝饭理论"。

1997年他更进一步提出"两多论"和"两点论",即"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任何所有制都有自己的强点和弱点,上述混合经济可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化它们各自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在初级阶段以后也是如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使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必要条件。"这些真知灼见,在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体现。

1997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3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

现在人们在谈论所有制改革时所说的“国有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等，既是他提出来的，也是他一直坚持的主张。这些理论，当今几乎都成为政府的文件语言，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提出它们，却需要有超常的理论勇气。

三、私营经济的护航人

董辅礽为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私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与他的所有制度改革理论一脉相承，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和关爱。1985年，他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次年通过对“温州模式”的分析，又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后，在江浙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在所有制上决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模式”，一个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商品经济的模式。当时，社会上对这两个模式出现了两种决然不同的看法，以至发展到一场“两条道路”的政治争论：对“苏南模式”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极力推崇，对“温州模式”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而极力排斥和压制。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学家到普通百姓，大多都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复辟。舆论更是一片讨伐声，温州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大有人人喊打之势，就连浙江省有些官员也躲避瘟疫一样，害怕与温州发生牵连。

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礽，毅然带领所里

的一批人到温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10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使温州摆脱了由于历史、交通、地理、资源等方面的劣势而造成的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国民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村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城市建设进程加快。回来后，他先后写出十多万字的文章，在温州、北京大学等地和单位作过多次报告，对争论激烈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温州模式”虽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这条路走得对”，“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他希望能把“温州模式”继续坚持下去，理直气壮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此，他还给“温州模式”总结了三条重要经验：一是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三是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事实上，他也是我国第一个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经济学家。现在“苏南模式”已经消失，小集体模式最后带来许多后遗症。苏南的乡镇企业大部分已经明晰产权，走向了温州模式。当年两种模式的争论已消于无形。

除了大张旗鼓地宣传“温州模式”，肯定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外，董辅礽还利用各种机会为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推波助澜，为私产入宪的实现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他曾说过：“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他还呼吁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2002年12月，董辅礽在“十六大与新世纪的中国经济”论坛上，就发展私营经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六大报告强调了保护私人财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

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保护私有财产就要承认其合法的劳动收入。同时对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照其贡献参与程度分配所得。股份公司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以来，社会的财富逐渐正在公众化、社会化。董辅礽就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问题进行表述，认为除了国家需要垄断的产业外，民间资本都可以进入。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此外，他认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解决政策问题。首先应该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领域，给予私营经济“国民待遇”，尽快允许民间资本开办城市商业银行。除此之外，还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对私营经济实行公平政策。

在董辅礽及其他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共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从过去批判、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现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上的突破带来了政策上的变化，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了非常重要的政策、体制环境；2004 年春天，“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终于被写进了宪法，使私有财产同国有财产、集体财产一样受到了法律的保护；2005 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由于董辅礽在中国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他被称为“中国私营经济的护航人”、“民营经济的辩护人”。事实上，浙江因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使其就业形势和发展潜力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四、对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贡献

董辅礽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先行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实践

者。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关注着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人大代表,每年“两会”他几乎都会就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交自己的议案。在他逝世的两个月前,还拖着病体从美国向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发来函电,履行他作为一名理事的职责和义务。他牵挂着大商所期货新品种的最新进展,鼓励其继续努力争取,并为自己不能做事而表示“惭愧”,这或许是这位经济学家的最后牵挂。

对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他可谓关注良多、呵护有加。虽然他曾谦逊地说过:“我并不懂股市,我是作为经济学家来关心中国的股市的。”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董辅礽都有精辟言论。他总是能够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寻找问题,提出问题,指出症结,并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在证券市场长期低迷时期,他能够看到其光明的前景;在高涨时期,则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其不足。由于对资本市场的贡献,他被 CCTV 评为“2003 年中国资本市场年度人物”。

1994 年,正当摇篮中的中国证券市场风雨飘摇之际,他写下了《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的文章,大胆地提出:“证券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在当时对证券市场一片怀疑和否定声中,这种声音显然格外振聋发聩,发人深省。针对有人企图对证券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一关了之。他提出:规范要为发展留有余地,大禹治水,重在于疏;并借黑格尔的名言说:“不能把婴儿同洗澡水一块倒掉。”

1998 年,针对有人提出“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口号。他则认为:不宜过分强调股市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

更不能把股市变成为国企圈老百姓钱的工具。证券市场要以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宗旨。他还更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改组上市意义重大,要允许而且要支持优质的非公有制企业改组上市。

1999 年,他看到了有些市场参与者"有意把水搅浑,以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浑水摸鱼,而那些循规蹈矩的"小民"则只能任人摆布,甚至被宰割"。他怒斥庄家坐庄"精心策划,操纵市场,设下圈套,鱼肉他人,获取暴利。"他主张多管齐下,解决股市的深层矛盾,提出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提高质量,培育机构投资人,健全法规体系的综合治理方案,建立一整套控制风险、约束过度投机的制度和办法;未雨绸缪,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早做准备。

2001 年那场关于股市的大辩论,他也成为焦点人物。在吴敬链等学者发表对中国股市的严厉批评(如"赌场论")之后,董辅礽与厉以宁、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举行记者"恳谈会",全面反击吴敬琏,并称"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现在看来,这场争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求证中国股市究竟是否是赌场,是否应该推倒重来等等问题,而且在于推动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家群体内部的分歧和他们所体验到的市场社会中的"矛盾"。其中的一个矛盾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董辅礽等认为应该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论战的另一方面认为认清股市的真相,才能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先生自己从未涉足股市,他对证券市场的关心绝无半点自利和私情。去世前,他还和媒体通过电子邮件探索我国股市的未来。"他的博士生华生动情地追忆恩师的股市情结。

另外,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参与经济立法的经济学家,他

身体力行地进行改革理论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尽管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立法不是本行，但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后，他很快转换角色，边干边学，"努力跟上去"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

1988年至1998年，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董辅礽担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他不仅参与了这10年里的所有立法工作，而且在1993年－1998年在财经委分工负责经济立法工作，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第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成为国家意志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是在这5年里开始形成的。在10年参政生涯中，他主持或参与过《期货交易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拍卖法》等重要经济法律的起草或审议工作。

1994年，在厉以宁主持起草的《证券法》草案将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前夕，一些部门领导提出一个新草案，要它只管股票交易，成为《公司法》的子法。而厉以宁当时已经离开财经委，有劲使不上了。关键时刻，董辅礽挺身而出，领导财经委顶住压力，使这次"翻牌"胎死腹中。尽管在《证券法》颁行后，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不足，但《证券法》作为既规范证券发行又规范证券交易的母法，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育与发展的起了深远而伟大的作用。此外，作为《证券法》主创成员，董辅礽又连续撰文分析该法的问题和缺陷，提出很多修改建议。

五、"守身为大"的经济学大师

尽管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极尽献媚之丑态，直接为利益集团歌功颂德；有的则为了向上爬，谋求一官半职，不惜做苟且之事，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骨气、正气、良知。然而董辅礽却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坚持人格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经济学家。

2004年7月，重病之中董辅礽写了他的绝笔之作《守身为

大》。在文章中，他写道："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不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在改革开放的曲折过程中，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他认为"守身为大"概况就是"坚守自己的节操是最重要的"，并告诫"大家都要记住这四个字"。

事实上，"守身为大"也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他一生坚持独立思考，坚持钻研学术、勇于探索真理，治学严谨，不唯上、不唯书，尽管经常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从不为名利而进行妥协，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独立人格。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闻也。

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特别赞同董辅礽提出的"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他在《怀念辅礽》的文章写到："古人所谓'守身为大'，不仅仅指一个人能在社会道德沦丧、浊流滚滚的环境中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而且还要能够坚持真理，力所能及地去积极推进社会前进，在现在就是要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同时他还认为：董辅礽的"守身为大"原则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伦理道德、重振人文精神、保证改革成功所迫切需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的一个操守。

经济学家应该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以研究推进"民富国强"，加快建立现代化的、公平而又富有效率的、富裕而又和谐的社会。这实际上，是董辅礽作为经济学家一生所追求的

目标。他曾说，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说得不对，但却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迎合权势，那就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董辅礽逝世后，有人在《中华工商时报》撰文认为："本来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利益集团代言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董辅礽是这样，吴敬琏也是这样；经济学家要学以致用，影响决策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必要，关键是要守身、守住自己的节操，言行一致，以德服人。……董辅礽身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君子而不是小人。"

董辅礽生前对自己有如下的评价："要我谈谈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有什么可说的，那只不过是努力工作罢了，再就是注重独立思考，努力做到不随风倒，不说违心话。由于各方面变革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能努力地跟上去了。"

他讲的都是事实，只是有点过谦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董辅礽的一生，从他的行文、从他的做人，他一直是要代表全民的利益，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从个别集团的利益来思考问题。想着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怎么能够发展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到看到他为什么那么忧国忧民？为什么敢于坚持自己的各种观点？为什么敢于分析很多从当时看来好像很多很难碰的问题？他的友人这样评价他：在学术上，董辅礽仍有不少"敌人"，但在生活中，他却没有"敌人"，虽然他的面孔冷峭，却"待人如水般清澈"。

在他的学生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的眼里，恩师董辅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学术带头人。他说："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始终保持着学者的独立性。他比较淡泊名利、冷峻、寡欲、清高、爱憎分明，如果是不喜欢的人，无论是什么高官显贵，说话都不会和他说。”

著名的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于光远先生曾这样评价董辅礽，“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贯正道直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主张，都是以一个正直、勇敢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和经济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地提出的。而且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顾中伤和攻击，坚持自己的看法，从不见风使舵，不随声附和，更不在某种压力下屈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

事实上，纵观董辅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寻求强国富民之道的一生，是历经磨难而坚持真理的一生。尽管在每个历史时期，他所提出的观点几乎都具有超前性，但每一超前性理论的提出，在当时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攻击或误解。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不为外界因素所影响。他常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迎合权势，就背离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董辅礽为推动中国改革所做出的贡献也赢得了国际尊重。在他逝世前几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多次致函董辅礽，邀请他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此项工作，也表明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他的认同和信任。1988 年法国政府授予董辅礽“军官级学术勋章”，法国驻华大使亲手为他佩戴勋章。法国政府的表彰信中写着“……您以慎重的态度为改革打下了基础，致使改革必将载入中国当代史册……”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追思音。作为享誉学界的一代经济学大师，其“守身为大”的精神，精湛的学术思想和为中国

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一直萦绕在一代经济学人的心中。这也许是他逝世之后,全国各主流媒体集中悼念和追思他的原因吧!

董辅礽小传

董辅礽，著名经济学家，1927年7月26日生于浙江宁波。1946考入武汉大学，4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53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获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讲师、经济研究所所长。1985年任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亚非国家高级官员学习班主讲，同年赴联邦德国及英国讲学。1979年后，他最早提出了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与形式区别开来的论点，相应提出了“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政策性建议。著有《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

1977～1978年经济研究所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1981～1987年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1991～1993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济顾问、国际研究所所长。1978～1988年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经济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1988年至1998年先后担任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家环境保护局顾问。

董辅礽学术成就在海内外赢得了较高声誉。1984年他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88年被法国政府授予“军官级学术勋章”。

主要征引文献:

1. 董辅礽经济学发展基金会编:《追思董辅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2. 薛永应:《董辅礽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 叶辅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评传——董辅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4. 董辅礽:《董辅礽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5. 董辅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特别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李智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第三辑
终极关怀的人文社会学大师







巴金 （1904～2005）

大师，我很荣幸地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授予您荣誉军团勋章。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艺术不倦的创作者。您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密特朗　法国前总统

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20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巴金：永在的青春和真

——一代文学巨匠

姜海龙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读到了巴金先生的那篇《怀念萧珊》。那时候正是读高中的时代，世事沧桑于我还是遥远的风景，许多人生的苦难尚蛰伏在未来的岁月之中。然而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郁，还是让我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之下为世间有这样的真情而感伤不已。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将巴金所有的小说和散文都找来断断续续地读完。一个孩子，对于文学没有什么鉴赏和品评的能力，只知道感动，只知道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找到了现实所没有的纯净的东西：爱情、青春以及命运。转瞬之间，十年的日历轻轻翻过去了。而巴金先生也在不久前作古了。总想写些什么来向巴金和我心中的文学理想致敬，那么多怀念的文章中，也许，质朴的题目却能彰显真情。

一、一个叫李尧棠的孩子

1904年11月25日，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里，传来了孩子响亮的哭声，这个排行第四名字叫"李尧棠"的新生婴儿就是后来的文学大师巴金先生。

1904年前后，正是旧中国的多事之秋，晚清王朝已如危楼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成都李家虽然不是钟鸣鼎食的地方巨

族，却也称得上是封建大家庭，巴金的祖父李镛、父亲李道河，皆做过清朝官员。衣食无忧的家庭环境，使这个叫李尧棠的孩子能够整日天真而快乐地生活在疼爱的目光中，不必过早地感受到世事艰辛。

和许多孩子一样，李尧棠最为依恋和崇拜的人就是母亲陈淑芬，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巴金一生也许会有许多值得铭记的时刻，这些时刻或幸福或痛苦地成为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或坐标，但是母亲的音容笑貌与呵护却是他所有记忆的开始，因为这是生命延续的规律。当暮年老人打开记忆的闸门开始回首往昔时，母爱是通往世间的第一座桥梁。“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母亲温柔的声音。”在咿呀学语的时光里，巴金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

母亲陈淑芬尤其喜爱这个排行第四的天真的孩子。她不止一次的为孩子们讲述着一个相同的故事，那是一个有些神奇的梦。母亲说在她生日的头一天的夜里，送子娘娘飘然入梦，告诉她将要送给她一个娃娃，这个娃娃本来是要送给弟媳的，只是怕她不会好好地爱他，所以才会送给母亲。果然，第二天母亲的生日，就生下了这个孩子。每每讲到这个地方，母亲就会停下来，问围坐在一边的孩子们，这个孩子是谁？然后摩挲着巴金的小脑瓜说：“就是他。”巴金就和兄弟们一起开心地笑。这也许是命运神奇的地方，巴金和母亲是同一天生日。

在母亲的疼爱中，巴金度过了近似金色的童年。白天在环境幽雅的书斋里和兄弟姐妹们读书习字，放学之后，叫上家里年龄相仿的丫环，和三哥一起到后院的草地上嬉戏玩耍。为了采摘饱满硕大的桑葚，他常常将手和脸弄得全是紫色的桑葚汁。家里还养了一大群的鸡，这成为巴金儿时最快乐的来源之

一。他喜欢这些鸡，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军队"，为每一个士兵起了名字。早晨，巴金会跑到鸡舍为自己的"士兵"开门，并且点名、喂食。下午放学之后，他会和三哥一起扎进草垛中，寻找遗失的鸡蛋。有一天，巴金突然跌撞着跑进母亲的房间求救。原来是厨师拎着菜刀正满院追逐巴金心爱的"士兵"。母亲问明了儿子原因，就答应带着他去阻止厨师杀鸡。然而，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巴金的"士兵"已经"牺牲"了。为这件事，巴金难过了很长时间，母亲看出自己疼爱的孩子有着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

作为孩子的巴金，其善良和敏感还表现在另一些小事上。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清朝的官员，曾经做过广元县令，因此全家也随之住在县衙大院里。巴金在做完功课之后，也常常到衙门的二堂公案边，看父亲审案子。令幼小的巴金困惑的是，慈爱的父亲怎么突然间就成为"青天大老爷"，威严得让人感觉可怕。而目睹了给犯人用刑的过程，更是让巴金感到难以忍受，为此，他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父亲。此后，父亲果然就没有再使用过严酷的酷刑。但是巴金的心灵里却长久地留下了一些挥之不去的阴影。文学，常常是从童年时敏感的心灵就开始了。

巴金走上文学的道路，除了善良和敏感的天性。也有母亲的引导。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嫁到李家之后，并没有放弃对书籍的喜爱。在母亲保存的众多书籍中，清人舒梦兰编的《白香词谱》是她最为喜爱的。在寂静的夜晚，或是皎洁的月光下，或是一豆灯光下，母亲将几个孩子聚拢在身旁，一句一句将诗歌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也以童音相和着学唱。浸透母爱的诗歌在悄无声息之间浇灌进了纯洁的心灵之中。巴金无限眷恋地感慨说："这是我童年唯一的音乐。"

然而，幸福太短暂了。在巴金10岁那年，一个闷热的夏夜，母亲病逝了。在她弥留之际，她很想再看巴金一眼，然而为了不惊扰熟睡的孩子，她还是选择留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夜晚。第二天清晨，醒来的巴金得到的是天人永隔的噩耗。在母亲的灵柩前，一个10岁的孩子只能以泪水和哭声表达对世界塌陷的痛苦。幼年丧母，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何况，母亲又是如此宠爱着这个孩子。

随之而来的几年里，二姐和父亲又相继去世。旧岁新年，尽是叠愁。这个叫李尧棠的孩子的童年结束了，而生活的苦难与命运多舛开始降临。

二、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对每个人来说，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莫过于青春年少时。

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之后，巴金似乎在短短的时间里长大了。失去父母的呵护之后，他对生活在其中的大家庭的纠葛和倾轧看得更清楚了。这个大家庭在走向崩溃，而没落的过程是黑暗和令人窒息的。他看到二姐和大哥成为牺牲品的命运。他也通过自己的家看到社会的不公平，他发誓要做一个站在轿夫与仆人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少年的激情和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气质，使巴金对于围绕在周围的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从1909年5岁进私塾认字到16岁时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特别是期间所经历的家庭变故，使巴金逐渐开始沉迷于深深的思考之中。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启蒙。巴金15岁那年，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那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纸、书刊在成都也广为传播开来。《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一大批宣扬新观念的刊物出现在巴金的视野中。

《新青年》是巴金最热爱的刊物,少年巴金曾怀着一颗战栗求助的心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写信。最终,他没能等来回信,这是他少年时的一个挫折。与此同时,巴金读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书号召青年为社会的正义、平等和自由而奋斗,巴金说:"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此后他翻译过不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高德曼的《无政府主义》使巴金第一次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理论。巴金说:"这时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他将高德曼比喻为"精神上的母亲"。巴金的大哥在"华阳书报流通处"预留定金,每天去取回新报刊,晚上兄弟们聚在一起贪婪地阅读,热烈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热情如火的巴金敞开胸膛去吸收和消化,而五四精神也从此成为巴金一生思想上的源泉,巴金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

然而,思想的激昂与亢奋取代不了被现实压抑的挫折感。青年巴金决定要走出去寻找自己的未来。与他同行的是三哥李尧林。这个与他从小一起读书、玩耍的三哥也是巴金的志同道合者。暮气沉沉的李氏家族已经吞噬了善良忍耐的大哥,兄弟二人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两位少年在大哥的支持下,决定顺江东下,到上海读书接受新的知识。1923 年 5 月的一天,三哥李尧林与巴金乘一条木船离开成都,码头上送别的大哥身影渐行渐远。虽然,离开了重重束缚的家庭,有着说不出的幸福和自由。然而,未来却也是迷茫不可知的,就连这一江"可祝福的水"究竟是怎样蜿蜒在中国的土地上,兄弟二人也都一片茫然。更不用说前途、学业,还有那一个朋友都没有的遥远的上海。巴金的一首旅途小诗流露出这种无所依托的怅惘:"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旅途颠簸劳累。两人一路上由小木船换小火轮,又由小火轮换大轮船,再由轮船换火车,整整历时一个月才到达上海。初到上海,幸亏一个在上海做事的远房亲戚,将他们安排在了四马路上申江旅馆。马路的对面就是上海著名的笙歌世界,当纸醉金迷的夜景映射入这两位远道而来的青年的眼帘时,上海声光电化的现代世界不知道给他们的心灵怎样的震撼?

是年初秋,兄弟二人双双考入南洋中学,但是南洋中学昂贵的学费却令他们望而却步。因此不得不寻找其他收费便宜的学校,可惜未能如愿。巴金与三哥又辗转来到南京,并且幸运的考上了东南大学附中。兄弟二人在租来的简陋至极的屋子里,每天晚上都相对而坐,借着昏黄的油灯,拼命地读书。异乡异客的他们,除了大哥每周的家信与资金的接济,似乎与成都的家失去了任何联系。而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和亲戚,偶尔与人打几声招呼外,再无交流。孤独、贫困处境下的兄弟二人,在相依为命的同时,也抱着对未来的幻想和希望。

1925 年夏天,巴金与三哥都高中毕业了。李尧林的志愿是报考苏州的东吴大学,而巴金却向往北京大学。兄弟二人不得不因为志愿的不同而分手走各自的路。北上的巴金怀着满腔的希望来到北京,却在北京大学的体检中查出患有肺结核。半个月之后,三哥李尧林如愿的考上了东吴大学,而巴金因为需要治疗肺结核病,不得不重新回到上海。兄弟二人就此作别,巴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涯。

回到上海后,养病间隙的巴金,开始辛勤地写作,他也慢慢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不过,大哥与三哥仍是他心底最深的牵系。1927 年,巴金决定赴法国留学,去更远的异邦追寻年轻的梦,尽管大哥与三哥最初不太情愿弟弟的选择,然而出于兄弟间的情谊和对弟弟的关爱,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幼弟的想法。

青年巴金为了人生的梦想,再一次去往陌生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是从离家很远的地方到离家更远的地方。1927年,准备妥当的巴金乘船从上海出发,三哥因为经济的原因并没有来送他,在无人认识的码头上面对空旷寂寥的大海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巴金那颗年轻的心既热切又惆怅。从上海到法国,当时的交通条件需要走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漫长难挨的时间里,除了每天看海上的日出,巴金将自己海上的所想所见都记下来,这就是后来的《海行杂记》。

巴金的法国生涯与他在上海、南京的生活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漂泊流离。对于每个人来说,离开了家和母亲,什么样的生活不是在路上呢? 不过是从一个陌生地方去往另一个陌生地方的西西弗式运动罢了。不过,在这异邦的求学生涯中,青年巴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处女作《灭亡》,标志着一位作家的诞生。巴金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而巴金的笔名也正是在《灭亡》之后获得的。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巴金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璀璨光辉的名字之一。

此时,尽管青年巴金仍然时时陷入追求理想的迷茫之中,但文学从此成为他一生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灭亡》的诞生,开创了巴金以青春的激情写作的风格。李健吾曾经指出:

"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

巴金在1951年修改《家》时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三、作家巴金

从1927年到1946年，是巴金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高峰。在此期间，巴金创作完成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还有《寒夜》、《憩园》等文学作品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丰碑，这些作品处处浸透着巴金青春的激情、真诚、宽容，还有爱。

1928年12月，巴金归国回到上海，旋即投入到热烈而疯狂的翻译和写作之中。在历时约一年的忘我创作之后，1931年4月18日，上海《时报》开始连载巴金的最新之作《激流》。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看上去有些憔悴病容的青年写就的这部颇有自传体风格的作品，顿时畅销一时。连载的《激流》很快以《家》名字结集成书。从此开始了它不断重印的历史。据有人统计，《家》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一部小说。20世纪30年代，巴金的《家》与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成为辉映新文学史的长篇巨作，如今，这些作者皆已作古，他们的作品早已成为新文学的经典。和茅盾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剖析与老舍对下层老百姓的深刻理解不同，巴金的《家》展现的是旧家族的覆灭和青年的反抗。由于他青春的激情与理想主义气质，《家》赢得了当时许多青年的热爱。在巴金所有的作品中都洋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如他所说是"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家》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

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巴金写道："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开头与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久久不能离开书中的世界。为觉新的隐忍感叹，为梅表姐的遭遇唏嘘，为觉慧的勇气而击节赞赏。就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也许读者已经不能对书中所描写的封建家族感同身受，然而，书中迎面扑来的真挚、纯洁的青春、爱情和理想，还是会跨越一个世纪之后，让你动容，让你也与一个世纪之前青年男女一样心潮彭湃甚至以泪洗面。何谓经典？流行一时而最终湮没在时间海洋之中的，只能叫做畅销。古往今来，大浪淘沙之后又有几部文学作品能经久不衰？《家》的恒久，是因为巴金触及我们心灵中对于爱以及美的永远的渴望。何谓大师？至少在文学领域中可以这样说，他有能够屹立一百年的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家》也是巴金的自传写照，映射的是他与兄弟姐妹们在家族的感受，觉新与大哥的相似，18岁的觉慧站在沿江东下的船头上，告别家和故乡，随流水流向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就是作者当年离开成都去上海的翻版。只不过一切艺术化了。巴金说过，他有俄国的老师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他有英国老师狄更斯，他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他的中国老师是鲁迅，但是他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的社会生活。生活中的感受使他成为作家。正因为每个作家的人生不同，你才能看见不同的作品。

当然，《家》仍然有许多被人诟病之处。如文章缺乏艺术锤炼，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有些文字不够简练。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似乎是在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 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显然,巴金并非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艺术家,他最初的写作动机只是为了一吐块垒,抒发胸臆。瑕不掩瑜,《家》的缺点并无碍于她的光辉。毕竟,心灵的感动才是最重要的。

《家》的辉煌,奠定了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地位。自此之后,巴金文思泉涌,日以继夜地写作、翻译出大量作品。《家》之外的《激流三部曲》还有《春》、《秋》,以及《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都是足以感动一个时代的作品。进入20世纪40年代,巴金的激昂、热切依然如故,但他的小说的写作风格随着世事沧桑,变得更为内敛和深沉。如果说《家》是以火的热情向读者倾诉,那么《寒夜》、《憩园》、《第四病室》就更像一杯茶,其中深沉悲凉的人生感悟,需要去慢慢品尝,才更有悠久的悲剧回味。尤其是《寒夜》,小说以一种在废墟里低沉回环的笔触,"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以至于"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的人生社会悲剧。而《憩园》仍然写一个大家庭败落的故事,只不过开始有"冷冷的智慧"。巴金笔触与情感的内敛,使他在艺术境界上更上一层楼,在大众的青睐之外,也获得了文学评论者"小众"的激赏。

巴金早期的作品,如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了人们广泛的赞誉。也由于其突出的社会影响,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20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作为作家，巴金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而他对于"人"的关怀也让人为之震撼。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四、怀念萧珊

她是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 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38 年和 1941 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1944 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 20，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巴金曾这样描述妻子萧珊。作为一位文学大师，巴金的爱情与他的小说一样，也让人感动。

巴金的妻子是陈蕴珍，不过她的笔名萧珊更为世人熟知，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篇让人泪下的《怀念萧珊》。萧珊 1918 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她比巴金小 13 岁。1936 年前后，年仅 32 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上已经名满文坛，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地感染了青年一代。有许多年轻人写信给巴金，探讨和表达对生活的看法。这其中有一位笔迹娟秀、言词不多的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个女孩就是萧珊。他们就这样彼此通信长达多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

最后，还是萧珊在一封夹着她的照片的信中提出双方见面的要求。巴金也对这个小笔友充满了好奇，双方约定在上海的新雅饭店见面，从此开始了巴金与萧珊一世的情缘。萧珊没有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大作家是一个个头不高，说话带有四川腔、又不太擅言词的中年人。这次面谈，给双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后，两人开始了长达 8 年的恋爱。

两人相识之初，巴金觉得萧珊主动爱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但是萧珊却因为巴金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而爱他。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道路因此产生了一段小插曲。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账。"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的这番真诚的表白坚定了萧珊决定和巴金在一起的决心。

两人此后的爱情之路，几乎与抗日的烽火同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高中毕业的萧珊参加到青年救护团之中，与同学一起抢救从前线上下来的受伤士兵。而巴金也以笔为矛，撰写和编辑抗日刊物。他把这段共同抗战的经历写进了抗战三部曲之一的《火》中，小说里纯真而美丽的女主人公就是以萧珊为原型。全面抗战之后的两年里，巴金和萧珊辗转流亡于武汉、广州、桂林、上海之间。虽然，时局的艰辛与生活的困顿使两个人遭受了很多苦，然而有萧珊在身旁，巴金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诗意。他们的爱也沉淀在互相依靠的生活中。

1939 年夏天，萧珊要去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而巴金要蛰居在上海写《秋》。热恋中的人不得不暂时分别了。他们之间只能以鸿雁传书来表达相思之情。转过年的 5 月份，巴金的《秋》完稿，而上海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带着对萧珊的思念，巴金千里迢迢赶赴昆明与所爱的人团聚在一起。上海开明书店经理

卢芷芬将书店的一间书库借给巴金居住，这间充作书库的房子坐落在一片幽静的环境之中，巴金在居住的三个月里，几乎与世隔绝了，每天都是惬意地挥笔创作。还有萧珊周六、周日和放假的时候，陪伴在左右，一起散步，一起讨论文学，一起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这是巴金和萧珊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甜美和醉人的生活。

三个月之后，巴金就不得不赶赴重庆为文艺界的抗战事宜奔波。而他和萧珊又经历了近5年聚少离多的相思岁月，直到1944年5月，萧珊与巴金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如果说，巴金和萧珊之间真挚的爱情在他们相识到结婚的过程中，充满着爱的平实的浪漫，那么"文革"岁月里，他们对爱情的生死坚守，则显现着对爱惊人的专一。

"文化大革命"前，坚持真理、提倡文艺自由的巴金，得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受到了错误地批斗和"改造"。"文革"正式爆发后，巴金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巴金的挚友老舍先生因为不堪凌辱而投湖自杀。善良、真诚的巴金，其境遇也每况愈下。在这痛苦的日子里，是萧珊给予了巴金坚强的力量，她坚信，李先生是好人。有一段时间，巴金每天要到上海作协去接受"审查"。萧珊每天天不亮就要送他出门到电车站。因为上班高峰时间，公车特别拥挤，乘客把车门口堵得严严的。萧珊就在车下用纤细的双手和双肩用力地推着巴金微驮的后背，使劲帮巴金往里挤。白天，巴金经常被揪斗。每逢夜晚来临，巴金跨进家门，一看到妻子萧珊关切抚慰的目光，磨难顷刻去了大半。有一个时期巴金和萧珊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睡觉，可是天将发白就都醒了。两个人就互相叫对方，巴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萧珊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

句:“坚持就是胜利。”在黑暗中,两人用爱情的微弱之光彼此照亮对方。

但萧珊的健康还是被拖垮了。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她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直到 1972 年 7 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萧珊开刀后仅活了 5 天。1972 年 8 月 13 日,萧珊走了,带着对巴金的爱情走了。

六年之后,当痛苦的波浪稍稍减轻一些,巴金写下了《怀念萧珊》。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周立民先生在对巴金的《随想录》的手稿进行校斟时,发现巴金的《怀念萧珊》的第四部分最末段之前,在修改时删去了这样一段: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太远了。行文至此,还有什么言语能够对巴金与萧珊的爱评论和赞美呢?也许,只有感动之后的感动。

五、讲真话的老人

晚年的巴金,更加“返璞归真”。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说真话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现实的代价太为残酷了。已是古稀之年的巴金老人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以他一生的真诚和理想主义气质,在暮年成为一个讲真话的老人,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守护人和象征,成为老而弥坚的社会良心。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

话，——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成兽，无论谁拿着鞭在我背上鞭打。

——巴金《随想录》

晚年巴金在文学创作上迎来了又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主要指的就是花了 7 个春秋，动笔之时 75 岁，搁笔之际已 82 岁的《随想录》。

1978 年 12 月 1 日，年逾古稀的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并写下第一篇《谈〈望乡〉》，从此一直到 1986 年 8 月 20 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 150 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 30 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历时 8 年。诚如陈思和先生所言，《随想录》的每一篇，每一章，几乎都流淌着巴金灵与肉的血。他无情地拷问自己，揭开自己身上最痛苦的伤疤。从否定和拷问自己开始，巴金在《随想录》中表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和独立思考。他也从自己身上的弱点出发，号召知识界和社会要勇于面对曾经犯过的错误，说真话，去真诚的生活。显然，《随想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上的意义，而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史。“讲真话”由巴金这样的文学老人发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中，成为当时知识界甚为震撼的“话题”，巴金也由此获得了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随想录》里那些质朴的文字遂成为映照千古的经典之作。

除了提倡讲真话，断断续续地写《随想录》之外。晚年的巴金还打算倡议建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前者巴金生前终于看到了，后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从 1979 年开始，巴金就梦想创办一所现代文学馆。为此，

他在《随想录》中写道“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巴金心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书、手稿、信函等，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个总结。当他公开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时，很快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当时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曹禺等老一代作家均表示热烈支持。在他的倡议下，不到两年时间就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1985 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北京西郊的万寿寺成了文学馆的临时馆舍，巴金成为名誉馆长。由于万寿寺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改建，而里面设备较差。1993 年，巴金又为文学馆新馆的选址和资金问题，特意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希望中央关心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建成。除了呼吁和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建成之外，巴金将文学馆视为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为此，在近 20 年里，他一直在为文学馆捐款献物。先后捐款 25 万元左右，是文学馆建设中捐款最多的作家。先后 10 余次把大量的收藏多年的各种版本和外文译本的作品、手稿、书信、照片等捐献给了文学馆，共 7700 余件，其中不乏珍贵稀有的精品文物。

1985 年以后，巴金因病再也没有来过文学馆，但他始终心系文学馆。如今，每一个走进现代文学馆新馆大门的读者，都会感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的风采。文学馆所有玻璃大门的门把手是铸铜的，那是雕塑家用巴金的手模翻制而成，第一个进入文学馆的人，首先就会触摸到它，轻轻地接触，一如与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轻轻地握手，走进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

晚年的巴金对托尔斯泰有着一种共鸣，他在《随想录》里多

次讲到老托尔斯泰。1991年，舒乙到前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他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回国以后，舒乙给巴金寄了几朵，写信告诉他，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没想到没过几天，已经不太能写作的巴金回了一封很感人的信。他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六、一盏灯

2005年10月17日19时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1904年11月25日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出生，到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巴金走过的是101年的人生历程。进入晚年，特别是21世纪之后，巴金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象征，是五四新文学的最后一位文学大师。

今天巴金死了，然而一盏灯却亮着。这盏燃烧了101年的灯，曾经，以微弱的灯光吞噬了整个黑暗，给我们温暖。它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灯光中我们依稀照见巴金曾经走过的一些道路，他曾坚持和主张走的那条道路。路旁行道树的树叶，在这个秋天翩然飘飞，夹在时空记忆中，巴金的零星的片段在秋天扬起又飘落。

巴金死了，"鲁郭茅，巴老曹"遂成人间绝响，一个时代也骤然落幕。然而，这位老人却永远活着，他始终像一团火，点燃我们；像一盏灯，照亮我们。

巴金死了，这对于巴金而言，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涅槃，一种永生，一种通向存在的死亡。它不仅长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留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中，更长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巴金小传

巴金(1904－2005),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7年旅居法国,次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5年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目前所见到的巴金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7月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刊登的新诗12首《被虐待的哭声》。1927年旅居法国期间,创作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1931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在《时报》连载,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被译成20多种文字。1934、1935年写了《神》、《鬼》、《人》三部短篇。长篇小说有《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78年底～1986年8月,创作了五卷本散文《随想录》。1958～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文集》14卷。1994年《巴金全集》26卷全部出版。

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1981年巴金被选举为中国作协主席。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的著作被译为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

主要征引书目篇目

1. 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 2005 年版。

2.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3. 巴金:《巴金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 2005 年版。

4. 李舒:《老巴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5. 刘屏:《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6. 文洁若:《俩老头儿》: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 年版。



费孝通 (1910～2005)

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指《江村经济》，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马林诺斯基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

即使是做了官，费老在政务上的成就蛮大的，但是在他身上，还保存一种秀才和文人的感觉，并没有因为当官而改变什么。在当官以后，他仍然能够不断做学术，在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还经历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为人为学的态度鼓舞了我们。

——王铭铭　北京大学教授

费孝通：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

——诚挚追悼一代宗师费孝通教授的仙逝和几点个人思考①

王胜泉

我的老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仙逝多日，许多朋友对我说：你与他那样熟，写点回忆文章吧。但是，提起笔来，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不知该回忆些什么。我从 1947 年认识他，至今已有 58 个年头。费孝通作为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反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和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学术自由，要求人民当家作主，能走上富裕强国之路。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历经各种磨难，自始至终，一直是共产党的好朋友。这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走过的人生，其中有许多生活琐事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一、清华园胜因院的长谈

1947 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慣因、吴良镛门下。这时，国内局势已十分危急，国民党统治者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一切民主力量。7 月 4 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剿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声称“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为，均应依法惩处”。10 月 23 日，国民

① 本文为王胜泉教授生前最后一篇文章，2005 年第 10 期发表于《人生》杂志，后《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 5 期又全文转载。

党政府派大批军警和特务包围南京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并强迫民主同盟于10月27日宣布解散，拉开了内战序幕。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陷于混乱状态，物价成倍飞涨，法币迅速贬值，民不聊生，前途无望，工商业濒临绝境。10月中旬，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噩耗传来，清华园学生掀起怒潮。我们连夜组成游行队伍，进城在北大五四广场，集会声讨，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在游行队伍走出五四广场时，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发生冲突。一场混战中，我的头部和左臂都受了伤，接受了血的洗礼。返校之后，我义愤填膺，觉得在如此黑暗岁月，"不是学盖大楼、盖别墅的时候"，而是应该"学一套救民于水火的本领"；于是决定转系。当时清华大学规定：凡工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我当时选的是社会学，授课者为吴景超教授。但是，当我与魏姓同学（也是1947年进清华，读的是社会学系）商量此事，并请他陪我去见吴景超教授以便请教转系之事时，魏却建议我去见费孝通教授，理由是：费也是先读医科，后来专读社会学，一定有切身体会。于是，由他向费代为请求，约定一个下午到胜因院费的寓所去见他。

应该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费。由于费是当时清华园很有名的民主教授，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都来参加、发表演讲。而我当时作为一个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这些集会自然也都会参加，因此，见到费是很经常和容易的事。但是，直接到他家去拜访并请教个人问题却是第一次，为此，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胜因院教授宿舍是两层楼，楼上是卧室，楼下是书房和客厅。费是在书房接见我。当时他听到我叙述了个人的苦恼和决定，他的藏在眼镜后面的大眼睛立即闪跃出兴奋的光芒。

他对我说:他也曾参加 1927 年兴起的学生运动,但是,后来学生运动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他自己也心情懊丧,生活孤独,有点泄气。当他准备考大学时,他就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于是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医科,准备将来进入协和,毕业后当个好医生,为人治病,准备通过学医来服务社会,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但是,两年后,生活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他在转学到燕京大学时,毅然改学社会学,决心学一门了解社会"解剖社会"改造社会的学问,毕业后服务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因此,他对我下决心转学社会学,不但是举双手拥护,而且是十分理解,并称赞我是他的"同道"。费的这番话消除了我心中的不安情绪,一下子就缩短他这个著名学者、洋博士和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无名小子的距离,而且坚定了我读社会学系的决心,从此进入了社会学这个领域,至今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了。但是,他当时讲话的激动面容还深深印在我的心头,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从 1947 年至今,58 年过去了。社会学在中国遭遇到曲折的命运、废除、恢复、重建,大发展,费孝通教授本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但是,费孝通当年教导我:"一个年轻人,要心中装着国家,装着民众,不是为个人名利,而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去奋斗。我们要牢记先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立志为国,立志为民,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高尚的人。"这些话一直在我耳边。我是十分感谢费孝通教授指引我进入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我为自己有幸结识费孝通教授这样的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代表而自豪。胜因院的午后谈话决定了我人生的道路,从此我走上艰苦的为国为民的艰难科学研究道路。作为社会学理论工作者

的人生旅途，一直至今。费孝通可以说是影响了甚至是引导了如我这样一代知识分子走向人生、走向科学现代文明。

二、我们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

1948年秋季开学，我正式成了社会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却不与1948年新入学的社会学系的新生一块上课，因为他们必修的社会学概论我已念过了，我可以选课了。我选的第一门社会学专业课是费孝通教授开的"社会变迁"。与我同选此课的是当时读社会学研究生的周光灿，两个人每周到费家去上一次课。从此，我成了费家的常客，费师母（孟吟）成了照顾我这个穷困而又远离家乡的穷学生的恩人。我已不记得在费家吃过多少次饭，总之是给了我无限温暖和亲情。

费孝通教授讲课，一向是不按部就班，照本宣读。这次教我们的"社会变迁"课，也是如此。他开课第一讲，就是拿出五本英文书，叫我们一一去读，然后写出读书报告，提出问题，在堂上讨论。我记得：除了英美关于社会变迁的教科书外，还有一本就是他自己写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过是英文本。我的家乡是苏北偏僻农村，当时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和中国经济分析文章，因此就以阶级分析观点对这本费先生最自豪的著作提出批评，并以自己家乡的实例一一加以说明。本来我心中十分担心，怕由此引起他的震怒，扣我的学分。谁知他听了我的批评，不仅不震怒，反而详细询问我的家乡苏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听到与苏南农村情况大不相同的情况时，还不时在本子上记下来，课上得十分融洽。待这5本书讨论完后，他给我们两人布置了一道研究课题。当时，他正与社会系美籍教授 Robert Redfield 和一些年轻教员探讨"中国绅士的社会地位"问题，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权、绅权以及官僚、外戚、宦官、世族、军阀间的权力斗争和变迁脉络，理出一

个头绪来。于是,他叫我们每个人到图书馆借《汉书》一部,通读一个月后,向他报告对汉代封建权力结构分析的一些看法。由于我当时只是大学本科生,图书证只能借少量书,无法借卷数很多的线装《汉书》,于是费先生便将他的借书证交我使用,并为此给当时图书馆出纳部写了一个条子说明情况。记得当时我持条去借《汉书》和其他许多参考书时,图书馆一位老职员还悄悄问我:"你是王同惠(费的前妻)的什么人?"实际上,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的授业弟子而已。但由此也可看出费是多么热爱教育工作。在这样尽心授业的老师教导下,我又怎会不努力呢?

在这一个月内,我经常去费家。原因是我当时基础科学知识还十分欠缺,搞科研更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而这项课题研究却是十分复杂、难搞,因此我不得不经常去请示。于是,费先生如保姆一样,从如何读古书、查《康熙字典》、朝代纪年表,到分清本纪、列传、附传,又如何从事件中看出权力斗争痕迹,以及怎样收集资料、辨别资料,拟定提纲、决定主题、提出论点。总之,给了我手把手的直接指导,使我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该如何进行,以及怎样小心求证和如何建立理论体系。我仿佛身入宝山,一下子见到学术研究这个新天地,受益之深,终身难忘。当时我在社会系的另一位授业老师史国衡教授说:"这是研究生的教学方法,你能得到费先生亲自指导,十分不易,你要珍惜啊!"我听了很感动,因而也就更努力了。

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书斋研究被窗外炮声击碎。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战役、济南战役、天津战役、淮海战役都已结束,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我当时家已迁往台湾,父辈都在台湾做官,他们纷纷

要我尽快赴台。我犹豫难决。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带一些著名教授乘飞机南下，我就问费先生："你走不走？"他说："我不走，我要留下迎接解放。"费孝通当时还给我讲：一个人的一生要遇到许多人生关头，要头脑冷静，慎加抉择。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知识分子要迎接光明，不要追随黑暗。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做新中国的开创者？还是作旧社会的殉葬品？你的前途在那里呢？真是一席话惊醒梦中人，费孝通的态度决定了我不去台湾的决断。我后来读费在当时给 Redfild 教授的信中说："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具有具体含义。"我想：费孝通教授是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解放的，他是真诚的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而献出自己的才智。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清华园教授们的心声。这包括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如我的老师潘光旦、费孝通，也包括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其他教授，如我的老师吴景超、陈达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真的是众人共同心声。在历史抉择关头，费孝通的道路是决心迎接解放，作共产党的朋友，而且终生不悔，直至仙逝。费孝通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表率！我为有这样的老师而骄傲。

三、"大课"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49 年 5 月 5 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费是该委员会的九位常委之一（另有叶企荪、张奚若、陈岱孙、周培源、钱伟长及讲师助教代表和学生代表各一），并担任"大课"的组织领导工作。所谓"大课"，是因为参加听课的不仅有全校学生，而且有全校教学人员和职员工友，规模之大，在清华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因之被人们称之为"大课"。实际上，这是全校师生员

工共同必修的政治课,并强调这门课程的任务是改造思想。后来,费在《我们的大课》一文中说:

>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旧社会里生长大的,旧社会里封建的、官僚的、买办的势力多多少少影响我们,养成了我们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们不但要在社会制度上打倒和消灭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而且还得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习惯上根除它,如果留着祸根,这些习惯和思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长出封建、官僚和买办的社会制度来。……政治教育在我们大学里已有了很长的历史,(但只有)人民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人民的国家,我们才能合法的、正规的、大规模的、有系统的进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能成为大课是人民权利的结果。

这篇文章发表后,费曾问我:"同学们有什么意见?"我说:"大家都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但对其中'如果留着祸根,这些习惯和思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长出封建、官僚和买办的社会制度来'很不理解,也似乎不符合社会学根本理论。"他当时笑而不语,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他当时怎么会写出如此极端的言词来。

大课进行半年之后,进行思想小结,每人一份,交到大课委员会,积累下来,达数千份之多。这时,我在选修费的"农村社会学",但课堂之余,时常讨论"大课"中的问题。有一天,费叫我到大课委员会去读这些小结,并为他做些资料性工作。后来,这些思想小结实在太多,费就将图书馆楼下他的办公室(与吴景超教授的办公室为邻)交给我使用。这样,我也得以较为具体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些实际情况。根据这些思想小结的材料,我曾列举了一系列清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不满情绪和牢骚讲给费听。例如:"大课是思想统治";

“我们的思想很正确，用不着改造”；“中国既然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为什么只有我们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不好”？“还有思想自由吗？”“功课那么重，学大课花那么多时间值得吗”？……后来，费在一次报告中，曾一一触及这些问题。他指出：“大课决不能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必须是群众的自觉运动。改造思想和镇压反动派是完全不同的。改造是为了团结；镇压反动派，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为了保护人民，给大家创造一个能在民主方式下改造自己的条件。因之，这和思想统治本质上刚刚相反。”但是，费没有料到，很快就展开的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自己也成为改造对象。我曾亲耳听到他这样检讨：

在批判会上，同学们的排炮打中了我。我魂灵在震动，我初次切实的感觉到：我过去实在危害了纯洁的青年。他们控诉我是完全应该的。……只有严厉地指责我，控诉我的罪过，才能更清楚看清我们共同的敌人。……从出国起到解放前夕，我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俘虏。我从丧失民族立场一直发展到危害民族。……我认敌为友，在行动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鲜血。（我的理论）本质上是反对革命，反对斗争，反对土地改革，维持封建势力，反对工业化，给帝国主义造殖民地。

50年后，当我重读他的这些言辞时，真的从心头感到无限悲伤。一个一心一意想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年教授，在尽心尽力做了那样多对人民、对革命十分有益的教学工作之后，却要骂自己“反对革命”，并列举那样多罪状，他的心情该是何等沉重啊。我想今日青年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却很能理解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费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当年清华

大学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教授虽然在三次检讨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也依然没有过关。这时还“挂”在那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试想，费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怎敢不百般辱骂自己呢？从潘光旦、费孝通的身上，我感受到作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危险性”。我当时已经毕业，分在了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曾私下偷偷问费孝通：“现在作研究是不是太危险？搞不好真要会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我记得费孝通当时很生气地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问题很多，我们不去研究它让谁去呢？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且责无旁贷！”他的话使我内心有愧，因而决定继续搞研究，而且一直坚持至今。

四、我们都反对取消社会系

清华大学社会系在建国前是一个“名系”，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教授有潘光旦、吴景超、陈达、吴泽霖、费孝通等人。1948年的《清华年刊》的“院系漫谈”中，称社会系是“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个系”。这也是当时我所以转入此系的缘由之一。但是，在迎接解放、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热潮日子中，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已成立了系务委员会，而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就经常可以在系务委员会上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例如，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专门反对马列主义而出现的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这引起了清华社会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也是激烈反对者之一。大约在半年多之后，1950年3月7日，费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学系怎样改造》。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写作前曾在清华社会学系系务委员会上讨论过。该文明确提出：当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尚分别存在时，社会学系亦无先予取消的必要，

而且正可以社会学系为基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到了8月份，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学系，并定位为“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我作为坚持主张办社会系的学生代表自然也感到欢欣鼓舞，对费的敬意也就进了一层。

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开始分专业组。当时共分三组：民政组、劳动组、民族组。学生毕业后分配方向是：内务部门、劳动部门、民族事务部门。这时，我已听说：费将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并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去贵州。在一次讲课中，费曾要我参加他率领的访问团，一块去贵州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我这时已在听陈达教授开的“劳动问题”课程，并迷上了中国劳动问题的调查研究，因此我没有报名参加民族访问团，而是报名参加了中南工矿考察团，跟随吴景超教授去湖北大冶钢厂进行了实地社会调查，回来后申请分配到劳动专业，并于1952年在社会学系劳动专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分配到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费进入到民族学领域，我则进入了劳动科学领域，在学术上属于不同领域。但是，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费对此甚为不满，而我则成为社会学最后一班毕业生，也对此十分不理解。因此，从1952年之后，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到费家去问候费和费师母。那时候，他已搬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南排1号，与我的另一位老师潘光旦比邻而居，而潘则是我们社会系学生最尊重的教授。他的学术造诣和道德文章都可以说是属于“大师”级人物，在我一生中是十分少见的。当时，我们都希望恢复社会系，在这一点上倒是十分一致的。

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1956年举行国际社会学会，苏联派了代表团参加，中国则没有派代表团。美国《新时代》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当时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的陈达主持其事，并在6月9日在南太常寺甲12号召开了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袁方等人。我曾看到劳动干校党委整风办公室报送的“会议纪要”，上面明确写明：“科学院准备了一些经费（约5万元）及编制名额（5人左右）。”显然，这是在党领导下，有组织的一项活动，是得到组织同意的。于是，吴景超写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费孝通写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开始了后来被称之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高潮”。但是，我想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提倡、主导这次社会学活动的部门，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参加此事的唯一中年教师袁方是中共党员，是“奉党委之命”去参与此事，并非个人私自行动。当反右运动开展后，参加开会的教授除雷洁琼外，都被打成右派，而袁方则被画为“极右”，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我与袁方谈及此事时，他真是哭笑不得。而反右派斗争，又与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有关。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深感其中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五、“早春天气”与费氏的悲哀

我一向认为，在《费孝通文集》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一篇最能反映费氏文风特色的文章。这是费氏作为社会学者与政治家两重身份最佳结合的体现，也是费氏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文风的最好表露。当时，费是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长、著名社会学者，而且正在调查知识分子问题。后来他在《早春前

后》一文中回忆说：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广，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这一年，我与费见面次数增多。缘由是和我同在劳动部工作的老师陈达教授受命要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世界人口会议，为了准备论文，抽调了几个人协助他，我也偶尔参加讨论。由于人口问题是社会学重要领域，故费有时也参加讨论。我记得费曾给人说，他写此论文时，起初用的是"春寒"二字，但后来考虑，认为当前"春意"是主要的，若再加上"寒"字，在表达上未免走了拍，也就不能把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后来思索很久，想出了"早春"两个字，才感到合意，因为这个字眼和近些年知识分子在改造运动中产生的晚秋感觉正好对上，错得开，刚好表达出他们心理上的转机。我对费的此文态度和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是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而且认为这篇文章前半篇主要写的是"春"，后半篇主要写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已感觉到了光明和温暖，给人以许多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问题。特别是结尾处一连串10个问号，确是足以让人警醒和深思。总之，我对此文是十分肯定的，十分拥护的。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在此后出现的曲折，这篇文章却为费氏埋下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祸根，几个月后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罪证。我至今还保留《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该文内容摘要如下：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接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

去英国，他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

在美国，他勾结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费孝通是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费孝通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他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

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稿略加改编而成。

他家根本没有二十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二十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来大吹大擂，炫耀自己。

我读到此文时，真的如读天书。我心中问道：这里写的是费孝通吗？后来，读到美国学者戴维·阿古什的《费孝通传》，其中讲到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费孝通："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各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士大鸣大方，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这时方对费氏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厄运有所了解。后来，费曾回忆说："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我觉得：这固然是费氏的悲哀，同样也

是中国的不幸。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的知心人，他了解知识分子，他熟悉知识分子，他的心与知识分子的心相通，作为共产党的朋友，他向党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又有何罪呢？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实在是和国家的富强相联系，一个打击、怀疑甚至歧视知识分子的中国又怎能富强呢？费孝通的命运有其广泛的代表性。只要看一看费孝通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国家民族做出何等巨大影响和贡献，就可以知道他当时的遭遇是多荒唐，而他竟然能挺过来，又工作了 50 年，真是十分不简单！称得上是一条硬汉子！

六、费氏的"右派"生涯及遭遇

1957 年反右之后，我好几年没有见到费孝通教授。一直到 1960 年以后，我才又偶尔在过年时到费家去给费拜年。但是，在一次会面中，我发觉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往日那个充满智慧、谈笑风生、生气勃勃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见了，与我谈话的已是年近老迈，语言迟缓、毫无生气的一位老学究。后来，费曾自己回忆道："我的右派帽子摘掉后，仍然是个摘帽右派。虽然不是严格地按敌人对待，我依然在正常社会之外。我们同一般社会隔绝，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当然，我们可以看书！但是，没有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我读历史书和翻译老书。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进步。相反，我内心十分混乱。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实状态。最后我只有放弃希望，没有奋斗目标。我不能忍受回顾，也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又不想回顾，而还活着，那是太坏了。"

1987 年 10 月，费孝通访问美国，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与巴博德教授有过一次长谈，少有的谈到他在反右和反右后情况：

巴：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什么？

费:有许多问题。举一个例子说,他们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不被信任,报酬太低,不受尊敬。……因此,我写了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周恩来在旅行中看过。他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这是唯一的一篇有说服力的表达知识分子内心思想的文章。

费:1957 年,气氛突然改变。……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然后,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说去掉我这个标签。

巴:那是在 1959 年。

费:1959 年。……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然是一个右派分子。那是阶级斗争。……那时候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便造成智力停滞。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错了,我是在保护资产阶级吗?我错在那里?我不很明白。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是错了。麻烦就在于此。他们不应该这样看待我。……我被孤立。没有人想要访问我,除了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在学校。

巴:你的妻子和女儿也为此受到影响吗?

费:是的。当然,由于我、我女儿进大学有困难。……整个家庭由于我的处境受到影响。我哥哥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同情我。这就像某种传染病。我们都成为不可接触的人。我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所以我独自留在家里。

但是,即使不读书,不写文章,不参加社会活动,同一般社会隔绝,心如死水,没有未来,也不想回顾,只是独自留在家里,费氏也难逃阶级斗争的厄运。因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爆发了,费陷入了更悲惨的境界。他曾在《经历、见解、反思》一文中回忆道:

那是在1966年9月1日，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突然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叫牛鬼蛇神。

……我们被带出去游斗和展览，头上戴一顶高帽子，身上挂块牌，写明我是牛鬼蛇神。小孩都嘲弄我们，我们被带到人群之前。他们呼口号，我自己也得跟着喊"打倒费孝通"。

……我们不得不站在那里背诵我们的罪行。就我来说：我不得不反复承认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后来整个学院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我是没有目的生活着。不展望、不回顾，可以随时强自取乐。……但是没有希望。

后来，费曾告诉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当时，他曾想到去死。可是，他又想到，如果自杀，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对不起她们，于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时，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听到此无不眼中泪花滚滚，心中悲伤万分。一个有才能、有贡献、有作为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在当时落到如此下场，这难道还不是人间一大悲哀吗？是不是也是中国的一大悲哀呢。多年以后，在一次闲谈中，费孝通曾对我说："为什么反右给国家造成这样大危害？"他说："反右让知识分子走投无路，到头来使得国家也走投无路。现代化是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而科学文化是要靠知识分子来发展的。焚书坑儒与秦灭亡的历史值得三思！"这真是至理名言！

七、为重建社会学而尽心尽力

1972年，费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世界史》的翻译工作，算是从体力劳动又变成了脑力劳动者。但是费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的，他曾用"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八个字描述当时心情。这样一直到1976年周、朱、毛逝世之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他的处境才有了好转。他写出了"文革"后第一篇文章《蓄意歪

曲、无耻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的谬论》。当时，我们这些他的学生曾欣喜万分，奔走相告，为费教授的“复活”而欢呼。实际上，这篇文章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高唱“阶级斗争”学说，充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条，是费氏所写文章中最蹩脚的一篇论文，实在难以恭维，但当时却是难得极了。

1977年底，费向当时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写了一封长信，呼吁重视民族问题研究。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

> 阔别多年，未免疏远。岗位工作又使我们联系了起来。归相识还应重新相认。……三四十年代之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巴，驰驱未息，诸可告慰。余不一一。

但是，时代在巨变，社会所要求于费氏的绝不是只作一个“背盐的驮马”。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件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头上。但是，当费要求原来搞社会学的人参加讨论时，反应很差，有人甚至说：“好容易从社会学中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1979年3月15日，社会学座谈会终于召开，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讨论筹建社会学系的问题。这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并担任研究会理事和以后成立的北京市社会学会副秘书长。费在以后一次讲演中曾说：

> 在十年浩劫里，我们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这样活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夙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裹，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

动力，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科的重建尽点力。

从此，费孝通迎来了学术上的又一次丰收和辉煌。他三下、四下江村，提倡乡镇企业，欢呼苏南模式，写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名文，走遍了全国各地，研究区域发展，提倡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理论；他访美、访苏、访日，走遍全世界，得了许多国际学术奖项，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社会学界，能有这么多成就的人，实在很少很少。在他从事科研活动60年时，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一生探索，志在富民——为费孝通教授从事科研60年而作》，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

费孝通教授作为一代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追求民富国强的幸福道路的探索之中。他的科学探索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景仰和学习。

八、在费的指引下耕耘社会学园地

在1978年之后，我在费孝通教授指引之下，又开始重新耕耘社会学这块科学园地。曾载有当时全国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教授和研究员小传，我也在其中。我的小传介绍我“主要从事人口劳动社区（城市与农村）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我当时主要是对安徽、山东的农村进行广泛、具体、系统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中国农村社会学》教科书，而这一学科任务正是为重建社会系的学科体系所迫切要求的。主持此事的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概论》的“前言”中曾这样写道：“解放前我虽在一些大学里教过社会学的课程，但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调查。……《编教科书》是用我之短。”因

此，当许多人要他主编"中国农村社会学"这门社会系学生必修课的教科书时，他就坚决地一口否决。经过一段酝酿，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向他提出：可否以他的著作如《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江村经济》等为蓝本，并参考杨开道几十年前编的那本教材，来编辑这本"中国农村社会学"教科书？他对我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建立起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而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许多变化。安徽农村改革已促成中国农村巨变，你到安徽农村去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之后，再开始组织人编写教科书吧！而且要和安徽农村工作者密切合作。就这样，我来到了安徽，进行了六年深入农村调查，并与安徽省委原秘书长省社科院长欧远方和安徽农村社会学会会长辛秋水研究员合作，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农村社会学》教科书，为重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尽了力。这时《小城镇，大问题》一文正风行全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引起邓小平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对乡镇经济和乡镇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探讨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费孝通教授为此作了许多演讲，也写了许多文章，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无人能代替的贡献。例如：在全国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费孝通教授应邀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城镇发展理论的报告。后来经我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在最后审定此文时，我提出："应当编写一本乡镇经济学和一本乡镇社会学。"他说：他已答应中共江苏省委，准备用两年时间，在江苏用典型的、深入的、直接观察的，并以定性在前、以定量为后的调查方法，把小城镇这只麻雀解剖出来。乡镇经济学和乡镇社会学的编写，你还是找安徽省委合作吧。于是，我找了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周曰礼主任等人合作，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中国乡镇经济学》和《中国乡镇社会学》，为中国乡镇经济、社会研究，贡献了一份

力量。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学》、《中国乡镇经济学》和《中国乡镇社会学》的作者都是安徽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于是就被戏称为“皖派社会学者”。例如：著名上海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伟志教授著文说：“这些作者是皖籍人，根在安徽，多年来一直在安徽农村调查，尝过安徽农村改革的甜果。实践出理论。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必然会升华出推动人们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学理论。农村改革的光辉实践，必然出产生出一批农村社会学的杰出人才。——我们祝愿安徽的社会学事业一步步走出江淮，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时间过得真快，上面这些事都已是20年前的事了。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慨系之。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的纯真、朴实和可敬又可爱哟！他们的人生路程同样是可歌可泣，可以赞叹！谁说知识分子只是舞文弄墨的文人，他们的一生同样可以十分伟大、十分夺目、十分光彩，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历史应该记得他们的劳苦和命运。

九、结束语

2005年4月25日，噩耗传来，费孝通教授离我们而去，享年95岁。近年来，我因从事两岸经贸活动工作，担任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又多年在美国、加拿大居住，与费孝通接触渐渐少了。当然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也是一个原因。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忽然发现到列席名单中有费，真是十分高兴。因为这预示他身体仍然健康，并仍然参加政治活动，真是一位永葆青春的年高德昭的学者。但是，2005年4月25日报纸，却载有费氏业已仙逝的消息，我真是从内心感到分外悲伤。抚今忆昔，万般悲痛涌上心头。记得中国国内有一本书这样评论费氏：

费孝通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

典型。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所有变迁，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地道的西式教育；既是才高学著、见闻博恰的学者，又满怀政治热情、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一代政治明星。费孝通也正是同时具备了这样特殊的学术、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国内国际社会影响，他便常被人视为中国社会与政治变化的晴雨表。

我记得1999年9月15日去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召开的纪念我的老师、也是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教授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费孝通在讲话中说："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那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说"一以贯之"，潘先生是说到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是的，我们今天同样应该这样评价费孝通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同样是"人格不是一般的高"，他"在这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我现在面对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只想讲一句话：

信哉，斯言矣！安息吧，我敬爱的老师。

费孝通小传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6年秋留学英国，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198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人类学教授。1978～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同年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82～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论著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英文版)、《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记小城镇及其他》、《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费孝通文集》等。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聘为荣誉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89年被香

港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授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被授予麦格赛赛奖,以表彰他在中国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

主要征引书目

1. 戴丝·阿克仕著，董天尼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2.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3.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5. 费孝通：《往事重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 费孝通主编：《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 姚尔彬：《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钟敬文 (1903～2002)

我曾经借用一位伟大诗人的思想说过这样的话：每当我们说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就会想到钟敬文，每当我们说起钟敬文，就会想到中国现代民俗学，钟敬文和中国现代民俗学是一对孪生兄弟。今天，我愈发感到这句话的真实。

——刘魁立 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

钟敬文先生将百年生命奉献给了我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他的名字永远和这两个学科联系在一起，他一百年的生命路程和这两个学科的发展相重叠。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对民俗学之父的思念与反思

——兼论“五四之子”和“农村民俗学”的概念对钟敬文的人生与学说的价值

董晓萍[①]

钟敬文教授，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已经离去四年了。对钟门弟子来说，他所留下的，除了思念，就是反思。从学术上说，反思，还是继承和发展他的一种形式，是对他所开创的中国民俗学研究资源和现代大学教育遗产的一个研究过程。坚持反思，才能把思念付诸长期的理性实践。

反思钟敬文与中国民俗学的关系，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他在生前所反复强调的两个概念：“五四之子”和“农村民俗学”，他的人格、他的特点和他的重要成就，都应该从这里开始讨论。

钟敬文，1903 年生，2002 年辞世，广东海丰县人。原名谭宗，笔名静闻、静君和金粟等。一生经历了几乎整个 20 世纪，在中国南北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如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都曾赴席执教，开辟民俗学讲堂，倡导民俗文化研究，培养民俗学高级专业人才，终以一人而贯穿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民俗学大学教育史和民俗学社会

---

① 董晓萍，民俗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钟敬文教授学术助手，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

公共活动史，是20世纪中国唯一全面引领民俗学事业发展的学者。

一、五四之子

发生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它酿造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型国家社会的模式，也创造了一批用现代区分传统、用平民区分贵族、用东方区分西方的大师级学者。这些大师不仅拥有崭新的学者形象，而且提出了崭新的学科理念，走出了崭新的人生之途。钟敬文教授到晚年还说，自己是“五四之子”，可见这是空间不是随便出现的，它能被长期共享的。

在众多的大师学者中，钟老拥有他们的共性。这批人都是国宝，热爱民族国家，也有顶级的学问。钟敬文有三个口袋：诗词、散文和民俗学，哪个口袋都能藏宝出绝，这是后人学也学不来的。他曾以诗歌的成就，少年成名，而至老不衰，在诗词学界负有盛名，长期担任中国诗词学会副主席；他曾以散文的成就，五四成名，当时被郁达夫、阿英等誉为“步冰心之后武”，在现代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晚年还获中国文联颁发的终身荣誉奖；他在民俗学上，以一人而开辟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门现代学科而得到国内国际学界的公认，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钟敬文教授自己的人生特点是平均每十年干一件大事，这也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1920年，他刚从师范毕业，便投身五四的学术阵营，成为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中的南国先锋。30年代，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到海外学习民俗学的人，此行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民俗学家的地位。1949年，他从香港回到祖国，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受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接见，这决定了他必将走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的民俗学高等教育建设的道路。50年代，

他参与筹备建立新中国第一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校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在全国第一个招收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奠定了民俗学在新中国的地位，使五四以来的这门学问有了根本性转变，在政府管理、大学体制和学科建设上，确立了位置。60年代，他被错划为右派，但仍在逆境中撰写了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系列著述，把一时荒谬绝伦的“洗心改造”，变为了化境养气的非功利性治学，终于开创了中国民俗学史的新研究领域。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他以70多岁的高龄焕发学术青春，参与了文化部发动领导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部集成的建设工程，主持了其中的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的搜集编纂工作，在中国全面现代化开始之前，抢救和保存了这笔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现代高校的学科改革和民俗学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80年代，他被国务院授予首批博士生导师，此后转向博士生高层教育，并创立了民俗学的学说体系。90年代，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在反思一生治学经历的基础上，集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之大成，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成为民族主体化民俗学的最后守望者。不久，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著成为先声。

很多中青年学者说，钟敬文等不可企及。他们赶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饱读四书五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精华；然后又赶上了五四时代，吸收了当时先进活跃的西方和日本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文化，因而造就了特殊深长的开放经验、中西兼通的学术能力和原始创新的巨大成就。他们在当时世界性的文化碰撞中成名，后来又在中国曲折严峻的历史坚持下来，还有理性的气质和情感的涵养，能在各种顺、逆境中平顺

通达、不改其志，这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人生目标，创造社会价值。他们的人生轮廓清晰明确，不为外惑所动；他们的成功之道仰之弥高，在后人眼中魅力四射。当然，对广大后学来说，不可企及，不等于不能勉力学习，钟敬文自称“五四之子”的例子就告诉我们，把深刻的历史感与现实创新性结合起来，对任何学问的传承来说都是重要的。

我们看钟老和他那批大师的著述，就能发现，五四空间所给予他们的一个天地，就是促使他们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变革的现实加以对照，做创新学问，终成气候，具体有五个特点。

一是利用中外大环境，寻找中外资料，对照启发，发现学术新问题。钟先生在五四时借鉴了当时先进的欧洲故事类型学说，开始与北大教授顾颉刚讨论中国的代表作《孟姜女》传说。以后，又借鉴历史学的方法，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中国代表作《牛郎织女》传说。他从1932年起，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鸣惊人，并以此赢得了国际学者的关注。他到1999年还没放弃这项研究，前后坚持了67年，这种坚持性就是创新学者的一个特点了，就他从五四走到20世纪末而言，他还要把历史感转化为责任感。

二是利用史学大环境，扩大史源，编纂书志，使新学问论有所本。钟老倾力从传统国学和相关典籍中挖掘民俗史料，建成民俗史。他在研究《牛郎织女》时，发掘了一批珍稀的历史祖本，便进行整理、研究和发展理论问题，至今民俗学界的研究还大体不出这个范围，而有了民俗史，外来的民俗学才能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大国里扎根，获得自己的根基和学术地位。

三是利用哲学大环境，建立框架逻辑和工具概念，创建新学科。钟敬文的学术创新，得益于哲学，他比传统学者更宏观、更逻辑，更注重文化分析和分类。他把《牛郎织女》传说分成了

女性传说、男性传说和社会组织传说，这就是从上述哲学思考中来的，这个个案也成为他一生学问的点睛之笔。

第四，利用社会调查大环境，创造个案，让研究局部动人。他是书斋学者，但从不忽视社会调查，他还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创造了老獭子、刘三姐、灰姑娘、云中落绣鞋、徐文长、呆女婿、老鼠嫁女等著名个案，奠定了一批民俗学理论框架中的富有说服力的研究模型。

五是利用文学大环境，通过训练有素的文笔，著书立说，获得广大的社会认同。钟敬文教授生前多次对我说，要学习胡适、周作人和顾颉刚的文笔，没有好的文笔，就会对人文成果的社会影响造成障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表扬过青年钟敬文。此事对他的人生是有作用的，但他跟我说的是，胡适的英文好而不忘中国国学，文笔也非常好，所以名气大，胡适"差不多每月发表一篇文章，都是考据的，有分量的，也好读，这是要怎样的勤奋才能做到的啊"！此话我至今不敢忘怀。他本人也以擅长美文著称，能把不少难缠的理论写得摇曳多姿。面对他和他那一代五四学者的著作，我懂得，人文学者要继承历史和面对现实，深入浅出的表达是十分必要的。

钟老治史的结果是创立了历史民俗学。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说到：

> 一般民俗学只讲以上两种（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不过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一文中，他再提到：我们的民俗学、民俗理论史是源远流长的。欧洲人讲民俗学史是从希腊的历史书讲起的，那么中国呢？从有民俗的记载、论述以来，也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民俗学，从“五四”时期讲起，是由于这时它开始同世界民俗学接轨了，这个学科更科学、更完备了。

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他选择了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结合点，然后做民俗学的研究，主要观点有：

①五四学者发现了历史民俗学的文体载体——歌谣、戏曲和小说，解决了创建资料系统的难题，这是五四传统学术改革的一部分，也成为历史民俗学的起点。

②中国富有历史文献，但历史民俗学者不能直接使用这种资料，还要实际接触它所描述的社会和人民，听和看人民的叙述与行为，才能取得对文字史料的第一性认识，然后建立使用史料的原则与方法。

③民俗学善于使用无史料的民俗资料，但要从事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还要结合史料，以避免将口述资料扁平化，避免学者研究主观化，也避免将民俗学研究当作一种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浪漫的躲避(a romantic escape)”。

④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要以正确理解本地文化要素为基础，这一条对学者可确定研究方向，以及正确对待外来理论与本国实际的关系，都是有益处的。

我们能看到，五四的一个作用，是帮助这些大师学者在中外学术的比较中，重新发现了民族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比在民族内部认识更深刻，能促进他们自觉创新。他们的大师之根在五四，他们的大名起点在五四，他们的大家风范特征也在五四。

一般认为，五四大家的产生，得益于天才、机会和勤奋，其实还有第四条，就是人生境界。这使他们成就了事业，也拥有长期的追随者和影响力。在这方面，他们以下特点。

一是巅峰阵容、精彩共享。钟敬文在岭南大学时，与音乐家冼星海为友，冼星海要教他拉提琴，他教冼星海做诗，两人进行“学问上的交换”。今人知道，这种共享是人生的绝笔。虽然两人最后各奔前程，但这种智者互学和心灵相照的纯净心态，却给人际空间增添光辉。在这种学术圈中，人以高铸高，彼此砥砺，如《论语》所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最后自然积健为雄。

二是理性人格。反思钟敬文先生对我的教育，我体会到人有三种人生。一种是自然人生，按生理年龄计算，发展得好，返璞归真；发展得不好，随世沉浮。一种是就业人生，即为生存做事，一般地发展，所谓“捧牢饭碗”；发展得好，能成为敬业人生和事业人生。一种是境界人生，它能让人超越自我，为人类社会创造价值，用他的话说，这种人便是能起风云的人。先生从青年时代起走上为民族国家的治学道路，到晚年集大成期，又把时间留给了学生，这正是他的理性人格和境界人生所在。他的选择有三种成分，即儒家的进取与规则、佛家的寂寞和绝悟和道家的放弃与善为。他将三者融为一炉，便历尽磨难而不弃，无私奉献而无悔，最后终成正果。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套小事哲学，能让他把深邃的历史感化为凡人现实，让人感到他诚朴可爱、蔼然可亲。首先是早起的哲学。他从不贪晚，总是早起，每每通过走路散步与人聊，平凡自己。其次是开会的哲学。他名气大，会议多，占去了自己的不少宝贵时间，但他从不迟到早退，还对我说，人是要有“钝根”的，既来之则安之，尊重别人。他还经常通过会议发言，赞美他人，在谦和之中，做到人敬人高。再次是勤奋的哲学。他无论与中外学者交谈，还是跟膝下弟子谈话，只要别人有新资料，或者有新观点，他都大为兴奋，追问讨论，人称他的长寿

奥秘在此。

二、农村民俗学

钟敬文教授的另一贡献是提出了“农村民俗”的概念，在他身后，用反思的眼光看，他一生治学的范围和理论奠基，也可用“农村民俗学”来概括。就他而言，对农村民俗的研究，是与历史民俗学紧密相关的，但同时也是面向未来的民俗学构建的一部分。

对农村民俗学的研究，是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现代社会对自然景观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对文化生态的残毁和对人际关系的忽视，正在形成灾难；城乡二元社会的长期稳定的格局，正在失去平衡。现代人所追求的高密集、统一化的生活方式，正在面临丧失独立性和长久感的危机。在这个情况下，农村民俗学便成为一种认识和重新利用传统民俗的学问。

钟敬文教授在晚年的治学中，提出了建立农村民俗学的依据。他从对民俗学的学科性质的分析开始，将中国民俗学的性质界定为农村民俗研究。他说：

> 从我国传统民俗的文化价值及当前所遇到的生存危机看，农村和小城镇的民俗亦应摆在第一位。有些传统民俗的历史达数千年，从周代至近代，其间中华民族同化了难以胜数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仅以南北朝为例，当时华北地区几乎为少数民族占据，长江以南为汉族统治。即便是汉族的民俗文化，也是众多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不断同化、消融、整合的结果，而绝非单一的炎黄集团的产物。因此，中国民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有的文化价值极高。
>
> 从我国当前两方面民俗量的比重看。中国新兴的都

> 市是这样年轻，且地盘狭小，周围的汪洋大海是农村。两种民俗的比重表明，传统的民俗在这个茫茫大海中占据显要的位置。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风俗志之类的著作，其绝大部分篇幅载录的是传统民俗。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大量的民俗是传统的，而非新起的。

他提出这种看法，是有五四运动的影响的，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宗旨，其中，把“民主”的主体理解为民众，又把民众理解为农民。当时提出的革命口号“到民间去”就是到农村中去，到农民中去。延安讲话也是要求知识分子下农村，在服装上、腔调上和思想上，都要变成农民，这使农村民俗的研究被赋予战争、革命时期的新文化建设的价值。钟敬文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使用农村民俗的概念，还基于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的现实。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看，直到50年代，我国农业的产业结构还同1949年前一样，以农耕生产的产值为绝对优势，占80%以上。其他牧业只占12%，林、副、渔共占8%。到1980年以后，农村经济进行改革，才发生了变化，到1984年，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到68.3%，到1986年，下落到57.8%。但不管怎样，农耕生产还是主打项目，这种与中国农业人口的比例状况是一致的。由此，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农业经济基础和农业人口的结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民俗学的农村研究取向也不应该有变化。在中国现代化大潮到来后，他提出了对农村民俗的抓紧抢救和抓紧描述的看法，还体现当时民俗学界对现代化的总体反映。他生前几次对此做过概括，颇有代表性：

> 从国际上民俗学界的情况看。我国民俗学的起始，若从北大征集歌谣活动算起，至今已78年。日本则比我国早数年。日本国小，财力雄厚，学者较多，又得益于柳田先生的大力倡导，绝大多数的地方民俗被发掘，搜集起来了，

资料的整理比较完备。虽然有少数学者，如福田、宫田等先生，在研究都市民俗学，但势力较弱。韩国的情况据说亦大约如是。而我国民俗学研究的现状与之相比差距甚远，传统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许多领域仍是一片荒地。因此，就更有必要以传统民俗的搜集研究为主要对象。美国等国家某些学者热衷于城市民俗，如校园民俗、企业民俗、军队民俗，等等，但从其民俗学的教科书看，也是以传统民俗为主要内容。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大多数民俗学家侧重于研究印第安人的民俗，其传统的土著民俗较之现代都市民俗更为丰富，更为深厚。

钟敬文教授早年受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很深，日本民俗学的早期理论就是农村民俗学，钟敬文对此是接受的。但日本民俗学还有对现代化造成的城市化的抵制倾向，这在钟敬文是没有的。他是个尽量协调冲突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柳田国男。

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面向农村的性质界定，还提出了其他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民俗学者注重研究农村民俗，有中国现代民俗学积累不足的背景；二是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发展不平衡，总体经济水平也不高，因而适合用农村民俗加以界定；三是中国民俗学者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他们担心现代化和全球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因而产生了警惕，认为肯定民俗，就是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四是在中国城市化大潮到来之前，民俗学者对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研究表现了敏感的分界意识，也表现了学术上的紧张感和策略上的抢救习惯。

在国际上，美国学者最早提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该把

农村和农民部分拿出来，变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行新的学科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工业和城市的急剧发展中，发生了“农村生活运动(country life movement)”，美国学者开始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农村做调查研究。1894年至1895年，芝加哥大学教授亨德森(Charls R. Henderson)开始教授农村社会学的课程，在1908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颁令，成立了以贝利(L. H. Bailey)为首的“美国农村生活委员会(American Country Life Commission)”，由七位对农村生活有研究的学者组成。1916年，美国社会学者举行年会，主席文森特(C. Vincent)发表了《美国的农村生活》论文，标志了20世纪初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开端。1957年，西欧国家的社会学者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支持，成立了“欧洲农村社会学工作者协会”，不久又成立了“欧洲农村社会学会”，扩大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俄国，对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也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并出现了《俄国的农村》等著作。这些学术探索，都涉及农村民俗。

在我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也有对农村民俗的关注。最有名的是两大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两者还都搜集、编纂和出版了民间口头文学资料集，其理论和做法都对后来的民俗学产生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社会学者提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思想和行为观念问题，其中有不少是民俗学范畴的问题。如尹志刚等在《下岗再就业的社会学分析》著作中就提到：

> 在职业流动阻滞中表现出来的传统性所反映出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念，体现着对社会现代化发展趋势的价值背离。这种背离主要是感情对理性的背离，特殊主义价值对普遍主义价值的背离。

所谓对感情价值的追求，是指社会、组织和个体所着力追求的，是增加依恋、凝聚、心理上的美好体验等；而对理性价值的追求，是指对分工与协作、投入与产出、工具与目的的效率追求。所谓对特殊主义价值的追求，是指自身或所属小群体独有的、排他的品质的珍视，它所体现的是特殊信任结构；而对普遍主义价值的追求，是指人们对社会共有的、非自身的或所属小群体独有的品质的珍视，它所体现的是普遍的信任结构。……从家庭到邻里、社区、组织、市场、国家，随着社会交换范围的扩大，结构分化和功能整合的提高，交换中的理性因素的增加，要求对感情和理性、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价值追求有不同的导向。

钟敬文生前已指出，社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大多是在中国长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深层民俗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农村民俗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补充社会学的研究，也将成为城市民俗学研究的参照内容。

钟敬文在对研究"农村民俗"价值的看法，还得益与人类学对学科方法的分析。在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对农村社会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重点。人类学者通过农村研究，恢复构建前工业文明，并获得对工业文明的独立诠释。人类学与历史学、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还产生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把农村和农民当作下层历史资料的新来源，加以搜集和研究。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R. David Aukush)便使用这种方法，搜集了大量中国农村民俗文艺资料，包括农谚、小戏和故事等，并行了长期的研究。欧达伟说：

我在60年代是美国的一个研究生，当时我和我的同学通过费孝通的三本书，对他有所了解。他是一位很感人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善他所同情的中国农民的贫穷和苦难

> 生活，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改革农村经济的建议。我感到，当我们通过费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及我们的老师费正清（他因为批评国民党而受到美国右派的指责）的介绍，了解到中国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会状况时，真是大吃一惊。尽管1949年后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所谓的“红色中国”抱有敌意，但我们越是了解中国，越是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欧达伟原来研究中国上层精英的思想史，后接受费正清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观点影响，转向对中国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当然，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使用农村民俗文艺资料，是一种间接的准备，他还要进行相应的考索、比较、其他取证和综合分析工作，甚至还要参加农村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对农村民俗资料的文献历史感，然后进入理论史研究。他近年撰写的著作都运用了这种理论和方法。钟敬文教授的做法是，通过与欧达伟的对话，进一步发表了他对这种研究的看法。

> 我近来反复读欧达伟教授这本论文集所得到的感受，加上两年前听他讲演所留下的印象，我实在禁不住有些话要说。他在论述华北农民某种文化、思想时，很少是孤立地进行的，虽然在主、次的地位上是那么分明。……他对于中国华北广大农民妇女的观念、情绪，既科学地给予解剖，同时又对她们的命运隐含着同情和希望。

钟敬文所强调的是，对农村民俗的研究，应该富于农村民俗资料的系统性。农村民俗研究的本质，正是对中国传统民俗的研究。他还提到了这种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农民社会”、“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方式”而这些概念的界定，是从它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对于农村民俗，除了民俗学，还应该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他的这些看法，对农村民俗学的建设都是有

启发意义的。当然,农村民俗学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中国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历史民俗学和农村民俗学都已被重新价值化,钟敬文教授因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而使自己的学问也被人格化。他的精神春常在。

钟敬文小传:

钟敬文,生于1903年3月20日,广东海丰人。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与顾颉刚等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编辑《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1936年回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救亡工作。1949年5月开始,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钟敬文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80年。早在20世纪4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在1950年参与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民俗学结构体系的学说,并于90年代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新学说,其代表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新的驿程》、《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等。钟敬文从1953年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他领导的学科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点,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50年来,先后为我国培养了近百名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专门人才。他由此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

主要征引书目

1.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2.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03 年第 1 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3.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4.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5. (美)欧达伟(R. David Arkush)著,董晓萍译《中国民众思想史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四辑
引领未来的科学大师









陈省身 （1911～2004）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数学代表人物，并在他所从事的几何学科和更广的数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贡献已被沃尔夫奖和近来颁发的邵氏奖所公认。他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生并且永远鼓励年轻的数学家。

——迈克尔·阿蒂雅　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先生的成就是世界级的。他对整个几何的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他是一个创造者，整体地、大范围地影响了微分几何这个数学根本性领域的发展。数学的发展，微积分是一个飞跃，堪称学术的中心。陈先生在这个全新的领域，提出了一整套看法，划时代的贡献。

——吴文俊　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陈省身：国际数学大师的强国梦

王　昊

一、一道亮丽的强国梦

20世纪以来，“醒狮”、“巨人”、“雄鸡”似乎一直是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的想像，而且这种极具隐喻色彩的想像已经渗入到民族的血脉之中，无论长幼，不分贵贱，人们对于中国一定要强大，一定能强大始终坚信不移。

2004年12月3日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天津逝世，这位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老人至死仍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没能看到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的“21世纪的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大国”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当年陈氏的这一预言，曾被誉为“陈省身猜想”，一经传出便不断引来世人关注的目光。直至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行，人们终于看到了“陈氏猜想”的完美证明。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陈省身再次出语直言，“我想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数学大国之外大家都喜欢用数学强国，但中国还不是数学强国，还要些时间。”中国能不能成为“数学强国”，似乎成为老人的又一个“猜想”。陈先生殁后，关于“中国何时能成为数学强国？中国距离数学强国还有多远？”之类的追问，已然再度成为各方追踪讨论的焦点了。

在时下中国的各类媒体上，有两个词十分抢眼，那就是“强国”和“大国”。无论是被单独使用，还是二者相并出现，它们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 Google 搜索引擎上轻轻键入“强国”这个词，便会得到大约近 10 万项与“强国”相关的查询结果，“大国”一词则更不必提，搜索结果早已远远超出 10 万项。不过，对于“强国”与“大国”的区别，国人看得还是比较清楚。诸如，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是个电信大国，但还不是电信强国”；“是个数学大国，但还不是数学强国”之类的言说比比皆是。可见，在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今天，国人心中对大国和强国的区别依旧有着明确的心理尺度。其实，具有近代意义的“强国”观念大体是伴随着近代中国诸多危机出现而出现的。近代以降，中国日渐沦为西方列强案板上任受宰割的“鱼肉”，社会面临政治、经济、思想等多重危机。在这多重危机的交迫之下，身处庙堂和江湖上的各方人士不甘于民族之沦落，纷纷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方以求自强。努力结果的成功与否姑且不论，毕竟这些努力是国人在危机来临时的积极回应。近代仁人志士抱定神农尝“百草”的精神，来寻求解救中国于危难的良药，其行为本身很值得称颂，而他们种种自强努力的背后，显然又有一种坚定的“强国”信念在支撑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次直面几乎使人心理崩溃的家国危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种种屈辱姑且不说，就是在所谓的洋务自强运动之后，中国还不断遭到强国侵凌，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威海易帜，瓜分狂潮，军阀混战，强敌入侵，连连厄运不给中国人一丝喘息的机会。海外华族，尤其是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更是饱受异族歧视。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每临变局，海外华人尤感孤立无援，缺少精神寄托

之所的心理恐惧和无安全感的无助感受不断袭来，其身心痛楚可想而知。强国信念所以能深深根植于几代中国人的脑际和心底，这源于人们对百数十年来处在亡国灭种等多重危机下的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清醒认识。

多少年来，几代中国人在不停地追问，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陈省身先生生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组专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主持人问：那您能回答我，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觉得是教育体制啊，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缺人才，像您、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世界级的大数学家都是中国人，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整体数学水平会比较落后呢？陈先生大致讲了下面一段话：

> 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比方说有些外国人如果到了天津，他可以说研究天津有什么小虫子。中国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中国人很实际，如果你要跟他讲，说我这个深圳、纽约的股票怎么样？大家有兴趣。因为你投资了之后，立刻就会变成钱，当然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天津有什么小虫，可以很值得研究，把它完全研究一下，或者小的植物，比方像我们南开大学，也有相当大的校园。校园里头有什么样的花是好看的？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中国人都没有兴趣，所以引起孩子、引起学生对数学或者科学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有人针对陈先生所论，阐述个人看法，认为“对昆虫感兴趣的，在中国也不乏其人，但多把昆虫当成圈养的玩物。真正对昆虫的习性做研究，而没有功利目的的，从古至今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当前，从一些部门领导到一些媒体，也是捧大官、大腕、大款者居多”。追捧流俗，崇尚奢

侈,鄙视清贫和俭朴,正是导致教育中诸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虽然,关注和倡义振兴教育和学术者甚多,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强种"、"智民"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所极力倡导的两大"强国"手段,而此二者必须依托教育。因此,百数十年来,教育不仅关乎国运,更寄托了无数中国人的强国梦想。"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觉醒的先行者们大都走上的是教育救国之路,这条路是强国的通衢,但这条路也是一条撒满血泪的路。1934年1月15日,罗家伦在国民政府中央纪念周上讲述了他在主持当时国民政府留学考试时的一段经历。这段话大致如下:

> "张居正是什么人?"有人答,"司法院长。"又问"于谦是什么人?"有人答道,"监察院长。"另问一人"井田是一种什么制度?"他说"是日本人。"更问道"赤峰在何处?"他说"赤峰是日本的一个海岛",我们不禁喟然长叹,知道热河之亡,不只是亡于汤玉麟,大学毕业生,不知道赤峰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还不该亡吗?

可以想象,罗家伦在说下这番话时,其内心是何等的沉痛。古人讲,灭人之国,先去其史。而未等到敌人的毁史,国人自先数典忘祖,这种现象特别让人痛彻心肺。罗氏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现状,往往就是过去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中国的情形,正可以是十年以前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映",此言不虚。罗家伦这一声悠悠的叹息,蕴涵了深深的悲楚,这一声长叹也穿过历史时空,直逼来者,震颤来者之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我们还不时地要面对一些尴尬的事件和沉痛的事实。某体育明星不知何为"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某影视明星身着日军军旗装束现世,歌手大奖赛上不少选手对中国

历史常识表现出的无知，等等，而这些人大都是正在受着，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抗日战争胜利了，可留给中国的究竟是什么？不是胜利的喜悦，仍旧是六十年的沉痛和教训。

陈省身生前极为关注中国学术和教育，他多次呼吁学者要淡泊名利，勤奋工作，还曾以他的导师、法国大数学家嘉当为例，"嘉当是个很正统、很守规矩的人，我跟他去做工作那年是1936年，那年他69岁，除了在巴黎大学做教授，还在很小的学校教书。他这个人对于名利一点都不关心。普通人对他的工作对他不是很了解，只有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欣赏他。所以，他的名望是在去世之后才得到的，人们因为他的工作才记得他的名字。在20世纪的数学家里，嘉当是对21世纪的数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位。"他还指出，数学中没有诺贝尔奖是件好事，"诺贝尔奖太引人注目，会使数学家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陈先生亦曾语重心长地对天津从事数学研究的学者们讲："我们国内现在对当院士、得奖很注重，这种现象都是媒体炒起来的。而一个数学家真正有建树的工作，媒体是没法讲出来的。嘉当62岁才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黎曼，他的一生就没有得过任何奖。数学家主要看重的应该是数学上的工作，对社会上的评价不要太关心。"这些话出自肺腑，言语间隐隐流露出一个老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界内诸多问题的忧虑。还是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陈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更该想的，是数学家大会后怎样使中国的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这比在大会上作几十个报告来得要紧"，这话说得言短而意深。"陈省身当然很明白中国数学的现实状况。他觉得，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过高估计自己"。

就在陈先生刚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人说，2004年，陈先生太累了。更有人指责学校，让一个90多岁的老人不断应付

各色庆典，出席各类会议，还要不时地为青年学子和教师做报告和演讲，就是个中年人也吃不消呀。其实，南开大学当局也自有苦衷，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学校考虑到先生的安全，暂时中断了他的部分外事活动，特别限制学生访问先生。那一段时间，陈先生感到格外的寂寞，据说老人家曾向学校当局发了“脾气”。陈省身喜欢年轻人，尤其爱护和关心学子的身心成长，对“身负强国希望”的学子寄予了殷殷厚望，所以凡是学生之请，他从不回绝。年轻的学子更敬重陈先生，也爱和先生聊天，探讨数学和人生。

1927 年，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留给游美预备部毕业班学生的赠言中讲，“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不忘记祖国，不忘掉自己，追求真理”，也正是陈省身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

二、微分几何之父的数学之旅

1926 年，陈省身考入南开大学，从师姜立夫教授，接受了四年的严格学术训练。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大学生活过得非常愉快”，“我从事于几何大都亏了我的大学老师姜立夫博士。”1930 年 6 月 28 日，陈省身获得南开大学理学士学位，并于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读研究生。陈省身三年的学习成绩除第二外国语考试“及格”外，其余各科成绩均为“超等”。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陈省身尽力扩大知识视野，聆听外国数学名家的讲学，特别是德国汉堡大学 W. 布拉施克教授的系列演讲，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数学的信心。他曾说过：“布拉施克教授对我影响之大，怎么说也不过分。”

1934 年 10 月 19 日，陈省身受清华大学资助入德国汉堡大学，随布拉施克教授研究几何。在布拉施克教授的指导下，写

成《关于网的计算》论文，并于1935秋完成《2r维空间中r维流形的三重网的不变理论》的论文。陈省身的学习成绩和杰出工作使布拉施克非常满意，主动要求校方破格给予博士资格考试，《2r维空间中r维流形的三重网的不变理论》即被用作博士论文。1936年2月，陈省身以“优秀”的总评成绩被授予博士学位。1936年9月，陈省身以“法国巴黎索邦中国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到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师从国际几何大师E.嘉当。在此期间，他一共完成三篇论文，学到了嘉当微分几何的精髓，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

1937年，陈省身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国担任数学系教授。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10日，陈省身从巴黎动身前往美国纽约，顺访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然后借道加拿大乘船回国。这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已奉命在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陈省身即刻前往，在长沙临时大学数学系讲授“微积分”和“高等几何”两门课程。12月，经吴有训、杨武之介绍，陈省身与清华大学数学教授郑桐荪的女儿郑士宁举行订婚仪式。陈省身后来说：“武之先生促成我的婚姻，使我有一幸福的家庭。”

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省身与杨武之、江泽涵、饶毓泰等一同前往。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他满怀爱国热情，克服生活困难，努力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了“高等几何”、“微分几何”、“微分方程”、“黎曼几何”、“网几何”、“拓扑学”等课程，并为硕士生开设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方程等，还与华罗庚、王竹溪联合举办李群讨论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包括严志达、王宪钟、吴光磊、王浩、钟开莱等后来成名的数学家。陈省身的课程还吸引了理学院其他系的学生，当时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书的杨振

宁就正式选修过他的微分几何学。陈省身后来说:"'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一生的幸运。尤其幸运的是这些好学生对我的要求和督促,使我对课程有更深的了解。"

1943 年,他在西南联大得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辗转来到这里,此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批欧洲数学家纷纷涌入美国避难,使普林斯顿一时成了新的数学研究中心。大名鼎鼎的冯诺依曼、外尔以及爱因斯坦都聚集在这里。他曾回忆说:爱因斯坦是历史伟人。我多次到他家里。他建立的相对论,用到四维的黎曼几何,与数学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们也常常谈到当时的物理学和数学。

1943 年 10 月,陈省身完成《关于闭黎曼流形高斯—博内公式的一个简单证明》的论文,发表于次年的《数学纪事》第 45 卷第 4 期。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工作。陈省身对"高斯——博内公式"的证明为他赢得了盛誉,他复兴了微分几何,成为微分几何研究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人物,干脆有人称他为"微分几何之父"。这个只有短短六页的证明至少使他得以融入到普林斯顿的圈子里。他回忆说,"那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有人请你参加活动,喝酒,谈话。认识的半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大家在一起。"他首创通过在切向量丛的球面丛上的运算获得证明的内蕴方法,不仅证明了几何学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困难的定理,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研究整体几何的崭新方法。1945 年 9 月,美国数学会举行夏季大会,陈省身应邀作一小时演讲,在题为"大范围微分几何若干新观点"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他继承 E. 嘉当发展起来的纤维丛的理论方法,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被称之为"这表明整体微分几何新时代的到来"。10 月,完成论文《埃尔米特流形的示性类》。这是陈省身又一项重要工作,其中提出了现在称之为"陈类"的不变量,为整体微分几何奠定了基

础。陈省身以上述成就而成为国际微分几何界一位无可争辩的领袖人物。

1945年12月,陈省身提前启程返国,翌年4月初到达上海。不久,参加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任筹备处代理主任。数学研究所成立后,任代理所长,教授了吴文俊等一批后来成名的数学家。1948年,陈省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年底,再次接受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邀请赴美,担任“维布伦讨论班”主讲人。是年夏,担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几何学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1950年,应邀在美国坎布里奇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题为“纤维丛的微分几何”的大会演讲,大范围微分几何由此得到世界上的公认。20世纪50年代,陈省身在美国、欧洲广泛进行学术活动。1952年,在哈佛大学作访问教授。1960年受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在该校任职约20年,使其成为几何和拓扑研究的中心。在美国的时间里,陈省身领导了美国几何学的复兴,他在芝加哥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培养了几十名博士。也是在这期间,1961年,陈省身被推举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作为必要条件,陈省身加入美国国籍,后不久便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63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自然科学院院士。1981年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4年任名誉所长。1983年,获美国数学会斯蒂尔奖,以表彰他的“整个数学工作所产生的长期影响”。1984年,因为他“对整体微分几何的深远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而获得有“数学诺贝尔”之称的国际沃尔夫数学奖。

三、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须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基础。学校里的学生,开始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都不怕”，长大了成为科学家是许多小孩子们的理想，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出国留学也成了更多有志青年的选择，同时，大批国外的中国科学家也纷纷回国，他们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晚年的陈省身相信自己最后的事业应该在中国。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其实，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同时，时在美国的陈省身便已经开始与一些华人学者商讨如何帮助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办法。从70年代末起，陈省身仆仆奔走于中美之间，每有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机会，他都会为发展中国数学研究事业建言献策，并坚定地表达自己要努力“为中国作贡献”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陈省身工作重心还在美国。但是，他的一系列为提升中国数学水平的努力已经陆续展开。在他的倡议下，中国数学界自1980年至1986年，连续7次召开“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国际讨论会”，由陈先生出面邀请世界上一流的数学家到中国来演讲，这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为沟通中西方学术界，为中国数学研究者了解国际数学的研究状况和水平提供了交流的渠道。从1980年起，陈省身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开设“微分几何”的研究生课程；1983年夏，他在北大数学系举办“暑期数学研究生讲习班”；从1984年至1989年，由北大数学系负责操作的中国教育部与美国数学会合作的“陈省身项目”启动，每年选送20名从事数学研究的学生赴美深造。不难看出，陈省身的种种努力，均意在为中国培养年轻的数学研究人员，缩短中国数学与世界数学研究水平的差距，他对于南开数学和中国数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1985年以后，陈省身全身心投入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建设，以“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宗旨构建南开数学研究的方阵。现在看来，这一宗旨似很平常，但对当时相对闭

塞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却显示出一定的气魄，这一手笔足引领当时中国学界。上世纪80年代末期，欧美各国的数学界纷纷对数学未来做出展望，陈省身也敏锐地感到中国应该有类似的活动。他多次指出，建设21世纪数学大国，率先赶上国际水平，不是南开一家能够做到的，应是全国的任务。在他的努力下，由国家拨助专款的“数学天元基金”得以设立。这项基金从1990年的每年100万元人民币，已经增加到2003年的500万元人民币，实事表明，这项基金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年的陈省身依然忙碌，他时时关注中国数学发展前途，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21世纪之初，陈先生提议兴建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这一动议得到了国家的全力支持。在国际数学中心兴建之前，陈省身曾对好友胡国定诉说倡议兴建数学中心的用意，“眼光要放远些，要面向世界。为了吸纳更多的优秀的世界级数学家和学者来南开，现在的设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一百年不落后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当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支付和国外相同数目的薪金，请他们来南开作研究。只有当中国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数学家前来工作的时候，数学强国的理想才能实现。”陈省身先生晚年所以投入如此心力来经营中国数学方阵，培育研究力量，可见其内心横亘着一个坚定不移的“数学强国”的信念。也是在接受《大家》访谈的时候，老先生还讲了一段话，“一般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所以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某些事情可以做得跟外国人同样好，甚至于更好。中国人有能力的，我要把这个心理改过来。”对于听者而言，这就是一种民族尊严的显示，这种尊严源于他对家国的热爱、对民族智慧的骄傲和他本人内心中坚定的强国信念。在

后来每期《大家》节目的播放中,陈先生的这句话被节目组做成了一个小片花,于节目中穿插播出。《大家》的编播人员在选录这句话时,必定体会到了老人话中的深味和意蕴。

陈省身的得意弟子丘成桐教授在论及中国数学落后的原因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的教育只注重培养人的应试能力,而往往忽略对创新能力的激发,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弊端。这种忧虑又何尝不是陈先生生前对中国数学、中国教育前途的忧虑呢？其实,对中国学术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就是先生努力建设“数学强国”的不竭动力。

2005年新年到来之际,由陈省身先生提议并促成的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和配套专家公寓项目全面竣工,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中心大楼。这座风格大气、庄重而朴实无华的建筑虽是有形之物,却蕴涵了陈先生对未来中国数学发展希望的无形寄托,“我要让南开成为中国的汉堡和普林斯顿。虽然南开数学研究所现在的设施可以为国内一般的数学科研交流提供服务,但要想吸纳更多更优秀的世界级数学专家和学者,就必须建立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一百年不落伍的数学研究交流中心。”先生此言,犹在耳畔。虽然我们常常吟念起梅贻琦先生当年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仔细想想,惟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不提供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环境、研究资金,以及诸种配套设施,想必也难以延聘到一流的学者。

四、世间已无陈省身

世界上有名的华人数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惠于陈省身。

陈先生去世后,海内外的师友、弟子在追忆先生的文章中

多次提及他的惠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菲尔兹奖唯一的华人得主丘成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深情回忆与陈省身的师生情谊。当记者问及"人们怀念陈省身先生,决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着巨大人格魅力的人。您眼中的陈先生是怎么样的?"等问题时,丘成桐答道:"他关心祖国的发展。他做老师非常尽职。我曾看到1949年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时,先手写后油印的教学笔记。这是非常难得的,现在的许多数学家都不愿意手写笔记给学生看","陈先生的学术和做人,这两点我都是学不来的"。陈先生逝世的第二天,丘成桐题写了一幅挽联。挽联中写道:呜呼,大厦倾矣,二千年勾弦求根,割圆三角,终不抵陈氏造类,孤学西传,置几何于大观,扬华夏于世界。哀哉,哲人萎乎,卅五载提携攻错,赏誉四方,犹未忘柏城授业,中土东归,传算学之薪火,立科学之根基。丘成桐说:"先生走了,他留下的事我会尽力帮他做。"

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张伟平说:"陈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对数学的执著。可以说陈先生给我创造了全部的条件。"当年,刚回国当助教的张伟平,每个月只有两百多块钱。陈先生1994年回国时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他想办法给张伟平从霍英东那里争取到了一笔生活补助。南开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方复全回忆说:"与先生10多年的交往,我学到了好多,不仅是数学,还有许多做人的道理。"尤令方复全铭记的是,1997年2月底,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本来不想打扰陈省身,所以在临走前一天晚上才打电话告诉陈先生来访问的事情。但陈省身一定要他第二天到家里吃早饭后再走。到家后,陈省身与方复全聊了好多对南开数学所的设想。陈省身定居南开后,他们的交往更频繁了。每当陈省身有好酒时都会说:等复全来了再开好酒。作为20世

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陈省身先生一点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与师友相处，处处表现得像一个普通学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说："他的学问做得最好，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做到这个高度。他的为人也最好，在世界上的威望几乎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达到。"张恭庆说，与陈省身20余年的交往让自己受惠终生。1978年底，中国派遣首批50位学者出国进修，张恭庆是其中的两个数学界代表之一。正是由于陈省身的帮助，他才得以入选。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陈省身分别致信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向两校最好的数学教授力荐这两位中国年轻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说："陈(省身)先生最近太累了，我今年觉得他想多做一点事情的心情太急迫了。"南开大学前校长侯自新在回忆中提到，陈先生经常过问南开大学的一些事情，每个月都要约几个人去谈谈，谈数学，谈数学所的事情。发病前几天，他还在商量用其个人奖金在南开建设用来接待著名数学家的高级学者公寓的事。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他早在1993年与丘成桐共同倡议的。通过这些活动，他把中国和世界数学界连在一起，并建立了广泛联系，也使得中国数学家成为国际数学大家庭中一个非常积极、有活力的成员。侯自新评价说，"陈省身不仅对数学，对于其他科学，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科学界、进入世界科技创新体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他的学术地位、爱国情操和社会影响力使得他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很成功。"

陈省身去世后，中国数学会在唁电中提到，1985年，中国数学会设立了"陈省身数学奖"，至今获奖者已达18位，其中有许多是归国留学人员。他们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或担任我国一些重要数学机构的领导人，或成为学术带头人。

回顾陈先生的一生，可谓山高水长。李虎军曾在《谁来为陈省身先生立传》一文中提到：数学大师陈省身就这样走了。国内媒体上满是纪念先生的文章和报道，我却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为先生撰写传记？虽然，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张奠宙教授的《陈省身传》，但是，"这本传记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比如，传记的采访量远远不够。汉堡大学、巴黎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留有先生的足迹，与先生有过密切合作和交往的国际同行更是数不胜数，作者却没有到国外查资料，找当事人访问。张奠宙教授告诉我，他也知道这本传记有不少遗憾，但一来没有去国外访问的经费，二来他已经 70 岁了，多少有些力不从心。陈省身先生去世后，一位同行和我在 MSN 上聊天时感叹，中国其实有不少让人感动的前辈科学家，但他们中有些人在去世以后才为公众所知晓。不仅如此，一些科学家甚至在去世以后也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足够注意。"话虽如此，不过，案头那卷《陈省身传》，飘荡着悠然的纸香，看着陈先生一副面带笑容的特写印于封首，其目光深邃而坚定，透过这双眼睛，人们似乎感受到了他那"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强国"的坚定信念。如何在陈先生所开创和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成逝者的未竟事业，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这才是后人对前人、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陈省身小传

陈省身,男,1911 年 10 月 28 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美籍华人,20 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1926 年,15 岁他考入南开大学本科研修数学(南开理学院),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数学历程。1930 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就读清华大学研究生,随孙光远先生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1937 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1943 年 7 月 在美国普林斯顿全身心投入大范围微分几何研究。1948 年,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主持数学所一切工作,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 年陈省身担任芝加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10 年中,他复兴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形成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

1961 年,陈省身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职位,并入美国国籍。1981 年退休后,他担任美国数学科学所第一任所长,后任名誉所长。1984 年 5 月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1984 年,陈省身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5 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外,他还于 1975 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意大利 Lincei 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创始者,巴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主要征引书目篇目：

1. 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 梅贻琦：《赠别大一诸君》，黄延复、马相武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3.《陈省身谈中国数学：是大国而非强国》http://www.cctv.com/special/690/4/44393.html

4. 布丁：《从陈省身和纳什的成就观说起》，《中国青年报》2005 年 02 月 28 日。



王选 （1937 ~ 2006）

王选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真正继承者和开拓者。对于我们来说，激光照排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一个原理，一种理论。这个原理到处都在，包括大家熟悉的中文短信和电子邮件都和王选的发明一脉相承。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北大未名论坛网友

王选："当代毕昇"、IT 大师

黄国英

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一位网友在北大未名论坛留言。他就是"当代毕昇"王选！一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从不追名逐利的科学家，一位深刻领会了科技就是力量而又极大地实践了科技推动人类生活向前发展的科学家，一个用以自己的科技发明说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企业家。

2006 年 2 月 13 日上午 11 点，他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消息一经传出，即引起了人们的悲痛和沉思。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中文激光照排之父"，感怀他对我国印刷事业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也深深感叹生命的仓促。

一、他改变了一个时代

1937 年 2 月，王选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守其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做会计，母亲周邈清出身书香门第。1954 年，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师从江泽涵、程民德 、丁石孙等一批学者。两年后，他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专业。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计算数学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冷门专业。北大刚建立这门专业，连教材都还缺乏，学生上课只是不停地记笔记，冷清而荒凉。但王选看到了 1956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在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

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并投入到计算机硬件研究中。

大学毕业后，王选留校在无线电系担任助教。通过阅读国外文献，他认识到只有掌握硬件设计和程序与应用，才能产生创新。1961年，他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从事于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1974年8月，为了改变我国印刷行业的落后面貌，解决汉字的计算机信息处理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原国家计委批准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即"748"工程)。该工程有三个子项目，北京大学参加了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并成立了以计算机研究所为首的协作攻关会战组，后来称之为"七四八工程会战组"。次年，38岁的王选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了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工作。

尽管从1946年西方发明了第一代照排机，到1975年30年已经过去了，但中国印刷业现状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汉字照排系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使得我国印刷行业还处在沿用了近百年的铅字印刷阶段。采用铅字排版，效率低，工人负担重，溶解铅字造成的污染也很重。为了改变了这种落后的现状，王选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中。可能连自己也未曾预料到，他进行的这项研究将会给整个中国的报业、出版印刷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在当时精密照排系统研制的艰辛和不易，却是许多人无法体会到的。

为了解当时国外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情况，王选经常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藏相关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由于研制经费的奇缺，车费不能报销。从中关村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公

共汽车票是二角五分钱，为了省五分钱，体弱的王选经常宁肯少坐一站。每次复印资料时，他都很谨慎，对于字数不多的页就用笔抄写。另外，对于王选激光照排技术而言，在国产计算机条件简陋的现况下，走常规的科研道路显然是不行的。日本流行的是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在实现汉字照排自动化方面，日本在美国、原联邦德国的帮助下，已经研制出一些设备。时不我待，深思熟虑之后，一个最大胆、最前瞻的设想在王选的脑海里粗具雏形：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这一想法，在当时有些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世界上第一台激光照排机还在研制当中，就凭王选一个每月只领38元劳保费"小助教"，能行吗？有人甚至对王选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对于这些流言碎语，王选深知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同时也深知科研的乐趣就在这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研制精密照排系统，摆在王选面前的最大的困难是激光扫描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要由九百万个点组成，中文需要上千亿字节的存储量，对26个英文字母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对两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而当时国内科技界有一种论调说，汉字要想输入电脑只能拉丁文化，因此汉字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对此，王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这种关键性的、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使之提高100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种被王选用数学描述

的解决方案，被许多人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对汉字字数多、印刷用汉字字体多、精密照排要求分辨率很高所带来的技术困难，王选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压缩倍数达到500:1）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了提高字形复原速度的专用芯片，使汉字字形复原速度达到700字/秒的领先水平，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或参数）来描述笔画的宽度、拐角形状等特征，以保证字形变化后的笔画匀称和宽度一致。这一发明最后获得了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以此为核心研制的华光和方正中文电子出版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引起了我国报业和印刷业一场“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使我国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了彻底改造。

后来，这一技术迅速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方正日文出版系统进入日本的报社、杂志社和广告业，方正韩文出版系统开始进入韩国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别两度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其后不久，王选与他的团队又相继提出并领导研制了大屏幕中文报纸编排系统、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技术、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PostScript Level2栅格图像处理器、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国内首创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得到迅速推广应用，使我国出版印刷行业在“告别铅与火”后又实现了“告别报纸传真机”、“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以及“告别纸与笔”的技术革新，使中国报业技术和应用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比日本领先两年，极大地促进了印刷行业生产力的提高。近年来方正出版系统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占有率仍在不断持续上升。

由于王选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积极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昇”。计算机世界总裁刘九如认为：王老师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改变了科技的进程，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

二、方正的精神领袖

北京大学东门对面，方正大厦巍然而立，这里也是方正集团的总部。“这是王选一手带大的‘孩子’”，一名方正集团的高层人士说。2003年，王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办公室并未搬出方正集团，助手也未换。在这座大厦的一楼展厅，一直挂着一幅王选和江泽民握手的照片。而在方正集团内部，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王选身后留下的恢弘事业和集团上下对他的敬重。

事实上，王选和方正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方正对王选来说，早已不是公司与领导的关系。在外人看来，他们就是儿子与父亲；在王选的心里，方正就是他的家。虽然，王选从未担任过方正总裁，然而他却是方正集团名副其实的象征、精神领袖，人们说“王选就是方正”。方正依靠王选的技术才成其为方正，而王选的后半生，则为方正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心血。自从1995年担任方正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以来，王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方正未来发展的思索。因为人们认为王选给北大方正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先进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

在他的带领下，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就达到40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不过，对于自己的成就，王选自己却非常谦虚。他说：方正集团能迅速发展，得益于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紧密结合。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他又笑

称自己的董事长职务是卖狗皮膏药。

但是,作为方正集团的奠基人,没有王选及其激光照排技术就没有方正集团,更没有方正集团的今天。也正是因为他的突出贡献,才使方正集团成为中国企业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拥有原创性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1988 年,王选在北大方正集团提出了"顶天立地"的著名论断,开始探索和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产学研的创新模式。他一直认为,自己有一种"负债心理",觉得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能促使他们不断进取。"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多年的实践证明,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引领北大方正从一个最早只靠激光照排技术生存的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几十个项目的集团公司,其在国内中文专业排版领域的年营业额超过 15 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

另外,王选还是方正集团持续科技创新的伟大源泉与不竭动力。他奠定了方正集团的"技工贸"发展道路,积极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在整个经济和生产上的应用,也正是由于他的坚定信念使方正集团持续创新 20 年。方正集团在持续创新中不断发展的成功实践,同时证明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实现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技工贸"道路。

现在,王选的"执著的创新精神"已深深的渗入在方正集团血液里,无论是以照排系统为主要业务的方正电子、还是以 PC 及 PC 相关为主要业务的方正科技,都始终不懈地技术创新。方正电子和方正科技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综合实力很强的 IT 厂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深刻领悟到了王选技术创新的精髓,在战略层面的高度把它看作企业的生存之本和竞争力的强大引擎。事实上,方正发展史就是不断技术创新的写照,同时

也是中国IT业界技术创新的标杆。

现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对媒体说：王选老师是个人格非常高尚的人，他一直提倡"持续创新"和"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并且以身作则。他强调首先学会做人，再学怎么做事，这一切都坚定了方正文化的基础，因此我们把王选老师称之为方正的"精神领袖"。没有王选老师的激光照排技术就没有方正。魏新还表示，除了在科学上的贡献，作为方正集团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从经济效益上来说，他给方正带来了十几个亿的利润，而所带来的连锁效应甚至更大。作为印刷行业一次颠覆性的革命，这个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在印刷业和报刊业，缩短了新闻发稿的周期。方正集团现在占有国内报刊业80%以上的份额，在全球华文市场则占有90%以上的份额。

1996年6月，在王选的建议下，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全员汇入方正集团，成为集团的一个部分。王选有一个说法，叫"顶天立地模式和一条龙体制"，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点和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堪称"四星级"单位，这"四星"均属"顶天"范畴，加上"集团公司"才真正做到"顶天立地"。前述的"四星"汇入方正集团，北大方正就成了所谓"五星级企业"，建成这种从尖端科研到售后服务都浑然一体的一条龙体制，就有了飞腾之势。他们随后推出的一个排版软件就叫"飞腾"。两大"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北大方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随后，王选和方正又做出了一次次新的选择：打入日本、韩国市场、进军数学媒体领域、将技术研究院的职务交与肖建国、引入"空降部队"李汉生抓管理等重大举措，北大方正的事业如日中天。

另外,王选对方正集团的贡献,还体现在他为方正集团营造了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气氛。他一直强调,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懂得依靠团队,千方百计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王选最佩服"两弹元勋"邓稼先,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王选认为,善于看到别人、尤其是同事的长处,是具有良好团队精神的基础。在回顾其所从事的三个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时,他经常提到那些在许多技术环节上都比他强的同事。他认为:那种只想个人冒尖、不喜与人合作的人,很难做出成绩,即使取得一时成功,也会因此造成更大的失误。而宽容、善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的人,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

王选说:"软件是一个集体性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正确的方向,围绕一个目标,才有价值,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的情形是,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到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吗?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吗?"

一位IT专家认为:王选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指出一个正确的战略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气氛,形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科技企业团队。这是一个无形资产,也是北大方正永葆青春活力的原动力。

三、不遗余力提携后学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新思想和新成果。他说:"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

轻才俊。"有些人开始不理解，但王选清醒地认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他说微软的比尔·盖茨曾讲过，由一位60多岁的老人领导微软公司，是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会在55岁退下来，交给年轻的一代。由于当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王选在刚过55岁时，就立即提了一个建议："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其实，很明显他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外。因为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优势，人过中年、步入老年后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容易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甚至导致严重损失。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王选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为人梯"精神，来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方正研究院每招收一届员工，王选都要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以及他们的特长。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对照年轻人的表现，修订记录的内容，考虑如何安排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一些刚来方正的年轻人，因为岗位不适应来找他，他在了解情况后都会立即找来相关部门的经理，当场解决问题。如果有重要骨干想跳槽，他都会亲自出马，弄清他要走的意图，找到解决的办法，真心真意地挽留他。

王选曾说：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要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年轻人在高新技术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为了给国家造就人才，为了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王选主动给年轻人让位。他说："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直到临终前，他依然号召后

学“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事实上,正在王选精心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所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肖建国30岁时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班 ,1988年就先后主持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屏幕中文报纸组版系统及彩色排版系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彩色照排与中文合一的编排和输出,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随之引发了中文报业的一场彩色革命。1994年他又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又一重大突破。后来,肖建国回忆道,1985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后来到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实习,从此20多年一直跟随王选老师学习和工作。王选对人的关心润泽无声,我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晋升教授仅用了四年半时间! 仔细回忆一下,我从未和他提出过我该晋升职称了,都是他主动安排的,而且每次提职后他也从未和我提及他是如何帮助我不断破格提职的,他也从来没在我面前暗示过他的关照。

现在担任联想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的阳振坤,24岁时刚成为王选的博士生时,王选就把研制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的博士论文题目交给了他。这使阳振坤惊讶不已。前五代RIP(栅格图像处理器)都是王选亲自主持研制的,作为照排系统的核心,它们就是我国照排系统取得辉煌成功的关键。而阳振坤仅仅是一个刚刚进门的博士生,王选为他选择的课题就是要他超越王选,这可能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选、阳振坤成功了,1994

年，阳振坤的大脑里突然萌生出奇想：彻底抛弃 RIP 里的硬件，完全由软件来支撑，这不啻于是个非常大胆的奇想，意味着对王选"欧洲专利"的彻底超越。

1995 年 6 月，一个叫邹维的年轻人来投奔王选。邹维在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被保送到中科院计算所攻读董韫美院士的硕士。28 岁时，他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其研究成果却始终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后来，邹维离开中科院到了一家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由此将美国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并将中国的同类产品打垮。虽然邹维工资很高待遇较好，但他总是感觉到心里不大舒服。于是他试着给王选发了一封求职信。王选看到了邹维的简历和董韫美院士较高的评价后，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收下了邹维。

同年 9 月，王选交给他一个选题，就是用计算机制作动画。邹维历时一年半，终于成功地研制开发了命名为"点睛"卡通动画制作系统。"点睛"的整体性能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美国同类软件。后来，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台、北京电影学院等影视部门都先后使用这套系统。此后不久，此套卡通动画制作系统被西班牙的动画片制作所采用。这是邹维第一次看到自己主持的科研直接变成了社会产品，中间根本没有"转化"一说。如今，邹维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数字媒体研究所长。

王选用自己杰出的科技成就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我国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北大方正印艺事业部字体开发总监朱志伟，对此也是感慨良多。十多年前，他仅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来方正公司面试时，主考官正是王选。王选发现他的技术专长，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就问他有什么要求。朱志伟表示，只想保留全

民所有制的身份。王选说:“好,我给你办。”但是方正是企业编制,只有进北大才能解决这一难题。王选亲自找到北大校长说,我宁肯少招一个博士,也要把这个人调进来。经过王选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面对今天的成就,朱志伟由衷地感慨到:“从一名工人到开发总监,我的成长与王选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不断使年轻人得到成长提高,王选多次强调:应该给优秀的年轻人更多的发展空间,除了做重大项目的总体设计和总管外,还鼓励他们在其熟悉的领域内提出有前景的新方向。

现任点击科技总裁、曾任新浪 CEO 的王志东对于恩师王选自己的栽培更是感慨不已。他说:我调入 748 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方正研究院),全是王老师提拔。我在研究所所做的第一个项目是汉化 Windows 平台,就是王老师亲自安排的,后来中文之星、RichWin 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发的,如果没有王老师的大力支持,甚至可能连新浪都不会出现。

每次介绍新的研究成果,王选都会把幕后的新人隆重推向前台:“来,你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王选这样做,是因为他洞悉科学发展的趋势和人才成长规律,即如他所言:计算机处理能力每 18 个月翻一番,只有年轻人才有这个速度。很多计算机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流学者,他们的第一个杰出成就很少在 40 岁以后取得;在计算机领域里,很难有 60 岁的权威,所有创业者都是年轻人。

另外,他生前公开表示:他个人的两次创造高峰,一次是 26 岁时,一次是 38 岁时,但那时却“有用而无名”。王选又说:我 38 岁的时候,处在电脑照排领域的最前沿,但只是个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我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在他们身上重演。由

此看来，王选那么注重培养年轻人，希望他们早日成为领军人物，站在创新最前沿，也因他对中国人才体制和人才激励机制有着切肤之痛。“发展计算机技术不但是国际潮流，也是国家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王选生前这段话，实际上表明了他特别希望并努力帮助年轻人早成栋梁之材。因为对他来说，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当生命的黄昏来临之时，他义无反顾拿出 900 万元奖金，成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和鼓励青年人进行技术创新，力图腾出自己的肩膀供青年学者去努力攀登，让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接再厉实现“巨人梦”，以“超越王选，走向世界”。

四、半生苦累，一生心安

王选逝世后，在他的棺椁前，挂着他夫人陈堃銶写的挽联“半生苦累，一生心安”。“半生苦累，一生心安”即是陈堃銶对丈夫王选一生最好的概括，也是其夫妻科技与爱情生活最好的写照。在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是他相濡以沫 30 多年的妻子陈堃銶。因为在十几年的激光照排研制中，陈堃銶作为汉字激光照排大型系统软件的总设计者，基本上所有的软件设计都是出自她之手。但后来无论王选多么声名显赫，她都是站在耀眼的光环之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

作为王选的同乡，陈堃銶比王选高一届，也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1957 年毕业留校做助教。作为师姐和小老师，陈堃銶曾经辅导过王选他们班的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课程。她正直诚实、心地善良的性格给王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堃銶也对这位才气过人、身体瘦弱的小老乡、小师弟也关照有加。

1961 年，由于高负荷的工作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以及由

灾害带来的饥饿，王选病倒了，被迫回到上海养病。这期间，他仍然带病研究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就在他为手头缺少研究资料而焦虑的时候，他忽然接到师姐陈堃銶从北京寄来的一本珍贵的英文资料——"ALGOL60"修改报告。这是国外新研制出来的一种计算机高级语言，国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完全读懂，正是王选研究项目所急需的。感激之余，王选深深体味到这位才女对自己的一片柔情。回忆在北京与她相处的那些美好日子，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晚就给陈堃銶写下了第一封情书。信发走后，王选有些忐忑不安，然而让他欣喜的是，陈堃銶很快就回了信，并接受了这位小师弟的求爱。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因为"黑五类"的出身，又经常收听外语广播，王选被定为"修正主义苗子"，被迫送到京郊昌平分校接受劳动改造。不久，他的旧病复发了，而且这一次病得更加厉害。在那些孤寂艰难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陈堃銶都会乘坐长途汽车，颠簸几十公里，以女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他，给他送来罐头、点心，为他打扫整理房间、清洗衣服。但是在昌平毕竟没有必要的医疗护理，王选连日常起居都难以自理，其病情也日益恶化。就在这时，陈堃銶做出了一个让王选都不敢相信的决定"跟我回北大，我们结婚吧……"王选长叹一声说："我这个样子，病都不知道能不能好，怎么能拖累你呢？"陈堃銶坚定回答："正因为你病成这个样子，才需要人照顾。有我照顾你，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陈堃銶与王选结婚的消息传开了，许多人都不能理解，认为陈堃銶也太傻了，一个前途无量的才女竟然选择了一个有"政治问题"且病魔缠身的穷教师。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她的决心，她坚信真正的爱情不仅能同欢乐，更能共患难。

1967年2月1日，几经磨难之后，王选与陈堃銶终于在北

大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陈堃銶1元钱买了一块小搓板儿，同事们找来两张好的单人床一拼，两个人把各自的箱子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虽然没有热闹的仪式，也没有鞭炮和酒宴，但两颗心却从此紧紧联在一起相知相契。

婚后，陈堃銶把王选接回北大休养。很长一段时间，她承担了所有家务，每天在椅子上铺一床棉被，然后把王选扶到椅子上，让他靠着椅背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王选夫妇住三楼，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王选当时别说上下楼，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因而每天打水倒水，陈堃銶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加之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她有时也感到身心疲惫。可她知道王选的日子比她更艰难，所以不管多累多苦，她总是咬牙坚持着。多年以后，王选深情地回忆："如果不是她，我扛不过来，也不会有今天的一切。一个人如果有真正信任你、理解你的妻子，是不会轻易自杀的。"

1975年春天，北大有了一台计算机。陈堃銶在计算机应用情况的调研中了解到，国家有个关于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重点科研项目，代号为"748工程"。她凭着多年的教学科研经验以及对国内外计算机行业信息资料的掌握，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件值得做的大事。她把这一信息告诉了王选。将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出版印刷行业，是王选在病榻上几度做过的美梦。而这一信息使王选美妙的构想有了一个可以实施的机遇，汉字精密照排的难度和光明的应用前景，更加激发起了王选挑战性工作的天性和创造的欲望。夫妇俩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使他们共同走上了的这条充满了荆棘的漫长的科学之路。

生活上悉心照料，科学上鼎立相携，那些日子夫妻俩常常

是早上一睁开眼，就开始讨论科研方案，时而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时而又不谋而合，夫唱妇随。大部分技术上的难题，不是在办公室，而恰恰是在清晨的讨论，或半夜的突发奇想中得到解决的。特别是在王选的科研中，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设计和调试软件，一直是由陈堃銶负责。当时没有软盘、没有显示器，总量达 14 万行的程序全用汇编语言写出，其艰难是今天从事软件开发的青年们难以想像的。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节假日和不眠之夜的奋力拼搏，终于在 1976 年初，他们设计出了一个两人都比较满意的“轮廓加参数”汉字高倍压缩方案。

这里，王选天才的创造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作为我国最早的软件专家之一，北大方正系统软件的总体设计师陈堃銶则构筑起了整个排版软件的总体框架，她设计的软件开发实施方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亲手编制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程序。

回首往事，王选说：我们能从困境中过来，靠的是对事业和价值的追求，如果只图名利，就很难克服那些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但困难和灾祸却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1981 年，陈堃銶被诊断患直肠癌，听到这个消息王选心如刀割。《王选的世界》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王选想着这些年陈堃銶陪自己走过的风风雨雨……在自己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时，她是自己生命的坚强支撑；在研制激光照排的艰难岁月，她又是自己事业上最得力的伙伴。”

陈堃銶则轻声安慰丈夫。在等待手术的那几天，她还和同房病友一起唱起苏联歌曲《喀秋莎》。所幸后来发现癌细胞并未转移。手术后的陈堃銶冲王选一笑，“我为激光照排贡献了一截直肠，你得记我一功。”休息了一年，陈堃銶又回到了科研

第一线。

1987年5月22日，是王选夫妇永远难忘的一天，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经济日报》出版了第一张完全采用计算机屏幕组版、整版激光输出的中文报纸。同年12月2日，在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日报社告别了铅字印刷历史，完全实现了计算机激光照排，这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跨入"电与光"的时代。此后短短几年，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机以及中国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从此走在了世界前列。

作为项目负责人，王选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荣获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牌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国家最级科学技术奖等重大奖项。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等职务。而与他共同奋斗相濡以沫的妻子却无怨无悔地隐藏在他光环的背后，淡泊名利，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

因而，王选每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自己的科研成果时，总会流露出对妻子的感谢和愧疚。他说："我总觉得自己剥削了她，两人的荣誉加在了我一个人身上。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可以说，没有她和那些当年一起奋斗过来的中年教师，就没有北大方正今日的辉煌。"

2001年，王选被查出患有肺癌。此后几年，夫妻俩又像当年一样，携手与病魔抗争。然而，这一次王选却没能跨过那一道坎……

五、用一生诠释创新的大师

王选的逝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一生塑造了一座自主创新的丰碑，也塑造了一座拼搏不息、勇攀高峰的精神丰碑。人们期盼着，科技领域能涌现出更多这样的丰碑。

王选短暂的一生，也是科技创新孜孜以求的一生。上世纪70年代末，在国家的组织下，是他大胆提出跳过正在攻关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正是他和他的团队一系列的创新活动，促进了汉字激光照排产业的形成，取代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而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王选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真正继承者和开拓者。对于我们来说，激光照排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一个原理，一种理论。这个原理到处都在，包括大家熟悉的中文短信和电子邮件都和王选的发明一脉相承。另外，王选的创新，也不仅仅限于对技术的追求，其在推动技术产业化上，也同样表现出自主创新的勇气与智慧。

晚年的王选更是多次呼吁，要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但王选的创新步伐就一直没有停息。在成功地研发出激光照排系统和报业流程管理系统以后，1995年以后王选又率领北大方正集团进军广播电视领域。目前省级电视台80%采用的是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研发的电子播控系统。

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王选等人不仅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功底，更有敢于在别人不曾走过的原野里独辟蹊径的勇气。在王选身上，我们看到了几十年如一日、拼搏在科学前沿的信心与毅力；看到了历尽磨难、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看到了急国家之所急，想民族之所想的爱国情怀；看到了诲人不倦、提携后进的崇高品格。他的业绩也昭示我们，立足中华大地，放眼科学前沿，矢志探索创新，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一个苍老的背影在我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但一个永远的名字却深深刻进我们心中。他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一个企业

家，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一位 IT 界的大师。而事实上，在中国 IT 界没有任何一个逝者能比王选更让人遗憾，比王选的贡献更大了。或许在中国 IT 界"当代毕昇"和"方正之士"这样的称号，都不能完全地诠释这位长者的风范，但是正因为有了王选，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新时期真正的院士，正因为有了王选，我们才明白了什么是新时期真正的科学家。

王选小传

1937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曾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方正(香港)董事局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王选的主要成就是:1958~1974年期间，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究，与同事共同完成了DJS21机ALGOL60编译系统，并得到了推广。1975年起主持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该系统可用于书刊、报纸等正式出版物的编排。针对汉字字数多、印刷用汉字字体多、精密照排要求分辨率很高所带来的技术困难，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方法，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或参数)来描述笔画的宽度、拐角形状等特征，以保证字形变化后的笔画匀称和宽度一致。这一发明获得了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其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中国的印刷术从铅与火的时代，迈入电和激光的新纪元。

由于其卓越的成就，王选在1986年获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届毕昇奖。1990年获陈嘉庚奖。1991年获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199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1997年获台湾潘文渊文教基金奖，1999年获香港蒋氏科技成就奖。

主要征引书目篇目

1. 丛中笑:《王选的世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版。

2. 蔡恩泽:《科学家王选的成功之道》,《管理与财富》2002 年第 3 期。

3. 乐艳娜:《王选:"当代毕昇"乘鹤去》,《瞭望新闻周刊》,2006 年 2 月 20 日。

4. 余玮、吴志菲:《"当代毕昇"——王选》,《华人时刊》2002 年第 4 期。

5.《风范犹存:怀念王选院士》,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黄昆 (1919 ~ 2005)

"He is a greatman."

——卡尔多纳　德国马普学会物理研究所前所长

黄昆先生做人、做科研求真务实，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的思维和严谨的学风都值得我们学习。

——李志坚　清华大学教授 中科院院士

黄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

王建明

他自称境界不高,才能有限,可他却达到了中国科学界的顶级水平。他自称只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可他的理论却哺育了世界物理学几代人的成长,其著作被学者们像圣经一样摆在书桌上。他就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黄昆。

科坛泰斗,晶格动力学,英名誉中外;学海宗师,半导体物理,师表惠后学。时间永远定格在 2005 年 7 月 6 日 16 时 18 分,黄昆,这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这位被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恩视为得意门生,因病停止了前行的脚步。这位只认真理,引领中国半导体研究进入世界前沿的“小兵”,一个喜欢“与众不同”的快乐老人,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而此前他用自己最大的一笔“物质财富”——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500 万元奖金中的 450 万元,作为启动本金设立“黄昆奖”(“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科学研究奖”),用于奖励“我国在固体物理学及半导体物理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

一、淡泊低调的物理学巨人

2002 年 2 月 1 日上午,随着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给黄昆颁发了 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和奖金,他成为继吴文俊之后在基础研究领域问鼎国家最高科技奖

的科学家。而在这一刻，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惊人地相似：黄昆？黄昆是谁？其实，这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只是其为人淡泊和低调而已。早在留学英国的时期，而立之年的黄昆已将 3 个“黄氏”理论砌入世界物理学丰碑。1951 年，正处在科学巅峰期的他毅然回国报效祖国。1955 年，年仅 36 岁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为最年轻的委员。1980 年，又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共 15 位，其中 5 位获得诺贝尔奖）……

在科学界赫赫有名，在公众面前默默无闻，这是黄昆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前，真实的生存状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称：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与黄昆同住一室时争论出来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波恩也称：与黄昆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出版后，他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说到：“书稿的内容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满足了。”

科学家的头脑、数十年的风雨生涯使黄昆异常冷静、真实，有时其真实得让人有点难以接受。2002 年，黄昆获得了 500 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但他拿出 450 万元成立了奖励基金。之后，他的生活依然如故。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绒线圆帽，蓝布中山装，一双穿旧的布鞋，让你无法将这套装扮和科学巨匠联系起来。获奖后他曾坦言，得奖对自己生活的唯一影响是换了一辆新汽车。高兴的是司机，对我来说，就是有个车把我从家里运到研究所，再从研究所运回家。老人依旧淡然低调。

早在多年以前，“大名鼎鼎”的黄昆并不为普通老百姓所熟知时，他就“最怕记者”。他的夫人李爱扶则学会了“黄昆是黄昆，我是我，他的问题请不要来问我”这一招来对付媒体。《人

民日报》记者杨斌曾这样报道他：

> 第一次见黄老，是2002年1月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前夕。83岁的老人当时已被确诊患了帕金森氏综合征，自己扣扣子都觉得困难。碍于情面，他同意接受30分钟的集体采访。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把问题汇总在一起，由我一人代问。"我不是帅才，是一个小兵。"这是他和记者杨斌交谈时说的第一句话。

新华社记者沈路涛和李斌采访他的"遭遇"更耐人寻味：

> 在记者的百般争取下，虽然他答应采访，但只能给一个多小时；虽然应允记者去他家，但却只能看不能问，"否则无法向夫人交代"，条件相当"苛刻"。黄昆位于中关村的家，是套小三室的房子。狭窄昏暗，堆满了书，显得非常拥挤，门口一古色古香的木箱子上是中科院物理所在他七十华诞时赠送的8个字："壮志不已，耕耘不辍"，客厅兼卧室的墙上是一幅一米多长的松竹梅"三友图"。十几分钟的采访变成了无声的"参观"，而始终坐在沙发上的黄昆夫妇在翻阅着报纸。如今的报纸太厚了，翻起来比看还难。这是家庭采访中黄昆所说的唯一的一句……"我很高兴，但也很不习惯。得奖意味着要占据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像你们访问我。"黄昆实话实说。

作为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又是运用科技成果给公众带来生活享受的科学家，黄昆在他大半个世纪的人生中，却始终以一种沉默的姿态，孜孜不倦地追寻科学的真谛。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评价也十分低调。他说：自己的成就说不上有很大的特点，也说不出太大的道理，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只不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做得还可以。

其实这种淡泊低调的背后，是其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这

样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一贯宠辱不惊的，自然不希望任何人像追星一般去仰望他。当然他愈如此，我们就愈有必要了解他，了解他最值得后人仰望之所在。《读者》主编彭长城由衷地感慨：默默耕耘，不问收获。似乎已很久不再被大家宣扬的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在新时期的今天，依然能让我们长久感动。

二、喜欢较真的一代物理学大师

黄昆出生在一个银行高级职员家庭里。家庭中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毫无拘束的气氛，特别是母亲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成长影响巨大。母亲经常告诫黄昆，事无论巨细，都必须认真对待，力求完美。后来，黄昆一直遵循母亲的教诲，无论做学问、搞研究，还是做人，都严格要求自己。

1941年，黄昆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来到西南联大攻读物理系研究学位，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这里学术讨论风气盛行，这又使得从小便酷爱争论的黄昆有了一个争辩的天地。当时他与杨振宁、张守廉同住一间宿舍，三人被称为是物理系的三剑客。那时的黄昆和杨振宁都年方二十出头，总是喜欢纵论天下，相互顶牛。而黄昆往往都将话题引向极端，引发无休止的争论。后来，杨振宁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岁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情》的文章中回忆道：

>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学）里面的各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的“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到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上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旧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

森伯的《量子物理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杨振宁后来多次对人说:"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而黄昆较真的学术态度,不光是杨振宁个人的感受,在圈内也早就出了名,有时甚至让人下不了台。1951 年,学成归国的黄昆从留英归来,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有一次,北大物理系一位教师评定教授职称时,大多数学术委员都觉得不错表示同意,而他却"固执己见"。他说:"就他那水平,给他一个副教授就不错了。"当然,较真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严谨。这些较真的小事,实际上体现了一代物理学大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教授,对于老师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有体会。他说,老师黄昆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来到办公室后,最开始肯定是要把自己昨天在家中或者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一个思路,对着同事或者学生讲一遍。这对他有两个好处,一可以让自己重新整理那些偶然一现的思路,二也可以促成师生间的交流,让学生给自己挑刺。朱邦芬说,通常的情形是,黄昆一番陈述结束的时候,就是办公室里一天争论的开始。辩论双方不会放过彼此思路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瑕疵。辩论的结果呢?有时候朱邦芬赢。但第二天他又常常被黄昆找出什么漏洞给扳回去。而事实上,研究的问题就在这否定之否定中渐渐清楚了。

夏建白,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虽然和黄昆为师为友数十年,但谈起这位老师,他至今仍然有些发怵:"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他。"黄昆让人"害怕",别无他因,就是因为他对自己、对他人的要求都比较严。从 1977 年担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后,半导体所成为他至今工作和学习的地方。"一般人往往追求数量,频繁出成果,而他要求我们少而精,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工作。"夏建白说。

在科学研究上，黄昆对于问题的每一个环节，总是反复推敲。他虽然不赞成用繁琐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物理问题，但在需要用数学推导和计算时，又十分仔细，反复多遍。即使在论文文字表达上，他都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力求完美。此外，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严格要求身边中青年科研人员，对他们撰写的论文往往多次修改，以至于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有时覆盖了原稿。同时，他又非常反对许多人文章发表了许多篇，却没有真正解决一个问题的治学方式。

严谨是黄昆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黄昆半个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经受住了历史长河的考验，相关论文至今仍年均被全世界的同行引用 6 至 7 次。也正是因为黄昆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竖起了一座座伟大的丰碑，赢得了全世界物理学研究的尊敬。

三、"我把黄昆的书像圣经一样放在书桌上"

1947 年 5 月，黄昆留学英国，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当代物理学大师玻恩(M. Born)处作短期访问。玻恩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也是晶体原子运动系统理论的开创者，早在二战期间，玻恩就打算从量子力学最一般原理出发，写一部关于晶格动力学的专著，但战后由于忙于其他事务且年事已高，此事一度搁置。工作中玻恩发现黄昆不仅熟悉这门学科，而且对这门学科许多问题都能提出深邃的见解和独特的看法。由于他决定将用量子力学阐述晶格动力学理论的《晶格动力学》专著的重任交给了黄昆，同时还交给他一些残缺不全的旧手稿。并建议在其手稿的基础上，由黄昆执笔与自己合作完成这部专著。

经过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同意后，黄昆决定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为了得到必要的经费支持，1948 年初黄昆又接受了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的弗罗利希的聘请，成为

该系的为期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员。在利物浦三年期间,他在科学事业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晶体中原子振动是晶体中一种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对晶体的热学、电学、光学、力学性质都有重要的影响。从 1945 年起,许多科学家对晶格动力学已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和理论研究工作。在总结前辈研究的基础上,黄昆以严谨的论述和非常清晰的物理图像对这个固体物理学中的最基本领域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1952 年,经过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后,黄昆终于完成了《晶格动力学理论》这一伟大的著作。著作一经问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固体物理学这个领域,而且还成为研究该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一部专著。黄昆后来回忆到:"写这样的书非同儿戏,有一段时间,我同玻恩教授为要不要在点阵动力学的系统推导之前加上基本导论性的三章发生了争论……后来,他让步表示同意我的想法。"事实上谁也没想到,黄昆当初写进的内容在 1960 年激光发现以后,一一被实验证实。玻恩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对黄昆伸出了大拇指,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也正是由于这项研究,奠定了黄昆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晶格动力学理论》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晶格动力学的系统专著,其问世后,多次再版并一再重印,且被译成多国文字。1985 年发行了第三版,编辑在封底特意加了一段评价,玻恩和黄昆关于晶格动力学的主要著作已出版 30 年了。当年,本书代表了该主题的最终总结,现在,在许多方面该书仍是该主题的最终总结。事实上确实如此,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作为晶格振动及其相关效应如拉曼散射、瑞利散射、红外光谱、比热和

弹性等理论的经典著作,成了几代科学家的入门指导书和必备参考书。

在将该书出版近半个世纪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列入了"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几代固体物理学家都通过学习这本专著而了解晶格动力学这个领域。1979 年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委员会主席 R.J.Elliot 曾在一个报告会上说:"我是在学习玻恩和黄昆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并受到教益和启发以后,才开始研究晶格动力学的。"曾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理学院院长、晶格动力学权威 W. Cochran 在他写的《晶格中的原子动力学》一书(1973 年出版)引言中说:"玻恩和黄昆在 1954 年出版的《晶格动力学》,至今仍是这个学科的主要方面的权威著作。"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国外学者,如美国的 A. A. Maradudin,英国的 R. J. Elliot 等都说过,"我们研究晶格动力学,是在学习了玻恩和黄昆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以后,受到教益和启发才开始的。"

黄先生在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方面全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国际物理学界非常尊敬他。与黄昆先作师生、后为同事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张树霖教授对此深有体会。1989 年在德国一个学术会议上,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物理系主任就对他说:"我把黄昆的书像圣经一样放在我的书桌上。"

四、不用黄昆"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

1975 年 9 月,在一次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汇报提纲")会议上,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

> 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

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样的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个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邓小平指的老科学家就是黄昆，后来此段话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事实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当时任北大物理系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黄昆就"靠边站"，并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他又被安排在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北大200号"参加"斗、批、改"运动。"北大200号"主要搞半导体生产，要求教员到生产一线带学生。在那里，黄昆焊过塑料通风管，也做过晶体管集成电路。

1970年以后，北京大学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学校安排黄昆给这些工农兵学员讲授半导体物理课。面对这些既普遍缺乏数学和物理基础知识，又将大部分从事半导体技术工作的学生，他打破了传统的系统讲授的方法，总结概括出从事技术工作所必要的物理概念，避开详细的数学推导和深奥的物理背景，采用模拟的办法，定性地给出必要的结论，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虽然黄昆边干边教，干得也不错，但是"北大200号"的主要任务毕竟是生产半导体器件，而黄昆的特长是研究与讲授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因此，"北大200号"的工作和他的专业很不对口。

1975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邀请黄昆作学术报告，黄昆的新颖见解和精彩论点给半导体所及广大科研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邓小平通过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工作的女儿邓楠，了解到黄昆在"文革"中的一些坎坷遭遇。邓小平对像黄昆这样"用非所学"，而国家建设又急需的人才现象，十分痛心和惋惜。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在汇报提纲上的

上述讲话。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黄昆调往中国科学院的事一直拖了下来。

1977年8月，在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特意向参加会议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询问了黄昆的近况。当了解到黄昆还在“北大200号”时，邓小平欠起身子，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强调的手势：“我现在还认为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直接关照下，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黄昆，终于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回到阔别已经26年的科研一线，黄昆开始了自己在科研上的第二个春天。这中间，其实还有一段感人的插曲——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复出，当他了解到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黄昆为此受到牵连。为此，邓小平多次托人向他表示歉意，说自己给黄昆惹了麻烦，使他受到压力。黄昆后来对人说：“小平同志1977年亲自点名让我担任半导体所所长，其实那时我深感自己的条件和所长的岗位很不相称。”为此，黄昆特意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方毅写了一封请辞信，说明自己不能适应领导工作。然而，没过几天方毅就向黄昆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要他当所长，就是要他直接到实验室去。对此，黄昆十分感动。他说：“只有丢掉包袱，尽自己能力做好所里的业务工作。”因为除了努力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能报答小平同志对他的知遇之恩的。

成立于1960年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是一个致力于半导体材料、物理、微电子器材等领域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所。作为该所所长，黄昆在组织全所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全所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他认为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在别人

后面赶的被动局面”。为了提高所里科研人员的素质，黄昆决定重操旧业，上台讲课。

一个平常的星期天，黄昆的家门上新挂了一块牌子“黄昆不在家”，这使那些前来切磋学问和请教问题的人感到纳闷，“他星期天极少出门，难道今天真的出去啦？”其实，此时黄昆正在屋头紧张地备课呢。因为要讲课，就必须要备课，可平时又实在没有备课时间，结果星期天成了黄昆法定的备课日。在那段时间里，一到星期天，黄昆最怕听见敲门的声音，因为这关系到第二天能否按时去上课。

从1978年初开始，黄昆每星期都要抽出半天时间，给全所科研人员讲授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基础。他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说：“那时没有教室，就在走廊上课，总是挤满了听课的人们。”这样他前后整整讲了10个月，这不仅使全所学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培养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空气活跃的研究集体。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黄昆认为既然身在科研第一线，就不能不做科学研究工作。年纪大，知识老化，不等于不能做研究。为此，他决定重返科研前沿，开始了中断多年的研究工作。在国际物理界沉寂近30年后，黄昆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他开始了自己研究生涯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事实上，复出了黄昆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并多次获取国家科技大奖。其中，1980年黄昆建立了统一绝热近似与静态耦合理论，就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1984年，“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的绝热近似和静态偶合理论”，获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一等奖。1989年，“超晶格电子态理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0年，“半导体超晶格和量子阱的光学声子模和弗洛里希作用势”，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3年，“半导

体超晶格的电子态和声子模理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5 年,“半导体超晶格量子阱声子拉曼散射微观理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6 年,“固体物理学”,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黄昆在物理学界的复出,正如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卡多纳所描述的,“他好比现代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固体物理学家”。在黄昆所长的主持下,针对国际上在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重新开展了研究。他创造并推进了我国自己的半导体超晶格物理研究,筹办并成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使我国在国际上这个新兴的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与朱邦芬先生建立了“黄—朱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声子有关的各种物理问题与器件研究,并已作为该领域的必读文献列入许多国家专著和研究生的教材里……

五、“黄 - 里斯因子”与爱情佳话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伟大的女人,不离不弃地支持着他。黄昆也不例外。黄昆的“洋夫人”艾夫·里斯(Rhys),是他在利物浦大学期间,结识的英国女同事,并建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之间的爱情与婚姻也成为了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小他 7 岁的威尔士人里斯,原是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大学毕业后与黄昆同时来到了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担任系主任弗洛里希的行政助理,并帮助黄昆进行理论计算。黄昆的聪敏与敬业深深地吸引了里斯小姐,而里斯小姐的学识、勤奋和温柔美丽也给黄昆留下深刻印象。共同的事业追求与爱好把两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951 年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次年 4 月,里

斯克服重重阻力，远涉重洋追随着黄昆来到中国。黄昆的哥哥给里斯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爱扶”，既是谐音，又寓意“乐于助人”。不久，二人喜结伉俪，相敬如宾，抚养的孩子均学有成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家。

李爱扶女士是一位既有欧洲人的直爽性格，又具有中国妇女相夫教子的传统美德。尽管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的一切从语言到做饭再到操持家务，她都从头学起，但她都是任劳任怨地充当了黄昆最坚强的后盾。来到中国4年后，李爱扶被批准取得了中国国籍，1959年起，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电子学工程师。

对于爱妻，黄昆评价极高，打出了“90”的高分。因为在黄昆成功的背后，一直有着这位来自异国的贤内助的默默支持和奉献。著名的“黄理论”实际上是“黄－里斯理论”，是夫妻二人智慧的共同结晶。1950年，黄昆在利物浦大学担任ICI博士后研究员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三篇大概在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一项就是和他当时的研究助手、后来的妻子李爱扶合作拓展的多声子跃迁理论，以“黄－里斯因子”而著称于世。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F中心的光吸收和非辐射跃迁理论》，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黄－里斯理论”。

许多和李爱扶接触过的人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如北京大学物理系张树霖教授认为：“许多和她接触过的人说，‘她比中国的贤妻良母还贤妻良母’，人如其名——爱夫。”1999年黄昆患上了帕金森病，连扣扣子都有点困难，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夫人操持。就在那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颁奖大会与会前，76岁的李爱扶主动要求陪老伴一起人民大会堂，要去感觉一下那里的温度，好为黄昆准备参加颁奖大会的衣服。坐在汽车后座上，等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彩排的两位老人，像一对朴实、普通

的北京老人一样，穿着厚厚长长的羽绒服，帽子下露出几缕白发，但是他们不苟言笑的表情，紧抿着的嘴唇，言简意赅的话语，就连脸上的线条无不都显现出两位科学老人独特的性格：他们似乎刻意和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种距离，维护着自己科学研究和私人生活的空间。两位老人的气质很接近，如果不是黄夫人深陷的眼窝和眼睛的颜色，几乎让人忘记了她是一个英国人。

也由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她对朋友诚恳、助人的精神，赢得了北大物理系同仁的敬重。她对黄昆先生的尊重，她的大度，更令人赞佩不已。一晃已经40多年了，出于对她由衷的尊敬，黄老的学生们都尊称她为“李先生”。

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德国马普学会物理研究所前所长卡尔多纳如是评价。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树霖教授说，黄先生去世后，他给卡尔多纳发了封电子邮件，结果回信只有一句“He is a greatman.”。

美国知名物理学家皮尔曼在得知黄昆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致信称，他“是很长时间里科学上的英雄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说：“我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的治学方法对我一生都有影响。他研究问题首先要看清物理的本质，从最原始的问题出发，进行探索。他特别重视概念，这是黄昆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不但影响到我，也影响到我对学生的培养。”

> 他是我们的老师，微电子学家、清华大学李志坚院士动情地说黄昆先生做人、做科研求真务实，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的思维和严谨的学风都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没有直接听过黄昆院士的课，但很多像李志坚院士一

样的大家，都尊敬地称“黄昆是我们的老师”。

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他无法想像，自己看看文献，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就能把握科研的大方向。

“黄—朱模型”的创立人之一朱邦芬院士非常理解自己的老师。

“那天，我拿着科技部盖了章的批准文件给他看，他很高兴。”郑厚植表示，迄今为止，国家最高奖获得者拿450万元奖金做基金设奖的几乎没有，“这样影响更大、更深远，已经确定了章程、理事会和评选委员会，因为黄先生突然病重和去世，稍微停了一下，但还是会继续做，希望将来能够做得更有意义。”“也许，这就是对黄先生最好的纪念之一。”郑厚植院士说。除了诺贝尔奖，黄昆几乎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多年来，他依然以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所有和他接触以及没有与之接触的人。然而面对许许多多巨大的荣誉和奖励，他总是特别的低调。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各方面给我荣誉不少，我不能位尊无功，俸高无劳。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个真正大师的传奇。

黄昆小传

黄昆,1919年9月生于北京,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5年赴英国留学,1948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1951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1951~197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77~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1983年至2005年任名誉所长。1987~1991年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0年)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2002年,黄昆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提出了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理论和晶体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并预见了晶体光学声子和电磁场的耦合振动模式。提出并发展了由晶格豫引起多声子跃迁的理论(包括光跃迁和无辐射跃迁),提出了有效解决半导体超晶格光学振动的模型,并阐明其光学振动模式的要点。他与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理论》一书,成为该学科领域的第一部权威专著和标准参考文献。

主要征引书目篇目:

1. 朱邦芬:《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2. 黄昆:《黄昆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朱邦芬:《大家黄昆》,《铸剑春秋》,2005年第3期。

4. 陈辰嘉:《沉痛悼念我最敬爱的黄昆老师》,《物理》2005年第8期。

5. 余玮、吴志菲:《中国"最高科技奖"得主黄昆背后的故事》,《管理与财富》2002年第5期。

后　记

巴金、陈省身、费孝通、启功，加上前年去世的王选、张中行先生，大师们一个个离我们而去。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大师集体告别的年头？或者，因为大师多数诞生于过去的那个时代，而今天已很少有造就大师的土壤，所以才会让我们产生大师纷纷离去的错觉？这些经历过旧社会和新中国不同时代的老人，这些在各自的领域孜孜以求一辈子的人们，当他们的生命在安详或孤独中离去时，我们失去了他们，可是是否想过为什么今天却再也没有涌现出像他们这样值得尊敬的典范？

我们无法回答自己，但我们还是记住他们的名字吧：守望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启功、钱仲联和张中行，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和董辅礽，终结关怀的人文社会学大师巴金、费孝通和钟敬文，引领未来的科学大师陈省身、黄昆和王选。此外，在文化艺术界曲艺大师骆玉笙、音乐大师黄磁、豫剧表演艺术大师常香玉，等等。他们这些大师都等先后离我们而远去了。

逝者如斯，尽管我们仍随着时间前行，但一些熟悉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列举这份近来年已远去的大师

的名单，令人分外忧伤。因为这份名单太长，且太过于沉重。尽管他们所在领域的天空，因为巨星的陨落而黯然无光。他们的离去，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概莫能例外。但对于这些大师的去世，我们诚然哀痛，但更多的是遗憾和惋惜。这些文化或科学大师像硕果仅存的国家瑰宝，他们的离去，会给文化界、科学界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他们之后，中国还会出现大师吗？

大师凋零，感慨之余我们应更多地思考。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于这些大师级的巨星来说，这是对他们离去的最恰当表述，因为他们生前的贡献依然在影响着无数活着的人。他们思想的独立，灵魂的真实，一刻都不能远离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智者的守护，他们以常人不具备的智慧维持我们这个民族灵魂的延续，对他们的回顾是对其精神的致敬。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格力量的感召弥足珍贵。大师有此力量，他们以常人不备的智慧和思想，守护着人类灵魂最神圣的一隅。文化或科学方面的成就可以各种方式记录保存，但人格的感召力将随生命而逝，这才是大师逝去给我们的最大损失。

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从大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出发，去重新审视大师生活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探讨大师之所以成一代宗师的原因。我们深知本书从最初选题的确定，到提纲的确立，再到书稿的最后定稿，都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特别本书的完成与大师后代和学生关心和帮忙是密不可分不开的。如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薛暮桥先生的女儿薛小和、钟敬文先生的学生董晓萍教授、钱仲联先生的学生涂小马博士、启功先生的助理侯刚教授、董辅礽基金会的李智先生，

等等。另外,本书稿还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的王晓明教授、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博士以及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等诸位师友的帮忙,在此一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大师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追思音。大师已远去,然而其极富魄力的人格、精深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构筑着中国人的智慧大厦,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财富。

目送大师们的背影,我们只能深深俯首鞠躬。

王建明　于津门愚陋斋
2008 年 4 月 12 日